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左舜生自選集

左舜生著

政論·時評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左舜生選集政論集



民國三十六年任農林部部長
時攝時年五十五歲



→
民國三十一年攝於重慶
時年五十歲



民國四十五年攝於香港
時年六十四歲



→
民國四十三年春攝於台北
時年六十二歲

前記

這三十篇文字，是從我最近兩年間所寫的一百篇左右的論文中選輯出來的。這兩年來中國的輿論有一個總趨向，便是一面反共抗俄，一面爭取自由民主。我這三十篇短文，也不外是從這兩方面發揮的。

因為，所涉及的問題，大抵都還沒有解決，而我自己的一些觀點，也大致沒有多大的變動，因此我把它選輯起來，再印行一次，以供自己的檢閱，同時也可以供關心這些問題的讀者參考。

中國反共抗俄之能否成功，決於中國的政治能否改進，我在這方面，已提供了不少的意見。我知道有許多話，會引起若干人的不大愉快，可是爲了國家，爲了反共抗俄的這個大題目，我不能再有更多的修正。

自中日和約簽訂，過去十餘年中日間一種不愉快的關係，好像已暫時可以告一段落，可是我深切的感到，日本仍潛伏着種種的危機，即今後中日關係的根本改善，也正有待於中日兩方的有心者共同努力。關於這個問題的文字，這兩年中我也寫過二十篇以上，在這本小冊裏却只選錄了三篇，但已可以代表我個人對中日問題的一種看法了。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於香港

目 錄

新觀念的追求.....	一
正本清源論.....	五
確立輿論權威.....	一
團結之道.....	一
知識分子的覺醒.....	七
國家榮替與用人標準.....	七

政治與文學	三五
展開廣泛的文化運動	四三
教育十萬個高級文化幹部	五一
加強反共的精神因素	五七
反共與反貪污	六三
使中共走向毀滅的幾條路	七三
應付中共崩潰的對策	七九
辛亥革命與反共抗俄	八三
告海外青年	八九
中國未來的政黨	九五
申述政黨改造的我見	一〇五
論領導者資格（並質張君勸先生）	一一一
反共基本要點	一一七
總要靠我們自己	一一三

俄帝真是可怕嗎？	二二七
美國的如意算盤……	一三一
美國政策與台灣自處……	一三一
遠東現狀與美國決策……	一三五
美國應有的決心……	一三九
美國亞洲政策再檢討……	一四五
韓戰兩週年……	一四五
日本往何處去？……	一四九
日本崛起的最好時機……	一五五
對中日和約簽訂的感想……	一七一
	一七五

新觀念的追求

整個世界截至現在為止，依然在一種渾沌，苟且，自私自利，爾許我虞的拖延狀態立，換言之，人類對於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尊重，以求得和平相處的「新觀念」，依然沒有建中得起來，還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彼此竭盡全力，正在向自殺之途邁進，盡管六十，七十，八十的許多老頭子，眼看都會前仆後繼的陸續倒下來，但是阻礙人類生存的若干舊觀念，並不會因為他們的死亡而死亡；世界盡管經過了無數的滌淨，我們的前一代，或前若干代的人們，實際已遭遇過無數的憂患，可是到了今天，這種憂患不僅沒有日見減少，反而日見其增

加。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若干有助於人類幸福的新事物，是我們的前一代，或前若干代的先輩所夢也不敢夢見的，今天確已在陸續出現；但所謂幸福也者，並沒有隨着這些新事物俱來，反而人類的憂疑與恐怖，却已隨着這些新事物之來，而益趨於深刻化，然則人智愈進，苦痛即與之俱加，果然是支配着人生一個一成不變的定律嗎？

就現狀論，人類必須再經過一度激烈的相互屠殺，似乎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了。但我們急於要問：再付出一次無可比擬的代價以後，是否真能換得一個較適於人類生存的「新時代」的到來？抑或依然遵循着人類歷史的老路，所謂戰爭也者，不問如何更趨於激烈，仍舊不過是人類生活過程中必然經過的階段之一，與所謂真正幸福的降臨並無必然的關係呢？遠在三十年前，經過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會有不少理知較強悲憫為懷的人物，努力作過「新時代」的追求；且曾不厭求詳的，作過如何實現此一「新時代」的種種擬議；可是，不幸得很，這類擬議的極小部分還不會圓滿實現，所謂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即已無法遏止而突然爆發。在過去的六年間，從表面上看，似乎第二次的大戰是早已結束了，實際則若干真正結束上次戰爭的懸案，並未獲得解決，而三次大戰的呼聲，却已甚囂塵上！誰說不怕戰爭？誰說不討厭戰爭？可是戰爭會因為你怕，因為你討厭，就不來嗎？

國家與國家的對立；種族與種族間的成見；貧窮與富有的懸殊；智慧均等發達的機會之無從取得；生存空間與資源分配的不合理；關於人類合理生存的理論或主義之無法協調；一般富有支配慾或英雄思想的人物被一般死不長進者的繼續崇拜，或且奉之如神明；一個適於全人類共存的倫理或道德觀念之無由建立，以致互信之不能產生；……凡此種種構成戰爭的因素，既然是一一依舊存在，你便質然相信，根據若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戰爭便當真可以遏止，豈非天下之至愚！

假如我們真有一套超凡入聖的辦法，能把構成戰爭的諸多因素提前的逐一消弭，容或未來的戰禍也真可消解於無形；如其不能，則我們當三次大戰還沒有正式爆發以前，我們總得就戰爭所以無法避免的許多原因，能有一番深入的認識，從而提出比較具體，可能有效的辦法，以預為建立永久和平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否則不幸戰爭一旦來臨，大家又手足無措的忙於救死不暇，甚至還要借助以往種種的舊觀念，以為爭取勝利的左券，而使得這類舊觀念不能不因戰爭而更為加強，則可能使人類的血，依然等於白流，而人類的愚頑，也非更陷於無可救藥不止！

依照我個人意想中之新觀念，舉亞洲一局部當前的事實為例，所謂韓戰停火的問題，越

南獨立之不容許阻撓的問題，乃至正在台北爭得面紅耳赤的中日和約問題，都應該是可以迎刃而解的。然而我們看見板門店會議席上那羣中共代表由於他們的心理狀態所表現的嘴臉；胡志明那樣一股自命不凡而實際又除依賴他力並無辦法的神氣；同時再看看吉田首相那樣一副無論是張着嘴，或撇着嘴，都適足以代表他一個落伍的頭腦的事實，我相信人類必須再經過一度的浩劫是無可倖免的！

然而，我們究竟不必作過度的悲觀：人類終於會依於他們智慧的發展而得救；若干構成戰爭原動力的事實，終於會依於人類理知的進步，而得到合理的糾正；人類將再遭遇部分的橫死，也許是無可避免的，但自由，平等，博愛的真理，是決不會死亡的；今日一般自命英雄的強盜們，盡管他們還是騎在人類的頭上在那裡頑指氣使，但我們早已看見對他們的末日裁判即將到來；我們最好不把一切的心思才力用在最近一次大戰的如何逃避，但我們必須把所有心思才力，用在一個適於人類共存的「新觀念」之追求。一切支配人類而又為促成人類陷於自殺的舊觀念，如果不以慧劍而加以猛力的一割，則一個具有合理性與普遍性的「新觀念」是無由產生的。

(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正本清源論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小學生時代唸着這兩句古文總是信口滑過，並不感到有什麼意義。進一步，讀到孟子所說的「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當然更不懂得「心」與「政」何以會有這樣必然的關係。等到年事漸長，所經的世變日多，然後才了解正本清源確實是不可忽視；同時也才懂得當政者的心理狀態，確實與他們的行政措施有其不可分的關聯。

很奇怪，「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的出現，已經有了四十年，但在過去這四十年中，不問

人民也罷，站在政府中的人員也罷，何以從來便沒有人問過：「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究竟是什麼意義？等到共匪盤據了中國大陸，居然把這四個字一筆勾銷，然後大家才十分難過，同時也才想到關於「中華民國」的締造，會是何等的艱難；而那班為「中華民國」犧牲了生命的先烈們，又是何等的可敬可愛；因而大家一致憤怒，以一種「滅此朝食」的心情，恨不得把這羣「中華民國」的叛徒一舉殲滅，而重光大陸。對，這種心情是應有的，也是必得想盡種種方法而使之實現的。可是，不要忙，我們在憤慨之餘，依然得冷靜的想一想，「中華民國」究竟是什麼意義！

所謂中華民國者，是團結五大民族而為一中華民族，所建立一個以人民為主人的國家是也。在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不過是由主人拿出錢來僱用一羣人所組織的一個辦事機構，他們的責任就在辦事；而且應該是華人民所交辦的事；沒有人承認他們是「天靈聰明」，更沒有人承認他們可以「作威作福」；事辦得好，主人自然可以傳令嘉獎；辦糟了，主人也可以嚴格批評，如果辦得太糟，甚至可以根據僱用合同——憲法——加以處罰。假定一個民主國家只看見一羣僱員口含天憲的在那裡鬧來鬧去，而主人乃退處於無權，連主人開口說話，也在所不許，甚至僱員們盜竊主人的財物據為己有，而視為當然！老實說，這就簡直是造反！

大家試閉着眼睛想一想：如果覺得中華民國在過去確實有過這樣的事情，那便所謂「民國」也者，早已名存實亡，等不到共匪來毀，而早已自毀了！

姑讓一步，我們不必從民主的純理論出發，而來就事論事。中山先生會說過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乃是四萬萬五千萬個阿斗，當時一部分不大贊成中山的人，聽到這個話多少感到有些難過，其實中山這個話在原則上並沒有錯：他既承認阿斗是諸葛亮的主人，則中華民國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便成了天經地義而生不可破！從前成王有過，周公只好去打他的兒子，他究竟不敢打到主人的頭上；諸葛亮打了敗仗回來，還是要向阿斗引咎，他斷不敢說他沒有責任。像那樣一個古老時代的君臣關係尚且如此，何況民國的僱員們對於他們的主人更有一種不可逾越的分際呢！

至於說主人們的程度不够，常常不免犯下許多過失，必得去好好的教育他們，這可以說正是政府中僱員們的一種責任。國家設立許多的公共教育機關去教育她的國民，依然少不了要這些僱員們好好的去管理；甚至政府中某一職權較大的個人，遇着國家遭遇困難問題的時候，而輿論的表現確實是相當紛歧，而且是相當幼稚，照這樣鬧下去，可能把國家弄得很危險，到了這樣一個時候，這個所謂職權較大的個人自然可以站出來說話，很誠懇，很委婉，

很叮嚀的說話，我們看普通民主國家的總統，國務卿，或首相，每每遇着一個重大問題，須要解決，而輿論又還沒有趨於大多數一致的時候，他們便必定有長篇大套的演說發表，這還不就是一種政治教育的意義嗎？可是教育盡管是教育，但說話的人却不敢自以為是，輿論贊成他們所說的，在他自然是一種安慰；輿論就反對他說的，他也斷不敢一筆抹煞；假定不是這樣，即不問輿論對他是否多數贊成，他還是要剛愎自用的為所欲為，這在一個普通民主國家的主人們，便可運用選舉方法不請他，而另請高明；即在一個選舉制度還不怎樣完整的國家，只要主人們不願放棄他們主人的職責，他們也還是有方法令這位不肯聽話的高級僕員無法實現他個人自以為是的辦法，終於鎚羽以去而後已。

不過等到言論失去自由，或輿論不生作用，逼到主人們不能不採用後一種辦法，國家所受的損害實在太大就是了。

今天的大多數人依然念念不忘「中華民國」，因此我深信「中華民國」決不是共匪所能够亡得了的。可是為了恢復工作的加速，友邦同情的擴大，我還是要垂涕而道提出我的「正本清源論」，所謂本與源者非他，便是要請大家除念念不忘「中華民國」以外，還要切切實實理解「中華民國」之所以為「中華民國」的意義何在，一切的主人們不要忘記了主人的職

責，一切榮譽的公僕們，也不要逾越分際對主人們有所忽視或有所輕侮；而大家從心理上來建立我們真正的中華民國！

（四十年十月三日）

確立輿論權威

有一天，在一個刊物的編輯部裏，有幾個朋友坐在一塊兒談天，忽然有一位朋友，很熱心，也很鄭重的提議：我們近來所發表的文字，偏重談國際的似乎太多，着重在自我檢討的似乎太少，我們為什麼不把這個作風改一改，一面固然還是應該注意國際，可是與自身利害國家前途最有密切關係的政治問題，不也可以談一談嗎？

我很同意這個提議，我不但覺得我們這個小小的刊物應該這樣做，乃至如港九如台灣一切大大小小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似乎也應該這樣做。

可是，話雖如此，我並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困難；中國輿論之沒有權威，即不能形成一種有力的輿論去左右政治，這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其所以造成這樣一種景象的原因很複雜，我現在還不願在這裏加以分析，但我知道：等到國家不能產生有力的輿論，或壓根兒就不許真正的輿論存在，這個國家是斷然要倒霉的。

就我個人親身所經歷的來說，我覺得在過去四十多年以來，只有三個時期的輿論最使大家滿意：①一個時期是清朝的末年，②其次是討袁一役，③最後一次則在「五四」前後。清末有兩派立場完全不同的輿論，一派主張立憲，一派主張革命，在當時像我這樣一個十五六歲的青年眼中，我覺得他們都有誠意：那是從一個公的觀點出發，而不是從一個私的觀點出發；而且在他們中間主持言論的人，對學問都有相當的根基，絕不像時下這樣胡說亂道，說來總是娓娓動人；再加上他們又不單只有言論而已，同時，還能以行動去與他們的言論相配合，因此格外的顯得有力。

袁世凱本來是清末一個抱有絕大野心而又較有能力的官僚，因緣時會，在立憲派擁護與革命派容忍的情形之下，居然做了中華民國第一任的正式總統。假定他能够乃心民國，憑着他那點政治經驗，好好為人民服務，以和平的方式把國家統一起來，使之逐漸的進於建設，

我想當時並沒有人一定非把他打倒不可；甚至就連手造民國的孫中山，也很有意思想領導他的同志，去做一個純粹的在野黨，他自己也只想為國家建造二十萬里的鐵道，去完成國家真正的統一，並不一定要直接參與國家的政治。沒有想到袁世凱利令智昏，做了總統還不够，一定非做皇帝不可；自己安富尊榮還不够，還想要把他的寶座傳給他的子孫，因此一面收買流氓，暗殺元勳；一面憑藉外力，消滅異己；於是乎，才弄得全國人對他離心離德。說也奇怪，袁世凱雖是一個少讀詩書頭腦很舊的官僚，可是他並不是不懂得輿論的重要，當他在正式準備做皇帝以前，他居然懂得要成立一個甚麼「籌安會」，他不僅要收買楊度、嚴復、劉師培這班很能做文章的人為他製造對內的輿論，同時他還要收買古德諾、有賀長雄這班人去為他製造對外的輿論。但不幸因為他的基本立場錯了，所以他製造的輿論畢竟生不起根來，盡管「籌安會」這班人把全國都弄得來頌功德，勸進，可是等到梁啟超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字發表出來，全國有志氣有知識的人，便無一人能直袁世凱之所為；再加上蔡鈞、唐繼堯、陸榮廷、劉顯世、任可澄等的幾次通電一經發出，全國討袁的輿論乃更趨於一致。甚至連國民和進步兩個在歷史上很難合作的黨派，在這一幕中也居然做到攜手同行了。嚴格的講來，袁世凱之死，並不是死於他的武力不如人，他實在是死在這種有力輿論的高壓。

之下。

所謂「五四運動」，本來是起源於一個大學，最初的出發點也還是政治的。可是後來因為時代的要求，他們言論的範圍愈推愈廣，所涉及的問題也愈來愈多，其影響所及，乃至支配了全國人的思想和行動，領導了全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不僅革命的再起，軍閥的垮台是受了這一股輿論的感召，就是到今天許多人為了要爭取民主自由而百折不回，九死不悔，也是由於這一股輿論的力量在那裏繼續發生作用啊！

中國目前的景象，比之四十年以前，自然更是糟到不堪了；大陸上有一個莫名其妙的中共政權，口口聲聲說要為人民服務，而實際却沒有一件事能表現他們是把人民當人；不僅專制獨裁為空前所未有；乃至生殺予奪，也可為所欲為；假定他們一切舉動都是由自己出發，猶可說也，不幸乃是以一個兒皇帝的身分，一切惟異族之命是聽。同時海外還有一個保存着中華民國正朔的國民政府，自然這在今天還是全國人心之所屬望。可是，時逾兩年，我們並沒有看見提出一個釐然有當於人心的較大辦法，而見諸實行；甚至連一件洽心當意的個別事實，我們也很難舉例；要多費力量去爭取外援，這是很對的，我們充分知道沒有外援，可能使反共抗俄的大業成為空談；可是除掉爭取外援一點，難道沒有千千萬萬能做應做的事，應

該從今天開始着手！可見今天需要有力的輿論加以批評督促，比較過去的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格外的迫切了。

要如何才會有真正有力的輿論出現呢？這有屬於政府一面應該注意的，有屬於主持輿論者的自身一面應該注意的。屬於政府一面的我想讓給政府去思考，屬於主持輿論者自身一面的，我不妨很僭越的提出幾點供大家參考，大抵都是牢之無甚高，實際並沒有什麼非常可喜之論，足以令人害怕。

第一、我們應該確定宗旨，一面反共抗俄，一面爭取自由民主，應該雙管齊下，不折不扣，說在反共抗俄的期間，便不能實現自由民主，這只是一種不正確的說法。

第二、我們應該超越個人與黨派的利害去考慮問題，千萬不可眼光如豆的祇顧着個人和黨派的小利小害，而忽視了國家民族的大利大害，現在眼看國家都不存在了，還談得上甚麼黨派？更談得上甚麼個人？

第三、我們自然應該着重在對事，但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們也不應該諱言對人，假定有一個人，確實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難道我們還應對這種人加以姑息嗎？假定一個人，處在一個應該負責的地位，一年兩年做不出成績，三年五年也還是做不出成績，難道我們

應該聽憑這種人去鬼混到底嗎？不過一談到對人，便應該格外留意：我們是不是由於一種偏見？是不是合於公道？是否對其人其事確乎了解得很清楚？我們所提出一種對人的非難，是不是人心之所同然？

第四、我們應該提倡反共抗俄力量的團結，不應該提倡分裂，所謂「分道揚鑣」，所謂「殊途同歸」，這僅僅祇是一種別有懷抱者的遁辭，其實，中國所剩餘的人才，只有此數，再也經不起分裂了啊！

第五、主持輿論者，應多留意自身的修養，不以學與識為基礎，真正有力的輿論是不會產生的。在中國的現狀下，一個有志主持輿論的人最好謝絕實際的政治。

（四十年七月十四日）

團結之道

無庸諱言，中國的反共陣容，是不怎樣團結的。

國際。

大家一致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一塊土，台灣是反共根據地，可是一說到台灣的政治，則見智見仁，大家的看法便不能完全一致。

要使台灣以外的反共力量一致與台灣合作，要使立在國際反共陣營的任何國家一致贊助

台灣，其關鍵便在政治。

政治有人的因素與事的因素，人與事能適當配合是第一等的政治；事重於人是第二等的政治；人重於事，或只問人不問事的政治，便不能不說是最壞的政治了。

嚴格的說起來，最近這四十年來的政治，實在是太無可觀，其基本原因，便是由於大家都著重在人，而不肯著重在事，一切希望都寄託於人，一切怨毒都集中於人，有時可以變希望為怨毒，有時也未嘗不可以變怨毒為希望，兜來兜去，總在人的身上兜圈子，而不肯在事的方面去轉念頭，老實說，這依然是一種期待明君賢相的傳統觀念，而並不是一種正確的民主觀念。

我自然不是說一個民主國家幹政治的人物，尤其是一個領導政治的人物，便不必賢明，可是賢明也只能賢明於法律之中，並不能賢明於法律之外；在法律以外去表現賢明，苟且不可，在法律以外去為惡，當然更不可了。

進一步來說，所謂「反共抗俄」，所謂「打回大陸」，乃至所謂「實行民主自由」，這決不是期待任何個人，或任何一部分人所能有效，必須集合羣策羣力，以適當的辦法，謹嚴的步驟，穩紮穩打，才庶幾乎可以有望，這應該是大家可以承認的。

說到這種地方，也許大家會感到團結之確不可少；截至現在為止，我們確實並沒有看見任何人會公開表示過團結並沒有迫切需要；所難於理解的，便是何以天天講團結，而不團結的事實還是依然存在？

大家要明白：如果離開了事而單講人，則父子兄弟不能團結的事實，也是比比皆是；何況集合一大羣觀點出發不同，是非尺度不同，利害關係不同，認識深淺不同的人，單靠幾句不着邊際的空話，又怎樣就可以團結得了呢？

說到這裡，我們便可以提出第一個結論，便是：「必須以辦法求團結」。

所謂辦法可能是很多的，你有你的辦法，我有我的辦法；甲團體有甲的辦法，乙團體也有乙的辦法；既不能強你以從我，也決無法強甲以從乙；然則自然要走到的第二個結論，便是：「共定辦法以求團結」。

共定的辦法有了，便交給某一部分人去執行，執行得妥當，便大家擁護；不妥當，便加以改造；這在一個平時的國家，能辦到這樣已經就够了，然而非所論於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空前嚴重的時期，是一個人才極端缺乏的時期，是一個黨派支離破碎的時期，盡管某一部分人可能有一種旋乾轉坤的自信，可是很難取得另一部分對國家有責任感，對實際

情況有認識者的支持。假定大家覺得上面的說法不錯，那我們便被逼迫着不能不提出第三個結論，那就是：「共定辦法，共同執行」。

一個國家到了緊急危難之際，結合全國可能結合的聰明才智，以共同產生一套挽救國命的辦法，並由多方面來共同執行，這在許多先進國家固然是家常便飯，但在咱們的中華民國也並不是沒有這種先例。假定像這樣一種起碼的做法也認為辦不到，那我便敢斷言：人的糾紛決無已時，毛政權還會要繼續下去，國際對我們的觀感也難改變。

今天還在中華民國旗幟之下共同奮鬥的人們，在台灣有八百萬，在台灣以外，則至少還有千萬以上；在台灣以外的人固然應該求團結於台灣；在台灣的人，又何嘗不應該求團結於海外？如果說一定要到了台灣才能算團結，不到台灣便不算團結，這也不過是一種知二五不知一十的言論而已。

(四十年十二月一日)

知識分子的覺醒

實現民主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家應該說老實話，中國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民主。

為了實現民主，應該具備的條件甚多，中國大抵還不會具備。這些條件，決不是咄嗟可以立辦，可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善，終身不得。」

現在我在這裏所說的，只是許多條件的一條，即「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

中國人自開始追求民主以至今日，至少已經有了五十年的歷史，何以至今依然不能過着一種比較接近真正民主的生活？其原因非常複雜，我們應該從歷史，思想，文化，制度，人事，時代因素，……種種方面去推敲，才庶幾可以得其真相；執偏以概全，把不能實現民主的責任，歸咎於某一種人，或某一部分人，不啻所謂某一種人或某一部分人也者，也不過是從這一歷史，思想，文化，制度，人事，時代因素的範疇所孕育出來的一種東西，他們既無過人的智慧與特殊的能力，可以從一切束縛與習染中超拔出來，你們却把這個沉重無比的責任向他們頭上一套，即令就把他們活活壓死，充其量也不過多了一羣有冤無處可訴的冤鬼，而中國之不會有民主也如故。

過去大家說袁世凱要不得，他要做皇帝，當然是不民主之尤，好，就把袁世凱打倒；大家又說軍閥要不得，他們實在胡鬧，隔民主何止十萬八千里，好，就把所有軍閥一一撲滅；後來國民黨來了，大家說還是不行，她要一黨專政，一黨專政當然也不是民主，於是一大羣的聰明人便跑去和共產黨合夥，其結果確實把國民黨也趕到了台灣；現在怎樣呢？毛皇帝毛腳毛手爬上了寶座，人民被屠殺得成了血海屍山，被勒索得到了敲骨吸髓，然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我在這裡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嗚呼！民主，民主，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

以行！

平心而論，今天的毛皇帝及其大小臣工，也還是中國這個區域的歷史，思想，文化，人事，加上時代因素等等的產物，他們的所行所為，我們與其從大鼻子和什麼馬恩列斯等等方面去找根據，遠不如就從中國的這許多因素中去找根據要妥當得多。

中國自然也有不大不小的一羣所謂知識分子，能說話，能鬧事，能領導，能製造許多似是而非的理論；能想出許多顧頭不顧腳的辦法，不能不說是這班知識分子的特長，於是乎，所謂知識分子也者，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咱們這個國家的驕子。平心而論，自袁世凱以至毛澤東，包括無數大大小小的軍閥，他們在這個四十年中所鬧出的一切一切，他們也實在是會向這些前前後後，老老少少，新新舊舊的許多知識分子請過教來的，所可惜的便是這班知識分子太不像樣，太不爭氣，太不自愛，太無責任感，也太歡喜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他們不但不能去教導，指點，感化，控制袁世凱以次這班人，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去吹他們，拍他們，逢迎他們，誑媚他們，向他們去看齊，向他們去學習，向他們去歡呼，拖着他們去吹噓，舔痔，其目的無非在丐其餘瀝，分其殘餘，躲在洋房子裡胡思亂想，坐在汽車上風馳電掣，以瞞其妻妾，傲其鄉里，向着可憐的老百姓示威！然而，也未嘗不可假民主之名以行！

老實說，中國這個國家，比之當代若干的民主強國，實在是落了伍的，說她落伍了一百年兩百年不算太少；說她落伍了三百年五百年也不算太多；凡一切實現民主的基本條件，無論是精神的，物質的，實在過於缺乏；要製造這些條件，決不是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就可以成功，可是，大幹有大效，小幹有小效，不幹則畢竟無效。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今天的知識分子，實在有覺悟要從今天做起的必要了。

積極的，要有所不爲，要能甘寂寞，要耐得窮，要不畏強暴，凡看見一切不民主的事象一定要不怕麻煩的起來加以批評，加以糾正；這不僅對政府應該如此，即對社會的一切集團一切組合也應該如此；總要把所有不民主的現象，從四面八方去加以撲滅，然後民主的曙光才會有漸漸透露出來的希望。民主也只是一種習慣，一種風氣，要由多數人去加以培養，加以保持，凡足以損害這種習慣或風氣之形成的，即令無力加以制止，至少總也要不去推波助浪。

積極的，要自我檢討，要埋頭苦幹，要靜心思索；口有說，說民主；筆有寫，寫民主；腳有動，動民主；如保赤子，如捍頭目，心誠求之，合力爭之，蔚為輿論，形成力量，鼓盪而為一種潮流，使當之者撓，逆之者敗，果然是這樣不斷的做去，你以為世界上還會有反民

主的魔王可以存在餘地嗎？

老實說，中國其所以鬧成如今天的這種現象，過去的與現在的一切知識分子是不能逃避責任的，責人莫忘自責，他之不民主，與我之對民主並無十分誠意，是有不可分的聯帶關係的。

（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國家隆替與用人標準

這個題目是很大的，單就中國講，從前的人，真不知道就這個如何用人問題用過多少心思，發過多少議論，我現在在這裡，却只想大題小做，就個人暫時所想到的，發表我一點淺見，可是我必得首先聲明：我的話是針對現實講的，也許只是一偏之見，但却不一定是言之無物。

要鑒別一個人的智、愚、賢、不肖，說到精微奧妙的地方，就是聖哲也不一定做得很圓滿；假定放低一點來講，一個人既不能離羣索居，也至少不能不做一點事，那就是說，你必

得去結識你的朋友或同志，去物色你的夥伴或助手，這樣一來，這個鑒別人才的問題，便必須請你動一動腦筋。就古今中外一切一切的例子來說，大凡一個人的榮辱及其事業的成敗，和這個問題的關係實在太大，換言之，你能够找得到於你有益的朋友，你就榮，否則就辱；你能够抓得住於你有作用的夥伴，你便成功，否則你便得失敗；我們試就一切相識的人或自己的經驗來想一想，大致的情形不就是這樣嗎？

個人如此，國家又何獨不然？我現在要首先在這裏說一句：中國在最近這五十年來，之所以一天一天的敗壞，以至於落到如目前的這樣一種慘境，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因，便是由於有權用人者的一方面，在這一點上，太違反了中外若干聖哲千錘百鍊苦思深索所發明的一些基本原則。我想，假如一個人能夠相當的反省，而對國家又確實抱得一種誠意，換言之，就是說他還有糾正已往一切錯誤的勇氣，同時，他還想把這個殘破的國家弄得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也許不會覺得我上面說的這一句話是過於武斷，或者是太不合事實。

有人說：一個人處在一種重要或次要而掌握得有用人性的地位，在實際上講，無論為國家為地方，乃至為他個人，是決沒有不想把事情弄好的，所可惜的，是上面所講最近五十年的這個時代，却是一個非常的時代；中國在最近這個五十年所遭遇的一切一切，確實是史無

前例，在中國的歷史上講，往往一時代都有一時代的人才，惟獨這時代對於人才的消耗量特別來得大，因而也感到人才的特別缺乏，你單單從用人當不當的一方面着想，而不從究竟有無人才可用的一方面去着想，這仍不免失之於不公平。我姑讓步承認這個話，也有多少的理由，但仍有一點我必須提出：那一個時代是否能够人才輩出，與政府用人的適當與否確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假定政府用人確實能夠釐然有當於人心，即大體上不違反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原則，則雖鴻鈍者亦將知所奮勉，而一時之人才出焉；否則謹厚者將意冷心灰而自毀於冥冥，狡黠者乃不免投袂奮起，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大家試平心靜氣思之，天下事之可痛哭流涕者，寧不在此！

下面姑就我所謂的「標準」很簡單的舉出幾條，完全祇是一種舉例的性質，我沒有能力說得很完備，在這樣一個有限度作文的篇幅上，也決不容許我說得太多。

一、古人所說的「進思盡忠，退思補過」，這裏的所謂「盡忠」，就是遇著國家的緊要關頭，自己覺得有話要說，同時又覺得自己的話多少有些關係，即令構思上還不完全成熟，但至少有提醒的作用，有參考的價值，便應該不顧一切的說了出來，用意是誠摯的，態度是朗爽的，至於能否為對方所接受，這却可以不管。假令不問在怎樣一種場合，永遠總是諱口

不言，這種人看樣子好像是十分深沉，非常謹慎，但實際上不是巧於逃避，苟全名位，便是中無所有，遇事不肯留心；甚至當着應該說話的時候他不說，等到某一事件已經敗壞到不可收拾，他却退有得言，把自己的責任洗刷得乾乾淨淨；這種人是近乎鄉愿一流，能敬遠，最好是能够敬遠不用。

二、在今天而講所謂「操守」這真是很難很難的，我平日對於這一點，自信持論並不十分苛刻，我通常就操守這一點把人分作四類：第一類是有能力做事而不愛錢；第二類是多少愛錢，却也真有能力做事；第三類是能力平平，愛錢也不敢逾分；第四類是死愛錢，却沒有絲毫的能力。第一類的人太少，可遇而不可求；不得已而思其次，即第二類第三類的人也無法不用，可是應該屬於第四類的，却總以不用為是。說到過去的所謂「貪污分子」，真好比是「白晝擲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他們的行動，幾乎是無所顧忌：他們不但是不怕人知道，而且，惟恐人不知道不對他去表示一種敬意或欣羨。於是為世人所指目的所謂「貪污分子」，真正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無人不知，假定對這種人還要加以掩護，甚至於還要乘瑕錄用，實在太不成話了。

三、曾國藩所說的「少大言而多條理」，這真是一個人才起碼必具的條件。不說大話，

是說明一個人隨時都在感到自己的不足；多條理，是說明一個人能够就一件事或一個問題，好好的去觀察，去研究，不籌度到相當的妥貼，決不敢貿然採取行動，以召致一種無可補救的追悔。假定能够把這兩點做到，不知道有多少的美德都可以因緣而生，例如謙虛，兼聽，不恥下問，臨事而懼，洞燭機先，謀定後動，……等等，不都是導源於這兩點而來的嗎？我在若干年來，真不知聽過多少毫無把握的大言壯語，也真不知見過多少事前太欠考慮的輕率行為，很顯然，國家的敗壞，不是與這類的人沒有關係的。中國古代的將領如趙括，魏延，馬謖之流，自然是隨時都有，而文人中之中看不中吃的所謂「名士畫餅」，尤其是多於過江之鯽，可是假定操用人之柄者，能有適當鑒用，即這類人也未嘗不可以有他們的用場，不過在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而已。

四、為輿論所不滿意的人，不一定就是完全的壞人，因為羣衆確實有時是盲目的。可是假定一個人，已經屢用而不一用，確實是並無成績可稽，徒以愛憎之故，乃不惜違反輿論非用不可；甚至輿論反對愈力，我乃信之愈深；這一點似乎有糾正的必要，自然，我懂得，在某一種場合，對用人採取這樣一種態度，有時也居然可以收到被用者的死力，歷史上不少這種先例，可是這究竟只是古代專制帝王駕馭雄才異傑的一種辦法，決不適於今天的時代，在

今天無論是用一個人上前敵去打仗，或到地方去辦理行政，假定他得不着輿論的支持，羣衆的助力，便難免不要打敗仗，鬧笑話。何況今天也確實並沒有所謂雄才卓傑，一定要採用這種方法，豈不更是多餘！

五、「賢者多勞」，但賢者不一定就多能，人才之所以爲人才，從某一意義上講，正是說他力有所專，學有所長，決不是說他無所不通，無所不能的意思。若干年以來，我眼看見實在對某事並不了解，而自以爲懂得的人不少，覺得這也是國家可憂慮的一端。即以當前的例子來說，某人過去是帶兵打仗的，但我們並不能舉出他赫赫的武功；他也從事過地方的行政，但我們也不能舉出他的任何政績；他從事過訓練班一類的教育，我們更不知道他對於人才造就的成績，究竟如何？聽說最近又搖身一變要去做外交官！在中外的歷史上，確實也偶有一種的天才家，他們的秉賦特別強，學識特別廣，閱歷經驗也特別豐富，不問任何一件困難的事，或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往往一落在他們的乎裏，便可以迎刃而解，可是這究竟只是不世出的少數人物，決非所論於一般的庸衆，如某者，就我知道，除掉說話走路多少有一點異乎常人以外，實在是一個極端平凡的人物，我真不知道何苦要拿國家的名器隨隨便便加到這類人的頭上，永遠讓其去糟蹋到底！

像上舉這樣的例子，自然還可以多舉，可是說到這裏，已經難免不有人看了要相當的難過，其實我是深深感到國家前途已經陷入十分逆境，要趁今天還勉強可以說話的時候，多少少的說一點，却沒有要使人難過的意思存在啊！

（四十年九月八日）

政治與文學

看這個題目，便好像是與現實無關，其實不然。

好久以前，我腦子裏便有這個題目，似乎有不少的話要說，可是，每到提筆的時候，便又覺得無從談起。記得二十年前，讀過日本文藝批評者厨川白村博士一篇「文學者和政治家」的論文，不知道是什麼人翻譯的，總而言之，確會引起過我的共鳴。現在依然打算就這個題目說幾句話，很想把厨川氏的論點先查一查，然後針對中國當前的現實，發表我個人的淺見。滿以為魯迅譯了他的「出了象牙之塔」，這一篇也一定在裡邊的，可是借着「魯迅全

集」的第十三冊來一翻，不幸單單只有這一篇他沒有收進去，魯迅這個人，隨時都要發揮他的一種陰陽怪氣，乃至譯別人的一本書，也要表示他個人的這種乖僻，實在是很可笑的。

無已，便還是只好說說我自己要說的話吧！

第一、我平日常常為一種幹政治而精神過度緊張的朋友們擔心，總覺得他們不短命也難保不要失敗。世間決沒有一種「快幹」、「硬幹」可以幹得好的事，何況政治牽涉的方面太多，往往在利害得失上極複雜之能事，快是如何快得來，硬又何從硬得起？如果單就執行的方面來說，也許快與硬是很好的，可是假如你立在一個發號施令的地位，必須運用你的思考以收謀定後動之效，那你的精神狀態便更須安詳，否則即難免思慮不周意氣用事；甚至遭遇着意外的打擊，更難免不手足無措。若干年來，我眼見由於思慮不周意氣用事在政治上所引起麻煩和挫敗的事實，實在太多；要糾正這一類的過失，一個政治者最好能有一點文學藝術的修養，甚至就聽聽戲，看看電影，寫寫字，說說笑話也是好的。這不僅在自己的精神上多有一點緩衝，直接對於考慮一個複雜的問題有益；就多懂得一點「人情味」，多有一點「幽默感」，又何嘗於增進人事的協調無補？

第二、政治行為的成敗是很尋常的，可是真要做到成不驕而敗不餒，談何容易？因政治

行爲而引起個人的毀譽，也是極普通的，可是真要達到聞譽而不自以爲有餘，聞毀而不自以爲不足，又需要多少的工夫與火候？中國歷史上的政治人物如屈原，賈生，彌平正之流無論矣，甚至就像諸葛亮，王安石這類比較有深厚修養的人，尚且不免汲汲顧影，牢愁寡歡，像我們這類平凡的人物，還能够不知所奮勉嗎？「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孔子對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位那種劍拔弩張或較有自信的說法，都少所稱許，惟獨對於曾皙那種雍容暇逸的風度，乃讚歎不置，我們正可想像聖人的胸次，是何等的浩然！孔老先生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老先生却一定要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我們豈不更可看出這兩位老人在修養上的差異？古代的用舍在君主，現代的用舍在國民，有時候要過分的去勉強也是勉強不來的。個人的生命有限，國家民族的生命無窮，所謂政治也者，我不幹，一定有別人幹；我死了，更非別人幹不可；一定要說「舍我其誰」似乎大可不必！二十年來，我常常有幾句話向朋友們說起：「政治者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爲之，小人因緣以爲利！」我心目中的所謂「利」，並不一定是指的貪污，只要你對功名榮譽這類的觀念放不下，便難免不墮入魔障啊！要做到一種可幹可不幹的程度，却也真不容易，太高的修養，也許高不可攀，但借文藝的欣賞把自己引導到一個較寬的天地，不也小之可以益壽延年，大之可以化民

成俗嗎？

第三、近年幹政治的人們，動輒歡喜說「領導青年」，「領導青年」，我不是說青年毋須領導，更不是說青年不願接受領導，但我總覺得青年好比奇花初胎，你能時其寒燠，擇其土宜，殷殷勤勤的去加以培植灌溉，這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假定你要去揠苗助長，或如東漁薪，甚至要預先製成一副模子，把他們一一往你這個同型的模子裏去鑄，不如是你就覺得他們不肯「就範」，而視為棄材！老實說，像這樣的方法，不僅不會收到領導的功效，甚至他們終有一天要拔出手鎗向你掃射也不一定啊！這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異動非常激烈，而鼓盪其間者，大抵都是青年。造成這些異動的是非善惡姑置不談，但我們却不能一切的歸功或歸罪於一般的正常教育，今天一個資質較為優秀的青年，他只要能够自動的讀上十本八本文學書，他便可以自己構成一個理想，形成一套理論，而且有勇氣立即見諸行動。近二三十年來，由於中國人的寫作或輸自外國的文學作品，何只數千百種，這實際是構成中國現代青年思想的淵源，今天我們朝野的許多大人先生們，對這樣一個事實一切置之不理，只一味不揣冒昧的說：我來領導青年，我敢擔保你們非繼續碰壁不止！假定我們說青年羣是一個國家的中堅分子，是推進一切改革事業的生力軍，你們又真有意思去爭取他們的合作，那麼你們

自己對這方面不有較他們更為深厚的修養，又如何可能呢？

這個題目可供發揮之點還很多，甚至我要說爲了研究今天的國際問題，爲進一步明瞭若干民族的精神狀態，也非分別求之於他們的文學不可，這個話說來太遠，也跡近高調，只好留着慢慢的再談吧！

（四十年十月十七日）

展開廣泛的文化運動

反共是一件任重道遠的工作，而且是複雜多方而又必須與人合作的工作。既不是惟武力所能有效，也不是惟政治惟經濟或惟文化思想所能有功，必須簡練謹嚴，巧為配合，做到文來文應，武來武應，人以多方謀我，我即以多方應之，才庶幾有得着最後勝利的希望。

譬如我在這篇文字裏所預備暢發廣泛的文化運動一點，在我自己決沒有忽視武力鬥爭或政治經濟情況改進的意思，不過是從另一角度來立言，說明文化思想在這一全面鬥爭中所佔地位的重要，絕對不可忽視而已。

自從中共控制了整個中國大陸以後，從文化思想的觀點來看，他們在這三年中所已進行或正在進行的工作，可舉例的指出以下各點：

一、他們對一切文化人蹂躪備至，叫他們承認自己過去一切的錯誤，否定自己過去所有的勞績，不許他們有自由的思考，自然更不許他們有獨立的人格。從前專制帝王對付文人是倡優蓄之，然而倡優究竟還是屬於人類的一種動物；今天的中共，他們既剝奪了一切文化人的靈魂，好比要猴戲，他們叫你戴上某種面具，你就必得戴上；他們叫你爬在狗背上，你就得爬上去；他們的繩怎樣敲，你就得怎樣跳，前面是果餌，後面是鞭子，一切得聽命主人，絕對身不由主，世間最殘酷，最惡毒的刑罰，大概沒有比這個再厲害的了！罪莫大於剝奪他人的靈魂，共產黨所犯不可赦的瀕天大罪，應該以此為第一。

二、一國家一民族各有其文化演進的過程，人類文化的演進亦依時代而有其不可遼越的通則；前人無法阻後人止於至善之途，後人亦不容漠視前人披荆斬棘的往蹟，今人勝過古人無可驕，前人不及後人也無可恥，一切只能循乎人為與自然的推進，觀察與則倣的啓發，而絕對無所用其矯揉造作。現在共產黨要對歷史加以厚誣，加以曲解，加以偽造，抹煞事實，專打翻案，否定我們一切承先啓後的憑藉，搗亂一切是非善惡的軌則，殘暴不只加於生人，

清算必且及於死者，把中國這個擁有數千年文化生活的偉大民族，下儕於生番野蠻，一切只許去捲斯拉夫民族的屁股，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共之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其罪狀以此為第二。

三、中國在近三百年或最近一百年，所吸收外來民族的文化，大致以得自英語民族者為主，其次則拉丁民族，日爾曼民族，與斯拉夫民族可謂毫不相干；我們盡管了解斯拉夫民族文化較之西歐文化遠為落伍，但斯拉夫民族苟有一節之長，我們却也從不肯一筆抹煞，不惜加以兼收並蓄；這是中國人自來吸取外來文化的一種優良習慣，也正是中華民族所以形成一個偉大民族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却要一反前人之所為，凡自希臘羅馬以來，文藝復興以降一切古代近代的西洋文化，概以一個狗屁不通所謂「資本主義的文化」這名詞加以否定，乃至屏其宗教，輕其文藝，棄其科學，封閉其學校，禁絕其語言，一切一切只許他們去向落伍的斯拉夫民族從頭學起，即令世間果有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化」，然以之比於全盤的西洋文化，其歷史尚不足半世紀，而其根源且自所謂「資本主義的文化」襲取而來，不惟不足學，亦且不必學，一定要屏絕黃鐘大呂，專門抱着一個瓦罐子烏烏而呼，秧歌王朝之所以為人所鄙視，其原因豈不在此！矯枉中國取精用宏傳統的博學之風，使之流於狹隘鄙

俗，中共在文化上所犯的大罪，以此為第三。

四、中國社會的結構，自來是「四民平等」，民間所流行的熟語有所謂「耕誠為本」，正表現它對士子與農夫是等量齊觀；民間藝術所表現於繪畫，鼓辭，音樂，戲劇種種方面的所謂「漁樵耕讀」，它不僅沒有把知識分子擺在樵子，漁夫，和耕者之下，反而，把他們列在讀書人的上面；封建在中國已經結束了兩千年，我們自來就是「白屋出公卿」，「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中國所最討厭的就是有錢人，尤其對一般以非法手段找錢的貪污分子，更是為多數人所不齒；對待慳吝的有錢人，中國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去處治他，叫做「為富不仁」，對於「刦富濟貧」的舉動，即令就是一種強盜勾當，大家也覺得甚可嘉許；對於做官的人，中國人眼中並不一定看得起，除非他是一個清廉有為真正能「為人民服務」的好官，反過來，倒是一介布衣之士，假定他是蓄道德能文章的話，却反為王公卿相所重視，也為社會所敬禮，所謂「布衣可以傲王侯」，是中國社會的一種事實，並不是一種理想；社會上一切欺壓善良的強暴之徒，更是中國人所深惡痛絕的，中國的歷史，文學，所提倡歌頌的遊俠之士，就是用以對付這班人的，中國人所崇拜的「包龍圖」、「彭公」、「施公」這類的強項更也正是為打擊這班人的；中國社會最重視一種溫情，人與人相處最要講一種「厚道」，

所謂「忠厚傳家」幾乎是中國人的處世格言，因之中國社會乃充滿一種人情味，與那些專講個人主義，唯物主義的社會，迥然有別；凡此種種中國社會的優良之點，實在是舉不勝舉，簡直可以寫出若干本大書哩。中共却一定要與這種事實挑戰，捏造出所謂階級鬥爭，要以仇恨去代温情，以魔道、獸道去代人道，他們這種搗亂中國優良社會結構的罪惡，算是中共的罪狀之四。

「子能覆楚，我亦能復之」，申包胥對伍員說的這兩句話，就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也還是凜凜有生氣的！中共在最近的三年間，把整個的中國大陸，鬧得天翻地覆。真好比「西遊記」上那隻毛猴，既鬧天宮，又鬧地府，更鬧龍宮，把中國數千年聯綿演進的文化，摧毀無餘；把中國具有若干特質的社會結構，搗亂得不堪言狀。

盡管我們今後的工作是非常艱鉅，可是我們却用不着悲觀：第一、本來近年的中國社會原已有若干的毛病，藉中共這一次的沖洗，好讓我們重新加以考慮，以謀重建，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第二、一種真正有價值的文化，原也不怕人加以摧毀，果然一經摧毀便要趨於銷沉，適足證明這種文化的本身，亦自有了缺陷，中國的固有文化，以及近代所逐漸介紹進來的西洋文化，經過中共這一次的搖撼，也許，更可放出它的光芒！第三、今天共產

黨的行動，原是一種世界性的行動，今天的反共行為，也是一種範圍更廣大的世界性行為，固然隨處可以遇着我們的敵人，也隨處可以找着我們的朋友，這樣一種集體鬥爭，雖然不免殘酷，可是趣味却也異常濃厚，只看我們能不能有決心來下工夫，却絕對不必擔心我們會陷於孤立。

可是當前的下手處怎樣呢？現在姑就我所想到的，舉出下面的幾點：

一、我們一面要有單獨作戰的決心，一面也要有嚶嗚求友的雅量，只有一個決心作戰的鬥士，才可能求得他真誠合作的戰友。要在中國展開一個廣泛的文化運動，真是經緯萬端，事實上只能就各人所長，和性之所近的去做，一點一滴的去做，一局部的工夫做得越好，將來匯成一個巨流便越有力量；要在相互尊重，相互慰藉，醞釀出一股無比的熱力，我們決不可以為這種工作是怎樣輕鬆，不有多數人以長時間去下死工夫，將不會表現出了不起的成績；也不應以當前的環境難於着手，便自寬自解的流於懈怠，必須認定做一點便會發生一個不小的影響，環境只能限制一種庸俗人，一種懶惰漢，却決不能限制一個豪傑之士！時乎時乎不再來，今天真是中國的有志者，為中國文化問題發揮他們最大力量的時候了。

二、今天中共在大陸摧毀中國文化的行為，實在是再笨拙也沒有了，他們不求多方面的

發展，而必強人出於一途，甚至對若干的新舊書籍，也要漫無標準的加以銷毀；殊不知中國在近代的文化上盡管落後，可是中國文化究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世界上若干高度文化的國家，關於研究中國文化的資料，大抵都有相當豐富的搜集，今後關於人類的文化活動，是不會有國界的，盡管中共一天天在那裡對這些資料加以摧殘，但在一個熱心於此項工作的人，却並不虞資料的缺乏，舉例言之，中日兩國如果今後真有意於文化上的提攜，今日中日兩國的學人，便應該切實研究出一套具體的辦法，萬不能如已往的淺薄敷衍，流於一種口頭禪。在過去中日八年的戰爭中，中國一切的文物被日本搜奪和摧毀的確實不少，日本為補正以往的錯誤，必須對中國有一種補償，例如將來在北京、上海、廣州、台灣、成都等處，協助中國建立幾個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同時令中國學人前往日本作長期研究者的一種便利，這在日本本實在是責無旁貸，而為中日兩國建立今後的一種親睦關係，也只能從文化與經濟的兩觀點出發，才可大可久，只要日本以誠意出之，我想中國人是可以理解的。

三、美國對於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建立，確實是有過相當的貢獻的，可是今天在中國的大陸上却掀起了一股「反美」的巨潮，自然這是由於蘇聯的嗾使，或源於共產黨的教義，但我們對美國對中國的文化工作所持的態度，和中國派遣留學生的政策，自來就有多少的懷疑，今

後為展開中國的文化運動，我們所仰賴於美國者依然很多，可是我希望中美兩方的有心人，必須加以深澈的研究，矯正以往的錯誤，開闢未來的新機，使中美的文化的交流，能有一個更健全的發展，這也似乎是不可少的。

四、我知道政治決不應該與教育文化脫節，也不主張一個大學裡面不涉及現實的政治問題，可是，只應該以學術的見地出之，決不可牽涉到黨見，過去國民黨間過一時期的黨化教育，即區區個人在道二三十年以來，也無時無地不與黨化教育為敵：「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竊」，今天中共在大陸上推行一種更專橫更惡毒的黨化教育，我們能說這不是導源於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而變本加厲的一種行為嗎？我們現在仍竭誠期待國民黨能够返回大陸，但決不歡迎國民黨挾黨化教育以俱來，尤其希望在今天的台灣，即能力矯前失，以表現反共的決心。中國歷史文化有其特質，世界的教育文化有其共性，民主教育尤必有其獨特的精神，發揚自由講學之風，為中國實現民主的要目之一，亦即對共產黨痛施打擊的一個有效工具。

五、中國的人才有限，今天大陸上千萬萬向中共靠攏的文化人，其動機與處境，有可原諒的，有不可原諒的，我們在今天便應該詳予調查，釐定政策，可以寬大，也可以嚴厲，但漫無標準，一切以愛憎為去取，以不正確的調查為根據，以為將來處理這個問題的辦法，

則萬萬要不得。

如何展開中國的文化運動，所包含的方面實在太多，現在姑且舉出這五點，以後續有所見，仍當繼續提出，以求指正。

(四十年一月九日)

教育十萬個高級文化幹部

要打倒中共政權，自然少不了武力，但單以武力戰勝共產黨，並不一定是真正的勝利，更不一定是永久的勝利。爲了徹底的摧毀共產黨，並使得她一敗之後，便永遠不能再起，必須於武力以外，再配合兩個主要的條件：其一是經濟的，其二是文化的。

最近兩年台灣的措施，似乎是着重在武力的重建，與經濟的穩定，關於文化的一點，好像僅以餘力及之，而且我還看不出台灣對於文化的復興與創建，已經有了怎樣的根本打算；台灣的本身是如此，即援助台灣的友邦，亦復如此。我覺得，這可能是一種錯誤，而且可能

使反共離竟全功，非力圖補救不可。

當三十八年退出大陸以後，我曾在台灣整整的住過四個月，當時因為沒有擔任任何固定的工作，多的是時間，因此很想利用這一機會讀一點書；尤其對於日本人五十年的經營台灣的經過，能得着一點切實的理解；但結果則使我非常失望。我會跑遍台北台中的若干書店，不僅一個像樣子的出版機構不會發見，乃至連我所要買的書籍，一本也買不着。從當時台灣的出版情況去理解台灣，我覺得台灣的青年固無法了解他們的祖國，也無法了解日本，自然更無法了解世界的各種情況。日本人拿了一個台灣，而且經過了五十年以上的悠久歲月，除掉一點普通的物質建設以外，會不能給台灣人一個接觸現代高度文化的機會，僅此一點，便已經註定了日本人必然失敗的命運。

最近兩年多台灣的實際情況如何，我自然無法²極了解，但聽取許多到過台灣的朋友的報告，覺得下面幾點，可能是去事實不遠的：

- 一、在台灣的一般知識文化分子，似乎對於未來中國文化復興與創建這一工作，並不怎樣熱烈，而且缺少較有權威的領導分子，在實際上向這方面去鼓吹倡導。
- 二、即在反共抗俄的前提下，似乎也還沒有可以暢所欲言的言論自由。

三、除共產黨及與共產黨接近的若干書報加以嚴格禁止以外，似乎對於其他的書報，也還有種種限制，不許其自由輸入；甚至關於審查書報的大權，依然握於一輩並無資格可以審查這類東西者之手。

四、對於私人辦學，聽說仍受嚴格限制，即如錢賓四先生這樣一位學者，要在台灣辦一個新亞書院的分院，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困難。

五、關於略帶政治性的集會結社，是否能嚴格的遵守憲法予以充分的自由，則我不會聽見有人談起，不敢武斷。但一個「自由中國協會」的牌子不能在台灣掛出，却是事實。

在我的想像上，收復大陸的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氣呵成的，假定我們的國軍推進到某一地區以後，如果沒有大批得力的高級文化分子與軍隊偕行並進，則關於收復地區的確保與推進，必然會發生絕大的困難。我們對於今天在大陸受過共匪毒化的青年，僅僅只有一條「再教育」的途徑可採，斷不容許我們隨意加以株連，採取一種過於嚴厲的處置，因為我們必須認識：使得大陸多數青年陷於今天這種苦境，其責任並不在青年的本身，毋寧說政府應該引為己責。可是這種「再教育」工作的困難，所需要條件的繁多，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因為軍事推進的緩急，其所需要人數的多少，也難於作精密的估計。可是假定我們在一年間有

光復三個省區可能，如果沒有十萬個高級文化幹部與軍事密切配合，我即不敢擔保不會使得一般青年陷於再度的失望，而給予共匪一個反噬的機會，或發生其他意想不到的枝節！

我現在在這裡提出一個具體的計劃：

一、台灣應該在三年至五年之間，完成一個教育十萬青年成為高級文化幹部的工作。而且今天即須着手。

二、教育這種青年，決不是過去那種短期訓練班的方式所能有效，大體上必須以正規的教育方式出之，但若干特殊的課程自不可少。

三、大批中級高級技術人員的訓練，亦屬迫切的需要，但應該劃出於我這個計劃以外，另案辦理。

四、應該特別獎勵私人辦學，包括中等教育與大學教育。政府對於這類辦學的私人，不僅在一個學校成立的手續上，應該特別予以簡化，而且在經濟上應該在可能範圍內予以切實輔助。

五、以往黨化教育的一種方法，必須澈頭澈尾予以放棄，而聽其一以自由的方式出之，政府對教育的干涉，愈少愈好。那些自來不為人民所信仰的人，尤其不適於主持這種教育工

作。

有人問：你今天期待台灣實現這樣龐大的一個教育計劃，錢從何來？老實說：只怕沒有決心，只怕辦理這種教育的動機與方法不妥當，假定有決心而動機與方法又妥當的話，經費反而是次要的問題。本來教育我們的子弟，就是節衣縮食也是應該做的，何況我們的工作如果能得着同情者的讚許，意外的援助，也不是一定不能獲得呢？

有人問，在今天的台灣，驟然召致幾萬個青年去受教育，你不擔心會有若干的共謀乘機混入嗎？我覺得這一問，實在問得有點可笑：我們不是天天都在想收復大陸嗎？一旦真的進入大陸，我們將眼見大陸的青年人人都有共謀的嫌疑，難道我們便因為這種原因不去再教育他們了嗎？不要說共產黨不會輕易把他們的青年送入台灣，即令送入，也正是我們所求之不得的，假定，我們連少數共謀都沒有加以改造的可能，這無異說我們將來對大陸青年的再教育，簡直就成為一句無法實行的空話了。

更有人問：你主張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教育計劃，當真就會有這樣多的青年跑到台灣去就學嗎？據我們所知道，每年在港九及東南亞一帶的僑胞子弟，畢業中學以後，陷於無法升學的苦境的，即在萬人以上，而共產黨却正在向他們招手，像翁文灝、黃炎培這類傢伙，跑到

共產黨那裡去，我們覺得一點也不足惜，惟有這類的青年，如果讓他們不得已真跑到共產黨那裡去受到蠱惑，將來他們一旦有機會回返到他們的出生地，斷然是會要發酵的！這對於祖國的危害，與在僑胞社會中可能發生的危險作用，豈不令人大寒而慄！

還有人問：我們過去的失敗，只是：政治的失敗，外交的失敗，經濟的失敗，軍事的失敗，……並不一定是教育的失敗，你何以對於黨化教育還是這樣深惡痛絕呢？老實說，這一點，與我所見的剛剛相反，我認定我們過去的失敗，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教育！我們今後沒有誠意成為一民主國家的意思則已，假如有的話，則黨化教育的臭味，便一點也保留不得，所謂黨化教育，根本便是共產黨與法西斯的一種特產，我們看見今天那一個民主國家，會有過這種落伍的教育方法呢？

（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加強反共的精神因素

蘇俄在事實上控制着中國大陸，已經快到三年，盡管反共抗俄的聲浪響徹雲霄，而蘇俄控制中國的力量還是有增無減。我們承認：反共大業的完成，必有待於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共同動作，但中國自身必須加速完成其準備，以左右世界的反共大勢，決不宜委心任運，靜待客觀環境的變化，然後起而追隨。我不敢說中國人三年來的反共動作是如何鬆懈，但精神不集中，工作不澈底，打擊敵人不中要害，要為無可否認的事實。

要如何才能使精神集中，工作澈底，而又能擊中敵人的要害，我在這裡願提出「卑之毋

加強反共的精神因素

「甚高論」的三點：

(一) 以民族主義力反中共的歸順蘇俄；

(二) 以人道主義力矯中共的殘暴屠殺；

(三) 以民主政治奠定未來的建國規模。

「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假定我們的一切反共工作，一一從這三點出發，在精神上與一切措施上，又能不自陷於矛盾錯亂或不得要領，我相信真正的力量必可產生，真正的團結必可實現。

哀莫大於亡國，痛莫大於滅種，而可哀可痛之尤深切者，更莫如於數千年所積累的文化之被摧殘，數千年來凝結此一民族的精神之被支解。毛澤東所叫出的「一面倒」，以及他們三年來在大陸一切離奇怪誕的舉動，實際都是向亡國滅種的前途邁進，而對於文化的摧殘與對於立國精神的打擊，更在加速進行，所以我們斷然有強調民族主義的必要。

自來異族所加於中國的侵略，大抵都來自北方，其餘來自西南來自海外的，雖也偶一有之，但其力量殊不足道。統觀我們的一部民族鬥爭史，幾乎繼續續都是在和從北方侵入的蠻族決鬥，雖然我們所耗費的時間有長短，所蒙受的損害有輕重，可是最後的勝利終必屬於

中國的一方，這是一個最可注意的事實，也是我們先民最值得讚美崇拜的一個方面。現在中共又把北方一個最大，最強，也是最後的野蠻民族，引進來侵略中國，在毛澤東雖自認道正是他超過前人的地方，但實際却是走的中國歷史上自來所常有的一條老路！北方蠻族既是照着這條老路而來，我們自然也惟有遵循着先民的往跡，從正面去加以抵抗，盡管敵人比起以往的蠻族有她更強大的力量，更複雜的侵略方法，但我們也一樣有比我們先民更優越的反抗條件，因此，我們不必悲觀，惟有自信的，大膽的，毫不推諉的，去完成我們這個歷史的使命。當然，這個工作是十分的艱鉅，而且其前途的變化也必然很多，所耗費的時間和國力也難於計算，但中國歷史的演進既已到了這一步，可以說這個責任便必然落到我們的頭上。在我們已往反抗北來的蠻族，其效益可以說只及於我們民族的本身，在今天我們反抗這個同時威脅着全世界的大蠻族，其效益乃可普及於人類，使命愈偉大，助力既可愈多，膽氣也可愈壯，我們便本着我們先民的經驗，益以現代的新知，團結內外的力量，很愉快的來承諾這個工作好了！

照中共年來在大陸所演出的殘暴屠殺，他們不只是自絕於中國人，實際也自絕於人類，我們要發揮人道主義的偉力，即絕對不能容許這種非人類的野獸，繼續在人類中來生息。我

我們今天所爭的不是一時一事的得失，更不是一黨一派的政權，乃是要來挽救，來維護，這個垂絕的人道！三年來，中國大陸的人民，死於戰爭，死於飢餓，死於勞役，死於鬥爭，死於疫病，死於三反五反，死於其他一切莫須有的罪名的，已經以千萬計，繼此以往，範圍還必然要擴大，人數還必然要增多，如果，我們不發揮維護人道的偉大力量，把這羣吃人的野獸予以驅除，予以撲滅，我們便必得承認滅種並是不可能的。今天毛澤東的使命是滅絕中國民族，我們的使命便是救起中國民族，我們的使命既是大到這樣無可比擬，因此我必得普告一切反共的人們：即令你們在反共的過程中，已經表現了你們的小忠，小信，一點一滴的小成績，一枝一節的小成就，但假如人道不能復活，你們的一切一切，便將等於徒勞；自然我們不能不從小處下手，我們也決不能薄小善而不為，但假如我們不能從大處着眼，則所下手的小處便將失其意義，所積累的小善也將失其價值；抱持最高的人道主義，以悲天憫人精神，來和這羣野蠻殘酷的獸類，作一次殊死的鬥爭，這才是我們今天反共的真正旨趣。

世界的民主政治，還在進步的過程中，因這種過程所帶來不愉快的現實，便對民主政治發生疑念，甚至發為種種反民主的言論與行為，這實在是一種死不長進的反動。我們今天依然不難從現代流行的民主政治中去找出它種種的弱點，但這樣弱點大抵來自人類的先天，而

於民主政治無與。如果說民主不足以醫治這些先天的弱點，則非神化史大林，尸祝毛澤東不可，這豈不是把我們反專制，反獨裁，反蘇俄，反中共的宗旨拋在九霄雲外？我從來不反對實施民主政治要有步驟，有條理，有重點，有緩急；但民主精神的發揮，必須隨專制獨裁的凶鹹成反比的以俱進，則為無可反對的一個趨勢。

（四十一年四月二日）

反共與反貪污

友人胡秋原先生，最近在「民主評論」三卷六期上寫了一篇「由『貪污哲學』論中共貪污之必然與無救」的長文，已發表的，還只一部分。他在下文如何說，現在不知道，但單就已發表的這一部分而論，已經很能引起我們對這個問題探討的興趣。胡先生所說的「貪污哲學」是就貪污這件事實，作一種哲學研究，我在這裡所說的，卻是「卑之毋甚高論」，僅僅只想就三四十年來親身所見所聞的，寫出我一點看法，而且只以中國為限。我平日也常常是這樣想：政治本來不一定是一件無聊的事，然而在中國幹政治總覺得無聊，其原因就是因

爲有貪污這件事實普遍的存在。要把中國的政治弄好，自然需要的條件很多，然而如何把這種貪污的風氣改變過來，終不失爲主要的消極條件之一。「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也許我在下面所寫出的這些看法，可能和胡先生所說的相互發明，而同有助於這個問題的認識與解決也不一定。

我不說絕對沒有例外，但就我在這三四年來所看見的一些所謂「有錢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一些蠢東西。我們平日常常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此人已經有錢不少，但他還在繼續找錢，乃至不惜用盡種種方法去找錢，似乎覺得是愈多愈好，他到底預備幹什麼？」我仔細一想，覺得這個問題是多餘的，因爲他並不預備幹什麼，其惟一的目的就在找錢，他把擁有足夠的金錢視爲身心性命，其餘的一切他都可以不管，只是找錢第一。「儒林外史」描寫一位有錢的嚴監生，病到非死不可的時候，還從被窩裏伸出兩個指頭，不斷氣，他的兩個姪子向他問長問短，他只是閉目搖頭，後來，還是他的位姨太太明白，連忙把一盞油燈裡的兩根燈草撥去一根，這位有錢的大爺才算安心落氣！可見，一個人愛錢愛到了癡，便連死到臨頭也還是不肯放鬆。我們試閉目想一想，就生平所看見幾個最有錢的人，他們那一種態度，他們那一副嘴臉，會有那個不像嚴監生？這自然是一個最極端的例，

但有錢人蠢到像嚴監生這種程度的，真是不少啊！

「人之患在於有生」，大凡一個人之歡喜找錢，其最主要的目的，也無非是想使自己的生活享受得比別人更為舒適。其實單是這樣一種想法，已經是愚蠢到不可救藥：一個人的生活最好是複雜而內容豐富，最忌的是單調而太少變化，一個窮小子，為饑寒所驅，乃至於餓得冷得「耳無聞，目無見」，忽然得着一頓粗飯，或一襲布衣，其樂也許兩面王無以遠過。反之，那些一輩子錦衣玉食的生活於綺羅叢中，或酒綠燈紅的臥倒在溫柔鄉裏，久而久之，習慣自然，還不是味同嚼蠍？實際講起來，人類社會中有了我這樣一個，本來是偶然而又偶然，可是既已不幸的活着，更不幸又發現這個活着的乃是所謂「我」，其所能由「我」來主宰的，便是把這短促的生命作一種較有趣味或較有意義的銷磨，而所謂趣味與意義之所由構成，大抵存於冒險，而決不存於只是安富尊榮的活着。我平日想像中的孔子，便只是一個絕頂聰明而又興趣多方的人，他大致沒有錢，偶然有點錢的時候有過，窮得沒有飯吃的時候也有過，可是他却始終有一種與天地同流的渾然興趣，從來不會憂慮過，也從來不會消極過。他的學生，有很有錢的，如子貢；也有窮得要死的，如原憲，如顏回；但他却是一視同仁，對他們都有着一種純真的愛。我們不要以為孔老先生真是有一定要如何如何的一種抱負，他

自己便說過，他最樂於趕馬車：「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從這種地方可以看出：一個人最怕的只是中無所有，或者說中無所「好」，假定他有所「好」的話，則貧富自可度外置之。反過來說，那些天天在那裡汲汲找錢的人，便可十足證明他們只是一些中無所有的蠢東西，盡管有錢人的肚皮是比別人要來得大一點，可是其中除掉一包污穢惡臭的草料以外，實在是一無所有！耶穌說：「使一個有錢的人去登天堂，好比是牽一匹駱駝穿過針孔。」這並不是天堂上容不下一隻蠢笨的駱駝，實在是像天堂那樣一種清淨所在，容不下這樣一股臭氣啊！

愛錢的人還有一種想法：他們總覺得有了錢，他們的生命便可多有一些保障。從前有錢人的理想，是「屢遷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現在有錢人的理想，便是把貪污所積累的美鈔變成銀行的存單或股票坐飛機到美國。其實以他們那一種材料，留在這樣一個貧窮的中國，已經只是一種被人輕賤的蠢東西，難到他們到了美國就會變得被人看得起的一種聰明人物？我們不難想像現在流亡到美國去的那一輩的中國閹佬，他們整處在美國那樣的一種社會裡，他們天天所遇的是怎樣一種的鬼生活。若干年來，我們也看見不少的地方軍閥，他們也真是勇於找錢，他們所佔有的房產，動輒是一條一條的街；所買的田，動輒是一縣一縣的土地；

方其盛時，他們豈不以為今生今世也吃着不盡，生命乃有了最安全的保障？可是，而今安在呢？他們之所以落到這步田地，只是由於一個觀念犯了基本錯誤：他們以為舉世皆窮，而我獨富，富者乃為比較的安全；却沒有想到舉世皆窮，而我最窮，惟最窮者乃最有保障啊！

今天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在反共，有不少過去的貪污分子，他們也居然側身在反共陣營裏面來搖旗吶喊，這在他們的自身看來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們在大陸有無數的不動產，都被共產黨共去了，尤其他們中間有在南京、上海、北平、廣州、成都等處蓋造得有像皇宮一般的房子，本來是準備着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子孫孫來長期享受的，現在也一一變了共匪的魔窟，他們當然也是不甘心的。其實講起來，任何人都可以反對共產，惟獨貪污分子却沒有這種資格：共產黨是有主義的貪污，貪污分子是不講主義的共產，我們在今天一面反共產，一面也反貪污，就是因這兩種東西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今天在海外逍遙自在的那般闊佬，他們也許期待反共的成功，他們又可翩然歸來，繼續他們的貪污工作，其實世界任何一處只要有大批貪污分子的存在，便不會沒有共產黨的存在，共產黨與貪污分子，本來是有不可分的血緣關係的。因此，凡反共便必須同時反貪污，假如反共而又容許貪污分子的存在，這便是反共的誠意不足，而且是絕對不會成功的。

貪污分子還有一種最蠢的想法：他們以為他們的貪污手續，大抵總是以祕密出之，別人不會知道；即知道也只要沒有憑據，便可不受法律的制裁；其實貪污的手續可以祕密，由貪污所得來的果實却無法祕密：貪污的目的在享受，在以錢驕人，驕其妻妾，驕其鄉里，驕其國人，假如一個因貪污而擁有多數金錢的人不拿來享受，不臭氣熏天招搖過市的驕人，便根本失却了貪污的意義，這在多數的貪污分子是不可能的。因此，凡貪污分子的額頭上，都清清楚楚的刻有兩個大字：貪污！憑他們躲到任何一個角落，他們額上的這兩個字，也永遠不會漶滅，正好比古代的犯人在面頰上刺着字是一樣，人人得而指目，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自然也有少數更蠢的，他們找了錢以後，又拼命裝窮，而且找出許多理由向人人訴苦，以掩飾他們的鄙吝，可是他們的馬腳終於是從他們的妻妾，從他們的不肖子孫露出來的，這種人比起那種找了錢便拿來胡亂享受的，乃更不可恕，也更為可鄙。

古代有一位太子，有一天，他對着一位高士，發出這樣一個問題：「貧賤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這位高士回答道：「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能驕人。」他的意思是說，一個富貴者驕人，便隨時有失掉富貴的危險，雖欲長保他的富貴而不可能，至於，一個窮小子真所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更何往而不可以得着貧賤？他還怕什麼鳥！從前孔老先生

恭維他的一個學生說：「穿一件破布袍子和一位穿狐皮袍子的，站在一塊，而毫不覺得羞恥的，大概就只有我這個出頭！」其實像子路這樣一種修養並不太難，只要你懂得凡一切有錢的人，無一不是得自非法的掠奪，你便可以把他看得連狗也不如，假定你高興的話，不妨端牠兩脚，那裏還談得上對他們什麼羞恥不羞恥！

我們反對共產黨在大陸上的胡作亂爲，因此我們提倡保護私有財產，但我們所謂保護私有財產，是指那班克勤克儉，由自己勞心努力去錙銖積累所得的一點財產而言，貪污分子決不在保護之列，豈只不保護而已，還非加以嚴厲的制裁不可。制裁貪污分子的辦法也只有兩個：其一是法律制裁，這個很簡單，即對犯案的貪污分子，毫不容情的加以身體的名譽的嚴厲制裁，個人貪污懲辦其個人，集體貪污懲辦其集體，與其失之出，寧失之入，大體也就够了。可是這個辦法的效用有限，比較更有效的乃是社會制裁，但要實施對貪污分子的社會制裁，有必須具備的若干先決條件：一、要改造社會風氣，二、要建立正當的人生哲學，三、要提高一切勞心勞力者的生活水準，四、特別要提高婦女教育，五、要爲國民普遍建立美育的環境，六、要有方法打擊一班馬屁文人，……「安得黃金三百萬，美人名士一齊來」，有了黃金，便連所謂美人名士都可以買得，這當然是一種社會的病態，假定，社會有了良好的

風氣，使一班所謂名士也者，都變了真名士，而不是偽名士，他們都懂得對那班貪污有錢的人一律不齒，如此則有錢人缺少了掩護，缺少了點綴，也會感到寂寞，貪污之風，也許可能減低。假定社會的風氣改善了，而婦女的教育也提高了，使得一班所謂美人也者，都想做一個高尚的美人，而不願做一個濫污美人，以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一個有錢人去發洩性慾，視為莫大的恥辱，如此也許可能使得一班貪污分子灰心短氣，稍稍斂戢他們那兩隻貪污的魔掌。可是這樣還不够，我們必得一面制止貪污分子的非法取得，一面我們還要保障一班真正勞心勞力者的正當取得；凡掌握政權而操有用人行政之秉者，必須懂得引用那班廉潔有爲之士，而屏絕一班貪污鄙吝之徒；凡是那班有錢人，他們自己享受得不耐煩了，也偶然，拿出幾個錢來賙濟賙濟窮人，那怕便是三元五元，他們也頗有德色，這種人尤其可鄙，在一種良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之下，也是應該加以制止，而絕不容許這種毒東西來滲出風頭的；只要社會的各方面，都懂得對有錢的貪污分子關門，貪污風氣便庶幾乎有澄清之望了。但這樣也還不够，我們要有方法化私爲公，一面制止私人過分享受，而同時提高公衆的享受，凡私家所藏一切可供大衆享受的器物，我們必須以國家的名義，而強制的方法拿來充公，使得公衆也有機會可以享樂，可以欣賞，自古以來的一切貪污分子，幾幾乎都是歡喜收藏古董和一切珍寶。

重器的，我們能以國家的力量把這個漏洞塞了，也不失爲打倒貪污之一法。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一面反共產，一面反貪污，我們衡量一個政府好壞的尺度，便看它是包庇貪污，縱容貪污，還是打擊貪污，屏絕貪污。我相信澄清貪污的風氣是有辦法的。

（四十一年三月一日及三月五日）

使中共走向毀滅的幾條路

亞洲問題的總解決，繫於中共政權的根本毀滅，毀滅是一定要毀滅的，但毀滅時間的遲早，則要看各方面的做法怎樣？

有人把中共政權的顛覆，完全寄託在世界大戰的正式爆發，不錯，中共不過是蘇聯的附屬品之一，她的冰山一天不倒，她便可能繼續的存在，必須蘇聯開始崩潰，中共才會加速的瓦解。這一點，不僅我們懂得，蘇聯懂得，中共自身也必然懂得。惟其如此，所以他們一定要想出種種方法，做出種種姿態，一會兒張牙舞爪，一會兒又笑臉迎人，其目的便在把大戰

正面爆發的時間，盡可能的延緩。我們不要以爲他們這些方法和姿態絕對無效，實際則民主陣線的分子，被其動搖，被其愚弄的，還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現。本來民主國家之所以團結反共原係處於被動，他們内心的要求還是和平。必須共方的攻勢加強，他們的團結才能加緊，只要蘇聯把絞刑架子上的繩子鬆一鬆，一切和平的幻影，又立即出現。可是，雖然如此，共產黨的本質是不能不造亂的，世界有一天和平，他們便一天感到威脅；只要人類的心情，始終期待在安定的秩序之下和平相處，他們的這種制度，便到底不能存在。惟其是這樣，他們的偽裝和平，乃至爲有限，在歐洲和緩一點，在亞洲便必須緊張起來；韓戰即令可停，在一個他們認爲更適宜的地點，戰爭依然發動。同時，蘇聯感到被包圍的圈子愈縮愈緊，她終於要突圍而出；民主方面感到守勢的工作已到達飽和，她們也可能變被動爲主動。因此，我們盡可認定大戰終必爆發，但時間則可能還有相當的距離，利用這點剩餘的時間，加強我們反共的工作，並不一定是沒有好處。

有人把中共政權的顛覆，寄希望於中共內部的變化，過去存着這種希望的人，可以說很多，現在雖然逐漸減少，但也還不是沒有。我們不願說存這種希望的人便毫無道理，可是這種希望之能否多少實現必須決於三個條件：第一、要看中共分子的人性，能否部分的回復；

第二、要看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能否普遍的覺醒；第三、要看蘇聯對中共這個工具，能否不作過度的使用。第一點希望甚微，即有，暫時也還是潛伏的，去明朗化的時間尚早；第二點在蘇聯殘酷的高壓之下，希望頗大，但暫時也還是潛伏的，必須有外在的因緣湊合，同時有賴於我們的繼續加火；第三點，蘇聯在客觀的心理上，也可能認識到對中共的運用，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但在周遭的形勢上，則不容許蘇聯不把中共繼續的丟下火坑。假定，大戰一旦爆發，或蘇聯使用中共而繼續挫敗，則所謂中共分子的人性回復，與中國人民族意識的覺醒，也可能加速、加強，我認定這還是從根本上顛覆中共的一個主要因素，我們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運用。

有人覺得中共之所以起來，和她之所以存在，完全依靠武力，我們既要打倒她，當然只有加強集中武力之一法，這自然是不錯的；我決不會誤會打倒中共可以缺少武力，猶之乎我也決不會誤解避免戰爭，依然可以消弭世界的共禍。可是今天反共的武力有其聯帶性，必須統籌擴充，統籌支配，單獨運用與局部解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勉強採取單獨的行動，其效用可能甚微，甚至發生相反的結果也不一定。必須認識這一點，我們才會了解武力必須與政治，外交，經濟，配合來培養，配合來運用，目前還是埋頭苦幹的時期，決不是輕言行

動的時期。

還有人把反共的文化思想宣傳，看得極端的重要，這自然也很正確；假定我們不從中共的縮腳把它繼續剝空，即令是一堵經不起風吹雨打的土牆，它也並不會自然傾倒。中共三年來在大陸上，從鬥爭清算到三反五反，她們這種自我宣傳是特別有效的；然而我們並不願對我們這一時期所做的工夫便妄自菲薄，可以說，今天在國際上，在一切海外人們的心目中，能够把中共一切的醜惡暴露無遺，乃至使得一般業已靠攏，或心存靠攏的分子，也紛紛發生動搖而迷途知返，不能不說是這種宣傳已經收了大效。話雖如此，但我們依然要明白認識：共產黨決不是單靠宣傳所能打得倒的。自蘇聯建國到今天，已經有了三十五年，即一切蘇聯衛星國家的出現，亦已多歷年所，在這三十年的時間，從鐵幕中跑出的人們，著書立說以反對共產的，豈少也哉！但曾何損於共產政權的毫末？可見所謂反共的文化思想宣傳，盡管是反共的一個有力方面，然而依然有其限度，不把這個力量和各方面去好好配合，依然是收不到反共的全功的。

總而言之，世界大戰的起來，中共內部的變化，有效武力的打擊，以及反共宣傳的繼續加強，這些都不失為使中共走向毀滅的一些路子，單走一條路子，或專等一個力量，或專靠

一個力量，是決不會有效的，因此，我們必須研究如何配合的方法，也必須考慮到團結的可能。

(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應付中共崩潰的對策

一個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而又殘民以逞的政權，說它可以繼續維持於不墜，一部人類歷史，還沒有發見過這種奇蹟，因此中共必然陷於崩潰的這一趨勢，乃是絲毫無可懷疑的。

但中共崩潰的途徑，可能有三種不同的形式：

第一種，由於世界發生劇變，即第三次世界大戰果然發生，蘇聯這隻龐大的紙老虎，以不戰自焚的結果，遭受東西南北四面的圍剿，在最短時間，慘敗到無以自存；中共驟然失其所憑依，精神物質，兩俱瓦解，喪魂失魄，腳亂手忙，而軍隊的鎗口，人民的武器，國軍的

反攻，若干民主國家志願反共的部隊；萬弩齊發，一切向毛澤東等道賈共僉直指，凡散在北京以及各地一二百萬的大小獨夫民賊，一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受到人民的公平處決，而所謂中共政權也者，乃一舉而鑿散烟消！

第二種，由於世界大戰達到已發未發之際，蘇聯與中共感於形勢日非，以蘇聯指導，或中共自動，力求縮短戰線，作有計劃的撤退，自南而北，自北而西，搜括物資，裹脅丁壯，銷毀存糧，殘破交通，焚燒房屋，散播細菌，屠殺一切難攏而又極不可靠的分子，造成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流竄，完成毛澤東所抱「千古風流人物」的本懷，雖說由於蘇聯之自救不遑，反共武裝的窮追截擊，中共內部的倒戈暴動，中國北部西部人民的一致奮起，最後亦終歸消滅，但這種困獸之鬥，在時間上却可能有相當的持續，或必待三次大戰結束，始能全體歸於肅清。

第三種，由於世界冷戰的繼續相持，蘇聯則威迫利誘，依然嗾使中共四處闖禍，而國軍反攻，又以國際的牽制，一時無法實行，於是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因為軍費的負擔，壯丁的綁架，勞役的鞭撻，共幹的貪污，人民券的變成廢紙，天災疫禍的四處發作，乃陷於剝牙及膚，剜肉見骨，敲骨吸髓，體盡血枯，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即以鋤頭鋸刀代鎗桿，以石頭

磚瓦代炸彈，終亦不能不起而自救。於是自北京以迄各地，秩序到底無法維持，原本來自民間的軍隊，眼見這類慘絕人寰的悲劇，可能激發其良知，為人民灑一掬同情之淚，一面為了解救，一面也當真要為人民服務，始而有三縣五縣的倒戈，繼而有一省兩省的獨立，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四方八面，處處騷然，若干較有頭腦的中共將領，感於形勢的嚴重，屈於人民的威力，積怨於中共一般領導者的貪殘橫暴，眼見一羣一羣的俄探深入，慨然興亡國滅種之悲，終亦不能不服從公意，投袂奮起，儼然以小狄托自居，掀起共產陣營中的一度狂風巨浪，向彙集北京的一羣共會，來一次澈底的大清算，於是所謂中共政權也者，遂亦陷於支離破碎，潰不成軍，毛澤東輩不能遠走高飛，亦即只能靜待最後之一絞！此亦年來國際所期待可能實現之一事實，要亦不失為中共崩潰形式之一種。

中共的崩潰既屬必然，而崩潰的過程，要不出上舉三種形式之一，或由三種形式，參伍錯綜而陷於百孔千瘡，我們都不難想像收復大陸這一工作是何等艱鉅，不問一次收復，或逐漸收復，其復興重建的工作，又是何等的複雜而困難。今日自由中國一切熱心大陸收復的人們，第一、不要以為現有努力即可實現收復工作而有餘，而只須靜待收復機會的自然成熟；第二、不可稍存幻想，以為一旦回到大陸以後，依然可以因陋就簡，舊夢重溫；第三、更不

可以為飢易為食，渴易為飲，今後人民對於政治以及執行政治的人物，即可漫無別擇，而能取得其衷心悅服；第四、尤其不能不注意及預防在收復過程中，可能來自國際與國內的非常變化。

為今之計，自當以台灣為中心，一切為了收復工作，從事種種切實而有效的準備：一、要教育一大批確實可以散布在未來大陸都會與農村中的中下級幹部，消極的要預防他們再犯以往在抗戰後從事收復工作的錯誤；積極的要鍛鍊他們堅苦耐勞踏實工作可能博得老百姓歡迎的一種品格。二、要根據中共已經破壞或未來可能破壞的一切事實，小心謹慎來釐定我們在重建中的經濟政策，土改政策，文化政策，救濟政策……三、未來國際的變化，最可隱憂，我們應如何想像中國未來的現實，以及我們今後立國的旨趣，來釐定我們的外交政策，這是既要大膽，又要小心，萬不可出之以魯莽滅裂，以致國家民族的災害！

上舉三點，好像是大而無當，但在我却是出之於一種沉痛的心情，即令跡近杞憂，實則不容忽視。

（四十一年七月二日）

辛亥革命與反共抗俄

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深厚文化和廣土衆民的國家，迫於時勢的需要，感於人心的同然，不得已起來澈底的改造，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辛亥以前，關於改造中國的計劃，至少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方案：一個是孫中山先生所代表急進的革命方案，另一個是康有為梁啟超所代表漸進的君主立憲方案。革命方案所嚮往者為法美，君憲方案所效法者為日本。自這兩個方案先後提出鼓吹而進入實際行動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沒有經過一番選擇而貿然便有所左右袒的，我們只要看一直延到光宣之

交，這兩面旗幟還是異常的鮮明。我們便可以了解他們確實各有其立場，各有其徒衆。

當中山先生個人最初立志從事革命的時候，據他自己所述他並沒有及身可以看見革命成功的把握，一直等到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才確信革命大業一定在他手裡便可成功。「同盟會」成立這件事實代表兩個意義：其一是革命力量的趨於團結，其二是中國的優秀分子多數選擇了革命，而使君憲派歸於沒落。

平心而論，當日君憲派在宣傳上確實是相當的堅強，其所假想革命後可能發生的若干不良後果，也決非無見。但何以到了清末最後的十年，革命風潮一天天趨於激烈，而君憲派乃反而處處捉襟見肘，甚至連兩個代表君憲派的首領康梁，一直到那拉氏死了以後，也還是不能入國門一步！這其間的微妙消息，我們還是不能不從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求之。

原來滿清以一個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循着中國歷史上異族照例由北方入侵的老路線，因緣時會，以武力，以陰謀，把中國勉強的征服了，這斷然不是大多數較優秀的漢民族所能甘心的。我們只要看明末，尤其南明那班殉國的仁人志士，雖至斷頭，流血，毀家，亡命，依然是此起彼伏的絲毫不悔；那班倖免死亡的第一流學者，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輩，也還是要著書立說以昭示來茲；及至到了清初，漢民族中的若干高級知識分子，也依然是不

忘舊物，往往在他們作詩行文的字裡行間暴露出他們的抑鬱不平之氣，以致引起順治，雍正，乾隆各朝的文字大獄，這可以證明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精神是何等的堅強！

以「太平天國」一役的浩大聲勢，本來是可以亡滅而有餘的，但何以地域恢復得那樣廣擴，時間還延得那樣長久，而終不免於夫敗？此無他，實在是因為太平天國那班領導人物與中國歷史文化的距離，過於懸遠，他們建立了許多離奇怪誕於中國歷史文化絕少依據的制度，又憑藉一種非驥非馬，類似外國而實非外國的宗教以實行其詐欺，這決不是代表中國歷史文化正統派的士大夫所能忍耐的，於是乎曾、胡、羅、彭、左、李之流，乃不能不投袂奮起，以一個更堅強的力量，予「太平天國」以迎頭痛擊，我們只看曾國藩討「太平天國」的那篇檄文，便可了解他們維護滿清君統的意味實在是非常的少，而維護中國固有的歷史文化的意味乃特別的多，即可看出他們的着重點之所在。尤其曾氏兄弟到了晚年，還要無所瞻顧的印行「船山遺書」，其心志豈不是更為明朗！因此我們可以說，戰勝「太平天國」的，決不是滿清的武力，而是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和中國士大夫那種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的堅強意志！

可是「太平天國」雖然是夫敗了，但「太平天國」一役，直接間接有助於辛亥革命的成

功却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山先生個人之立志「驅除韃虜」，據他自己所述便是直接受了「太平天國」這一幕的影響；我們檢討章太炎，鄒容，陳天華，汪兆銘諸人那些鼓吹種族革命的文字，也可看出他們對於「太平天國」的失敗會表示何等的惋惜；同時，自洪氏滅亡以後，他們的舊部逃亡匿跡於國內外，去參加，去組織那類「反清復明」的祕密組織的也頗多，中山先生在華僑中宣傳革命首先便以這班人為對象而得着他們深厚的同情；因此，我們說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中國上層知識分子固持着中國歷史文化的堅強信念，與中國下層社會那種排滿的熱烈情緒的合流也決不為過。可見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以政治為目標，以種族為手段，確實是一個最能得着要領的舉措。

由這樣看起來，辛亥八月十九日的武昌義旗一舉，到同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宣統即宣告退位，僅僅花了四個月左右的工夫，便把一個延長了二百六十八年的君統推翻，假定不是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作為背景，不有多數的志士仁人固持這個歷史文化的信念，在辛亥以前不惜斷頭流血去加緊的奮鬥二十年，中華民國便果真會這樣的匆匆出現嗎？

現在我要在這裏鄭重聲明：中華民國是幾十年，也可以說是幾百年，中國無數志士仁人的血染成的，確有其歷史，文化，種族的深厚背景，決不是任何毛頭小子所得而輕易推翻，

毛澤東引進一個北方落後的斯拉夫民族來憑凌中國，不惜自爲石敬瑭，劉豫，張邦昌，吳三桂……，其命運必且同於洪秀全，楊秀清，與四眼狗！今天我們來反共抗俄，依然要根據我們國家民族的立場，歷史文化的信念，參合世界自由民主的主潮，對他們加以迎頭痛擊，這是毫無疑義的！

（四十年十月十日）

告海外青年

說明祖國對他們的熱烈期待

現在除開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外，散居在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僑胞中的青年，何止二三萬？我想，像這樣二三百萬的中國青年，實在是今日中國青年羣中最幸運的：他們在父兄的庇護之下，照常過着平靜而圓滿的家庭生活；盡管是寄人籬下，可是並不缺少接受現代教育的機會；他們有的是活潑健壯的身體，敏銳而深澈的眼光，勇往精進的懷抱，豐富而多方的

告海外青年

常識；假定他們以現狀自甘，或專心致志，但求爲自己一生謀前途的開拓，我想，在這樣一種優裕的條件之下，是一定不難得着他們正常的發展的。

可是，留居在海外的青年們，當你們生息在比較一般人都安定良好的環境之下，也有時想到今天處在祖國大陸那樣一種荆天棘地下的苦難同胞嗎？

在最近的三年間，中共這一羣奴才在中國大陸所造成的罪惡，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所絕無的：

(一) 有千萬以上的善良人民，在他們所捏造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之下，已被屠殺。

(二) 有無數的男男女女，被他們逼迫得無路可走，無以爲生，不得已自己結束了他們自己的生命。

(三) 有百萬以上的壯丁，以蘇聯的命令，在無端侵略韓國的戰場上，陸續的變成了砲灰，更有數百萬的補充砲灰，也只待蘇聯的另一命令下來，即將陷於同一的命運。

(四) 中共最初兩年的財政，是利用土改的一種魔術去壓榨鄉村而取得的；現在鄉村完了，又用「三反」「五反」的這種魔術來壓榨城市，因而工商業也全體破產。

(五) 中共一羣的領導人物，大抵都是毛澤東劉少奇這類的不學無術之徒，他們既根本

無所謂國家民族的觀念，當然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絲毫無所愛惜。最近中共對於中國文化的摧殘，思想的滯塞，無所不用其極，其勢非把中國民族變為野蠻生番不止。

(六) 推測中共的命運，大抵不出兩途：其一是在民窮財盡的情況之下，遭遇有力的反攻，因而節節敗退，向西北逃竄；其一是再接受蘇聯一度命令，於韓國以外另闖一次大禍，因而，引起世界大戰，以與蘇聯同歸於盡。但無論他們的失敗是出於怎樣一種途徑，當他們開始潰敗的時候，他們一定還要來一次無情的燒殺，把中國的所有人力與一切建設，破壞無餘。

根據上面這幾點簡單的分析，我們已可得出下面的這些結論了：一、中共的失敗是必然的，但可能還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同時他們也還要繼續造出更多的罪惡。二、中國大陸我們斷然是要收復的，但收復的方式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形態：其一是由沿海或邊區逐漸推進，而以中共全部的消滅為歸宿；其一是由於國際的一種劇變，中共隨蘇聯的崩潰而瓦解，我們的收復工作，因以一氣呵成；三、其時的中國大陸有一萬萬以上的人民，由於飢餓與疾病而陷於垂斃的情況，正等待我們物質上的救濟；四、有無數中毒與失學的青年兒童，正等待我們去再教育與教育；五、田野荒蕪，工商破產，仍須要我們去從頭做起予以恢復或重新建設；

六、關於文化，政治，以及民間原有的事業與組織，都須要我們去細心的研討，重新安排；七、我們更須要發動一種民主力量，以制止一切投機取巧的腐敗官僚以及流氓黨棍，又來趁火打劫，渾水摸魚。

我們今天所最着急的，不在大陸的無法收復，乃在收復以後的重建工作千頭萬緒，以人才的缺乏無從着手或無法做好。現在我們一面希望政府放開手面，放大眼光，鼓勵人民自動辦學，加工趕造一大批的建國人才；一面也希望我們的僑胞，關心祖國未來的情況，「父詔其子，兄勉其弟」，為祖國的重建，準備一股活力。

假定我上面所假定的不錯，即今天留居海外千萬以上的僑胞，其中成年或將屆成年的少壯，能有二百萬至三百萬；更假定能有半數，即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當祖國光復的初期，能够有目的的，有組織的，聯袂返回大陸，參加到重建工作的各部門，並以平日在海外所耳濡目染的民主作風，也能身體力行的，使之一一表現於祖國，我想，這一定是一個偉大的貢獻。本來在最近的百年間，我們千萬以上的僑胞，胼手胝足奮鬥於海外，其對祖國的貢獻之大是有口皆碑的；尤其關於中華民國的創建，經濟各部門的建設，對外匯短絀的補償，關於對日抗戰的堅持不懈，更是赫赫在人耳目。假定，這次對於反共抗俄光復祖國的這一偉大工

作，更能提出其空前的貢獻，則在全部的華僑史上，將更不失為最光輝的一頁。

要完成這樣一個復國建國的偉大工作，今日海外僑胞的父老以及僑胞青年的自身，所應積極準備的是什麼呢？

- (一) 海外青年對於祖國情況的演變，須密切加以注意。
- (二) 關於祖國的語言文字，須好好學習，以能充分運用為原則。
- (三) 青年們應該分別的團結起來，組織起來。
- (四) 關於農工商礦各部門建設的技術與管理，最好能各就性之所近加以充分的研究。
- (五) 要盡可能準備一部可以自由運用於建設事業的資金。
- (六) 僑胞們更應關心祖國的政治，並積極的參加政治。
- (七) 對於今日退居海外的若干自由民主的人士，應保持密切的聯繫，以為未來攜手合作的準備。
- (八) 關於各處僑胞居住地與祖國關係的改善，亦應視為切膚問題，予以充分的注意。能如此，我相信祖國所誠摯期待於海外青年的這一希望，是決不會落空的。

(四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告海外青年

中國未來的政黨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無論如何，中國的政治終於是非走上民主的大道不可的。

我個人會經過過二十幾年的黨人生活；除青年黨外，其他黨派的內容，直接間接，也知道不少的事實；近年流寓香港，眼見一部分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似乎也頗熱心於一個或若干個新政黨的建立，他們對於建立新黨的態度和心理，我也略知一二。根據我這點有限的經驗和膚淺的認識，中國現存的政黨，以及正在醞釀中，而實際並未成立的新黨，從他們的歷

史，他們已表現的是非功罪，以及目前的心理狀態，我敢斷言：截至現在為止，中國實在還沒有一個適於推行現代民主政治而十分健全的政黨出現！

也許我這個話不免流於武斷，甚至於難免不要開罪多方，可是我必得首先向讀者懇求，希望對於我這個說話的人，首先能有如下的幾點認識：一、我現在對於黨人生活與現實政治實在是非常厭倦；二、我現在是比較的處在一個凌空的環境和超然的地位，對於現存的政黨與醞釀中的新黨，我都沒有什麼關係，更談不到所及於私人的利害；三、對於過去一切有黨派關係的人物，我都非常尊重，而且對任何一個黨派，我都能舉出不少很好的朋友；因此種種，我相信我的態度相當客觀，完全是為國家未來的利害打算（說得誇大一點，我還有為亞洲，為世界，為整个人類的打算），完全是就事論事，絕對不雜有任何對人的問題。

中國之有政黨，說得廣泛一點，大致也有半世紀以上的歷史了。可是拋開清末那些黨派不談，民初那些離離合合的小黨派不說，真正够得上一個現代政黨雛形的組織，大致也還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換言之，即自共產黨出現，國民黨改組，青年民社（原名國家社會黨）兩黨的相繼活動，中國才似乎進入了一個黨派競爭的時代。我們只要一回溯這些黨派成立或改組的經過，我們便可發現它們所受蘇聯的影響甚深，後來有法西斯和納粹起來，當然也受了

相當的感應，凡此都是客觀的事實，不容否認，也不必否認。因為是從這樣一種情況中成就的黨派，他們的彼此之間，盡管鬥爭得異常激烈，可是我們却不容易從他們中間發現幾個相似之點：

(一) 大家覺得，凡黨都必須標榜一種主義，好像沒有主義便不成其為黨的樣子。

(二) 大家覺得，凡黨都必須擁戴一個領袖，好像一個黨而沒有一個固定的領袖作為中心，便會要變成一盤散沙，很難凝聚得起來，也很難發生活動的力量。

(三) 大家也覺得，凡黨都必須有一種嚴格的紀律，黨對於黨員有權去指揮，去制裁，而黨員對黨，似乎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

(四) 關於黨的組織，似乎也是重重疊疊，層層節制，上級黨部對於下級黨部，黨對於一個個的黨員，凡有所指示，往往以「訓令」行之，好像是階級顯然，絕對不容踰越。

老實說，單就上面所舉的這四點而論，這都是共產黨和法西斯黨的特質，現代先進民主國家的政黨，乃至日本過去和現在的政黨，其情況並不一定這樣。

為什麼要有主義，好像是別人有了主義，我便不能不標榜一種主義，去和他們對抗的樣子，其結果以主義對主義，是一定非流血不可的。我相信：凡主義都是殺人的，聽憑你用任

何一種武器去殺人，也不會比主義殺得更多更殘酷！當共產黨初在中國成立，政爭一天天趨於激烈的時候，我記得胡適之先生會有過一篇勸人「多提出問題少談主義」的文字發表，我現在手邊沒有他這篇文章，他的論點如何，我不能列舉，但單看他這個題目，和中國後來一直演變到今天的種種現實，我不能不承認他是中國現代一個感覺最銳敏的人物。從實際說來所謂主義也者，不過一種最高的原則，在解釋上與運用上，應該是隨時代而有伸縮的。例如中國青年黨所標榜的是「國家主義」，這無非說它所定的政綱和黨的活動，處處要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從實質上去加以分析，我們也可立即發現這個意思是可能見仁見智而各有各的看法不同的。好比現在的美國，有人主張不惜加重納稅人的負擔，由美國運用大宗的金元，去加強一切民主國家的力量，用以維護世界的和平，亦即用以維持美國的安全；但也有人主張，盡量加以節省，不應該使美國受到過分的拖累，乃至影響到美國人安定的生活；我們究竟以那種美國人算得是真正的愛國，那種人是愛之而不得其道呢？現在的日本，有人覺得美國在日本繼續駐軍並保有若干的軍事基地是事實所必需，即令不足歡迎，也根本不容反對；但有人却絕對不然，他們以為這是美國的野心，美國的侵略，在形式上與實質上都足以妨礙日本的獨立，或召致日本的不幸；我們覺得究竟那種日本人確實是真正的愛國者，那種日本

人是在利用民衆一種盲目的因襲的愛國情緒而在那裏自便私圖呢？舉當前這兩個事實來看，可見一個含義顯然的「國家主義」，在解釋上與運用上，也可能發生種種不同的爭論，其他更何論焉。一個政黨的職責，是要針對現實，明定政策，來解決國家當前的一切困難而重大的問題；能盡這個責任，便算是一個政黨的成功，否則便是失敗，不着重這些實際，而單單拿一種空空洞洞的主義來玩弄，而又視為神聖不可侵犯，這實在是大可不必的啊！

社會上任何一種事業或任何一種組織，均可能有領導的人物，政黨亦人羣結合的方式之一，其須要有人領導，原也沒有什麼稀奇。可是普通社會上之所謂領袖，其形成確實是相當自然，一定要其人的學識，能力，道德，事功確有異乎一般羣衆，於是實至名歸，一個領導者的地位因以形成，而羣衆的行動乃隱然受其支配，亦樂於受其支配。我們看一個國家之是否民主，便看他們這種領袖是自然形成，還是出於勉強的製造。近三十年來，如意之墨，德之希，蘇共之史，中共之毛，大抵都是由於人為的硬造：他們所表現的，也大抵都是專橫，殘酷，狡詐，發狂，令人望而却步，聞而生厭；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乃至身死名滅為天下笑，天下之惡皆歸焉，即令他們也會盛極一時，而其歸結則必然走上同一的路子，這是毫無疑問的，現代民主國家的政黨，是不是也有他們的領袖呢？有，但是很自然的，不固定

的，這幾年可能是某甲，過幾年也可能是某乙，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否能繼續保持，其權完全操之於羣衆，而決不操之領袖自身，或其少數的親信。大凡一個擁有高度文化的國家，其人民迷信領袖倚賴領袖的程度必愈淺，反之則愈深，因此，一國文化的高下，也往往可於其人民對於領袖人物的態度測之。這樣一種原則，幾乎可以說明古今中外的若干史實，而並不顧其矛盾。今後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或若干個適於推行民主的政黨，我們應該着重一般黨員能力的提高，而不必着重在少數領袖人物的抬出。只能傑出於一般庸衆之上的領導者，並不是今天的中國所需要的領袖；能集合，策動一時代之人才，運用之，領導之使各效其用，才是今天所不可缺少的人物。更理想的一種境界，不是靠羣衆去抬高領袖，而應該是發揮領袖的力量去提高一般的羣衆。由羣衆去抬領袖，其自然的趨勢是專制的；發揮領袖的力量去提高一般羣衆，其自然的趨勢便是民主的；凡專制均惟恐人民之不愚，真民主則惟恐民知之不進。

大凡一個人，能謹守國家的法律，能盡一個國民所應盡的本分，則不失為一個民主國家的良好公民。可是近年的黨派，乃於國家的法律以外，另有所謂黨法；於國家的綱紀以外，另有所謂黨紀，甚至有時以黨的立場去制裁一個黨員，例如不經過國家法律的裁判而把一個黨員秘密處死，或不經一個黨員的申說而開除其黨籍，老實說，這實在是以黨叛國！至於以

黨的地位，去處死一個反對黨的黨員，其為違法叛國，自更不用說。我們不能教一個黨員去效忠國家，效忠人羣，而只教他效忠於黨，老實說，這只是一種邪魔外道。黨員對於一個黨的結合，應該只是基於一種政治的意見，合則留，不合則去，有其充分的自由。一個黨不能堂堂正正以政治主張為結合黨員的工具，乃至靠權利去誘惑，靠威力去威持，這種黨在本質上壓根兒便不民主，即令它有所謂鐵的紀律，鋼的紀律，其終於崩潰是可斷言的。

至於說到黨的組織，依據我自己的經驗，乃更是使我痛心疾首的。人類未嘗不可說是政治的動物，但政治究竟只是人生的一個方面，一個人除掉政治，待努力的方面還很多，一經加入一個黨派，即希望其人以從事政治為專業，這實在是一種荒唐的想法。不錯，人們確可以從事政治為專業的，但這究竟只限於一部分人，而不必期待於一般人，一個民主國家可期待一般的人人民關心政治，但決不需要大家去從事實際的政治。近年的黨派不然，凡黨員必一一分別隸屬於各級黨部，受黨的訓練，受黨的束縛，接受黨的訓令，服從黨的領袖，好像一個人一經做了黨員，便出賣了一切自由：一經變了一個黨人，便忘了一切做人的本職；於是乎黨以黨員的多少定黨勢的強弱，黨員也就靠黨以求生存，相互利用，相互倚賴，黨的意味愈濃，去人的意味也就愈遠了。本來中國官廳的一切命令文告，大抵都是最缺乏民主的形式

與實質的，不幸近年由各黨派的各級黨部所發出的一切文件，乃與官廳的一模一樣，甚至惡劣的程度且有時過之，於是乎黨的機構乃成了衙門，所謂各級黨部，乃成了一羣大小官僚的養成所！今天中國大陸上，人民把共產黨的機關，叫作「組織上」，這是可以令人談虎色變的；若干年以來，中國的老百姓也往往把一般辦黨的人叫作「黨老爺」，而所謂「老爺」也者，也居然居之不疑，連走路說話，也往往有一股「老爺」的神氣；他們總以為不會被人民所棄，實際當民衆叫出這些名辭的時候，他們和民衆的隔離，已經有十萬八千里了！從前我有一位老朋友，當他訓練黨員的時候，總歡喜鼓勵一般同志做一個「辦黨專家」，我當時心裏不以為然，以為什麼專家不好做，一定要做一個「辦黨專家」呢？今天一般人口頭心頭都有一個「黨混子」的名辭，其意義與從前在軍營中混久了的人叫作「營混子」是一樣，假如真需要有所謂「辦黨專家」的話，你想，除請教這班「黨混子」以外，你還有什麼辦法呢？

有人說：你把過去黨派的作風，批評得一錢不值，可是共產黨不就是運用這一套居然盤據了中國整個的大陸嗎？我們今天既然要反共，不師敵之長以制敵，又如何把共產黨打倒呢？實際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之所以對共黨深惡痛絕，便正是因為他們這一套足以戕滅人性，我們今天要反共成功，首先便在人性的恢復，提高人類精神的自由，倡導人

類的平等，反共要這樣做，建黨也要這樣做。

我理想中的新政黨，應該是平淡無奇而富有自由平等的氣象的；應該是人類的一種自由結合，約束不能不有，總以愈少愈好；黨員有關心一切重大政治問題而加以研究的必要；黨內對政策及世界一般情況的研究組合，愈多愈好，須讓他們自由發展，不要以黨的力量去干涉，尤其不要去指導，凡自命能指導別人的人，都是世間第一等不安分的人；黨員的行為，只受國家法律的限制，別無所謂黨紀；黨員的進退，一以對政策的異同為準，不得夾雜其他的作用；黨不能謀黨員以無限的義務，黨員亦不能對黨存無限的倚賴；要讓黨內的人才，有充分自由表現的機會；黨內也可能有派，但分派係由於對一個或若干個重大問題有了不同的看法，決不是彼此結合一羣人來排斥異己，搶飯碗；凡黨員均以參與政治而不拋棄本業為原則。

（四十一年六月一日）

申述政黨改造的我見

最近英國工黨的左派領袖貝萬，忽然發出一種異常怪誕的言論，他簡直主張承認中國大陸的現狀為一種既成事實，並進一步主張解散國軍，把台灣交給中共，以換取他心目中所期待的所謂世界和平。我們在最近半年間默察世界各方討論遠東局勢的言論，似乎沒有比貝萬這一次所發表來得更為離奇的。蘇聯及其若干傀儡國家已把整個世界擾亂到了如今天的這樣一種景象，居然在一個世界主要民主國家的政黨中擁有相當羣衆的領導人物，乃發出這樣一種洩氣的言論，實在是不能不令人感慨萬端。

可是，我們依然要冷靜我們的頭腦，面對當前殘酷的現實，即對於貝萬這類的言論，也不必表示過分的驚訝。自從中共盤據中國大陸以來，盡管她在三年中演出了無數殺人如麻暗無天日的事實；盡管她奉着主子的命令，早已揭開了世界大戰的序幕；可是若干的大國，却早已和她發生了正式的外交關係，所謂承認中國大陸的既成事實，在這些已經承認中共的國家看來，顯然已經不是一種言論，而是一種行為，我們對於這類的行為，尚且不願表示我們的驚異；對於貝萬這類的言論，乃反而表示不安，豈非多餘！

但是，話雖如此，我總覺得求其在我的工夫，畢竟是不可少的。我會發表了一篇「中國未來的政黨」，我是積極提出我的主張，認為中國現存的政黨，必須有一度澈底的改造，所謂改造也者，不只是若干人事的異動與若干組織方面的變更，乃是主張在組黨的觀念上，要加以根本的糾正。我今天把我上次這篇文章檢出再看了一遍，覺得我所要說的話雖大體都已說到，可是「語焉不詳，擇焉不精」，在一個不明瞭我寫這篇文章動機的人，或仍不免要發生若干誤會，因此，我願意在這裏加以申述。

我認為我們必得承認，我們之被迫而離開大陸，不能不說是一種失敗。在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中共在軍事上佔了上風，但實際上失敗的癥結，乃在政治。追溯政治失敗的責任，我

決不願把這種責任歸到某一個黨，或某一個個人，我覺得凡在過去十餘年間，在事實上會參加了政治的黨或個人，都應該分負責任的一部分。即以小區區而論，我確會周旋於國共之間者，經歷十年之久；對於斷然召集與中共一刀兩斷的國民大會，我也確會加上了一把火；同時我參加到當時的實際政治裏面去也為時將及兩年；說到應負責任，我首先便不願束身於責任以外。

我現在處在一個比較超然的環境，獨居深念，焦心於國家的前途，警惕於世界可能發生的劇變，我覺得我有針對現實的主張，即令我的主張未必一定就妥善，假定我隱忍不言，不盡情的說出，以供大家的參考，則我的負咎必將更大。

我認定中國必須澈底實行民主，始足以適合今後中國的需要，始足以維繫大陸內外的人心，也始足以吸取國際更多的同情與重視。可是要我把這個希望寄託於現存的政黨，我總覺得條件不够。甚至我曾經有過這樣的疑問：我們今天能不能把國育民三黨，加上一切有志於政治而原來不在三黨以內的人士，使之揉成一團，由各方推出負責的代表，針對中國當前的現實，就一切重要問題，來作一次澈底的檢討，然後，去異留同，去腐生新，形成兩個像樣子的大黨，使一黨以執政黨的姿態堂堂正正的在朝，另一黨則以反對黨的姿態堂堂正正的在

野，在反共的一個基本態度上，只能苟成而不能相反，在其他的一切主張則不妨各立壁壘，各抒所見，而一聽國民的抉擇。

然而要實現我這樣一個理想，對於已往組黨的觀念，便非澈底加以改造不可。關於這一層，我希望熱心的讀者，仍取我那篇「中國未來的政黨」參看，我要說的話，已都在那篇文章裏提到了，我現在只把我主要的意思，歸納於下面的幾點：

(一) 黨必須是一種政治主張的結合。凡沒有政治意見的人根本即不必加入任何政黨。
(二) 黨與黨員的關係，必須是民主的，而不是盲從的；黨不能過分的束縛黨員，黨員亦不應過分的倚賴黨。

(三) 凡黨的主張，必須通過民主的方式，經多數黨員或其代表的同意，黨員始有共同遵守的義務。

(四) 凡未經過民主方式而形成黨的主張的任何問題，黨員均可各抒所見，不准可對黨表示，也可公開對社會表示。

(五) 凡不同意黨的主張的黨員，有退黨的自由。

(六) 黨員養黨，黨不養黨員，國庫不能養黨。

(七) 黨有聽取社會任何批評或指諭的義務，而不能加以妨礙。

(八) 一黨執政，並不包含不許其他黨派參加中央或地方政治或其他社會事業的意義，一切須遵守普通民主國家的常軌。

起碼必做到上舉的各點，我們的黨才可以與共產黨迥然不同，我們反共也才有意義。

(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論領導者資格

——並質張君勸先生

最近張君勸先生匆匆過港，會與各方面有相當接觸，其態度的雍容，與言論的平實，一如往年，雖然他的年齡已接近七十，可是既不悲觀，也不頹喪，還是生氣滿滿，很想有一番積極的作為，這是很可喜的。

在他離港赴美以前，寫了一篇問答體的文字，聽說會在兩種刊物上同時發表，但我却是

從「再生」上讀到的，我想內容總不會有什麼差別。他這篇文字的一部分，是談他這兩年來在東南亞和澳洲等處遊歷講學的觀感，及所接觸的人物；其另一部分，則發表他個人對目前中國政局的思想，其論點所涉及的範圍則共有三個方面：一、重申他個人反共的一貫主張，並強調他今後「將以全副精力奔赴於以人類尊嚴人生價值為基礎的民主政治，社會公道與文化自由之中華民國復興」。二、因為現在在海外發展中的新勢力有人希望他挺身出來領導，因而他說明他個人的興趣，始終徘徊於學問與政治之間，政治上不需要他，他仍將去從事學問；政治需要他，他也將認為這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因而他又在這一段中，提出了今後領導政治的人物應具備的三種資格。三、最後一方面談到今後立國的要點，他撇開了一切現實不說，僅就個人生活與團體生活，提出了幾個原則，並今後可以成為共同思想或信仰的幾個方向。

我讀完張先生這篇文字以後（專指他後面的一部份），微微感到遠於現實，也稍稍覺得追溯過去的多於展望未來，同時還覺得學問的氣息依然多於政治的氣息，可是我對他的論點，並不願提出何等異議，僅僅對於他論領導人物，應具備的三種資格這一層，覺得太嫌不够，因本「各言爾志」之義，把我平日一點淺近的見解也寫了出來得以就正國人，當然更希

望有機會能得着張先生的指教。

張先生所謂領導人物應具備的第一種資格，為「深識國家之本質」，他說明「現代國家與專制時代有明顯之不同：一以人民為主人，一以人民為奴隸；一以自己為公僕，一以自己為所有者；一以尊崇各個人格而盡量發揮之，一以人民為牛馬而驅使之。」

張先生認為必具的第二種資格，為「深曉現代國家中之制度，根據以身作則之精神而安排之，確立之。」他解釋現代國家制度的基礎，是集體而非個人；是法治而非人治；是以人民為中心，不是以己為中心。

最後張先生認為領導人物，應具的第三種資格，應該「對於相反的思想與制度，知所抉擇。」他的意思是說明立國方針，必須前後繼續，互相貫通，決不可見異思遷，東塗西抹，自己內心無一定的把握，而又輕於嘗試。

張先生這幾點意思，真所謂「卑之毋甚高」，你說這不是一個領導政治的人物所應具的資格嗎？當然他一點也沒有錯，確實是必須具備的；你說單單具備了這幾點，就真能領導今後的中國政治嗎？我却不能完全相信。

從我的内心深處說出來，我根本不承認一個真正民主國家，需要怎樣一個或若干個固定

的或法定的領導人物。盡管現代的民主國家，例如英美，事實上也確有人在那裏領導，可是像他們這樣的一種領導者，大抵都是由於他們的地位，能力，主張，行動，成績能够赤裸裸的與國人以共見，而得到多數人心之所向，於是乎無形中形成了他們中的某一個人或若干個人領導一時或領導一事的一種資格。像今天的史太林毛澤東之類本來一點也不「偉大」，一點也不「神聖」，一定要運用一種硬性的方法把他們硬造成偉大得無可再大，神聖得無可再神，這實在是這個倒霉時代一種最倒霉的事實，我們便根本不需要這樣的一種怪物。

照我想來，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物，應該是由於他種種逐漸具備的條件而自然形成，既不是由於若干人的擁護，當然更不是由於若干人的委派；他對國內與國際一切重大問題，一定要能本其所研究所觀察，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以供大眾的研討，不宜輕於動搖自己的信心，但亦必須同時具備得有接受別人意見的宏識與雅量；一個真正的領導者，不一定着重在取悅羣衆，毋寧說他有時是不惜反抗羣衆，或不憚煩的去轉移羣衆；凡一個真正的領導者，對於一時代的人才，都必須具備得有一種強大而廣泛的吸引力，其主要的條件便是必須他自己確實具有知人之明，及與人合作之道，其吸引人才的目的，是為的事業，為的國家，乃至為的人類，而決不期待被吸引者作為他一己的工具，果其才也，雖反我者必用，如其不

才，雖親我者必屏，夫是之謂「天下爲公」；又不徒在吸引和運用一時的人才而已，一個偉大的領導者，更在他能製造出一個適於人才生存與適於人才誕育的環境，然後人才始能層出不窮而又往往後起者勝，一個國家的國運始能賴之以維持不墜；一個領導者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的行動，同時也在他的思想，他固然需要行人之所不敢行，盲人之所不敢言，確實也需要能見人之所不能見；在舊日的君主時代，有所謂「功則歸君，過則歸己」，一個民主時代的領導者，則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有過則引爲己責，有功則歸諸羣衆，以過夫歸諸他人，功則據爲已有，這實在是一種違反時代精神的想法。凡此七點，即：一、不必忙於以領導者自任，而在勤勤懇懃去從事耕耘，以靜待自然的收穫；二、對重大問題能提出解決方案，一面要有自信，一面也要能擇善而從；三、不宜把羣衆看得太高，也不宜看得太低，有時要不惜反抗羣衆，但最主要的是在轉移羣衆；四、要有鑑別人才與吸引人才的識量，尤其要有運用人才的正當目標；五、培養人才，爲一個領導人物效忠國家的最高職責；六、要敢於說，敢於做，尤其能深思熟慮，能洞矚一切事變於幾先；七、要能「爲而不有」，把所有一切的功勞，一一奉送給別人去！

今天的中國，確實是處在一個非常的時代，不僅是中國的歷史所無，即在整個的世界史

亦所少見，我們期待人才的誕生，與期待真正領導者的出現，大致是人心之所同然，因此除掉張先生的三點以外，我又補充了這七點，也許將來有機會能說得更詳細一點也不一定。

（四十一年五月七日）

反共基本要點

反共是確定的，理論上不能不反；事實上更不能不反。這已經無須多說。

反共是站在世界人的立場去反，決不單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去反；但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共產集團的一員，以打倒世界的共產集團為目標，中國共產黨自然包括在內。說中國人對於打倒中國共產黨，日本人對於打倒日本共產黨，或法國人對於打倒法國共產黨，其所負的責任要比中、日、法以外的人來得更大，更直接，這是講得通的，然而世界性總是世界性的。因此，不論在任何一個國家以內，發生了對共產黨的爭執或戰爭，我們決不能說：這是「內

爭」，或者說這是「內戰」。

世界的一切共產國家是一夥，世界的一切民主國家是另一夥；任何一個共產國家有權向世界共產集團要求通力合作，也猶之乎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有權向世界民主集團要求通力合作是一樣。以己之長，補人之短；以己之有餘，補人之不足；必須做得十分澈底，甚至有時連陳舊的國家觀念，主權觀念，也不能不有所修正。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站在民主集團的一方，或共產集團的一方，假定忘了團體的利益，而處處只想逃避責任，或為自己爭取較多的好處，這不僅對團體是一種損害，也可能斷送自己國家的前途。就目前的情況說，共產集團的一面，失之束縛得太緊；民主的一面，又失之於拘束力太鬆，這是由於兩方面的基本理論與出發點不同的當然結果。可是太緊與太鬆都是一種很大的毛病，也可能成為將來任何一方失敗的基本原因。我們站在民主的一方，就在今天，也已經感到這種太鬆，太隨便，太遷就的事實，有加以矯正的必要了。

今天蘇聯對於其衛星國家的援助是相當審慎的，甚至有所予的時候，也必有所取，總想把她自身的力量，經常保持在一種有餘不盡的狀態中，以留作將來最後的使用。美國不然，她一向總是很大方的，在第二次大戰中的租借法案不必說，就是近年的馬歇爾計劃，以至今

天不斷的向各方的援助，好像還是保持過去一貫的作風，中國有兩句話說得很好：「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美國人對於財的觀念，不單是勇於聚，同時也勇於散，這確實是一類決絕大國之風，也就正是美國今天所以造成民主集團領袖地位的最基本原因之一，這在美國自身的立場說來是很對的。可是在接受援助的一方面卻不然：我們千萬不可以為美國的金錢與物資，真是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誠然，美國今天確實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一個最富有的國家，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今天這個時代，也確實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一個消耗力最大的時代！蘇聯政治局的一班巨頭們，天天正在那裡勞心焦思，想盡種種的方法，其最主要的一個課題之一，便是如何消耗美國，他們以為：只要把美國的經濟拖垮，或引起美國經濟上一度空前的紛擾，便算是對世界革命的過程，邁進了一大步，甚至有使得民主集團不戰而屈的可能。因此，站在我們的立場，不單只應該愛惜自己的力量，同時，更應該愛惜美國的力量，假定美國要求接受援助的國家，對於金錢與物資必須有明確正當的用途，或進一步的要求，由她負起一部分稽考和支配的責任，這也並不算是過分。

上面的一番話，我的意思在說明兩個基本概念：其一，反共的出發點是世界本位而非國家本位；其二，民主集團的內部須相互尊重，相互諒解，對物力尤須特別撙節。以下我想略

談反共的方法

反共的方法好像是千頭萬緒，可是大別言之，不外武備與文事兩端。

今天反共集團擁有強大的武力，想在避免戰爭的方式下以求得侵略的制止，盡管不失為是仁者的用心，可是事實上却絕對的辦不到。他們天天在那裏製造戰爭，發動戰爭，却依然要藉高唱和平以資掩護，可見至少在今天以武力對付共黨，還是有效的。民主國家的團結無間只能求之於大戰已起，和平幻想已經消滅以後，在今天這個大戰將起未起，而和平希望依然不絕如繩的時候，便可能弄得民主國家在步驟上夜長夢多，不只是示人以弱，而且可能在未來的戰爭中為自己留下許多漏洞，給予敵人以暗環抵隙的機會。今天就大勢看起來，民主國家一面是利在速戰，而共產一面卻是利於久拖，但是要打卻不能如今天韓戰這樣的打法。我在「自由人」出版不久的第五期裏已經說過：「與其攻瑕而待堅者瑕，不如攻堅而使瑕者渙」，這個意思是說明要「擒賊擒王」，決不能讓蘇聯永遠逃避戰爭的責任。後來，我又說過（第十九期）：「假定大戰終於無可避免，我便不贊成從亞洲或歐洲先後來打，而贊成在歐亞同時打」，這是要給予蘇聯一個在她的歷史上不會遭遇過的難題，同時也就是要證明蘇聯是世界人類的公敵，可惜我這個意思，還只能從美國方面發現麥克阿瑟和魏德邁等極少數

人的共鳴，其餘的却還是徘徊觀望，舉棋不定。截至今天為止，我依然承認民主一面的武力大於共產，可是共產一面是有計劃的拖，民主一面却是無計劃的拖，甚至依然抱着一個和平幻想在拖，這却是非常危險的。

說到文事方面的反共，這應該涉及教育、文化、宣傳、組織、情報的種種方面。而且不只限於戰時，必須着手於戰前，繼續於戰後，然後才能收反共實效。這個話說來太長，我想另用一個題目，留在將來再說。

(四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總要靠我們自己

整個人類命運已陷於一非常狀態。

由世界固有的，新興的一切民主國家，起而為一種堅的團結，以與一落後的，反動的，陰狠的，殘暴的侵略集團相抗爭，以求得人類自由的確保，世界秩序的重建，能不必訴諸戰爭，自以不戰為是；萬不得已非戰不可，即亦不惜賭乾坤之一擲；這個使命確實是異常偉大而莊嚴的。

可是，世界二次大戰的結束，還不過六年，戰敗國家，尚有待於重建；即戰勝者，亦復

總要靠我們自己

元氣大傷。惟有蘇聯的情況比較特殊：一部份在歐洲的國土，雖然也會遭受重大的損害；但在亞洲，則僅參戰六天，而所獲甚豐。加以戰後不獨並未復員，且更加速備戰；又抓住中國的弱點，運用其爪牙，一舉而囊括整個中國的大陸；於是越南的紛亂因以造成，韓戰因以爆發，其餘世界一切已發或將發的動亂，也莫不直接或間接與蘇聯有關。

蘇聯是惟一強大的敵人，也就是惟一威脅人類自由的罪魁禍首，其餘均不足道；只要蘇聯對付得下去，世界的一切糾紛，均可迎刃而解，蘇聯對付不下去，世界即將永無寧日。我在這裏所指的蘇聯，僅指控制蘇聯的一個黨，尤其是執持這個黨的少數渠魁，與其餘蘇聯近兩億的人民並不相干，毋寧說蘇聯這近兩億的人民，也應隨民主集團的勝利，而得到他們應得的解放。這個目標是最宜確定，而且是最應該分別得清楚的。

美國是民主集團中，一個得天獨厚的國家，所負的責任最大，所受共產集團的攻擊也最烈。今天世界上除美國外的一切民主國家自英法以後，幾無一不有賴於美國的援助，即不需要美國的軍援經援，至少也需要美國予以精神上的支援與確實可靠的保證。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予者與受者之間，受者與受者之間，均應該有以善於自處。民主國家力量的加強繫於援助者甚大；但團結能否加強，則繫於援助者甚微。如不幸非進入一種戰爭狀態不可，或明

白認識已接近戰爭的前夕，各民主國家即有分別派遣代表構成一代表團，集中於華盛頓的必要。其個別的責任在增進美國對各該國各方面的了解及促進美國認識在援助上的切實需要；其集體的責任則以增進民主國家間相互的了解為主。其性質是互信，坦率，諒解式的協商，而不必斤斤於開會的形式，非在特別情況之下，幾無開會的必要。其人選須以明瞭各該國自身的實況，而又能博得對手方的信賴者始為合格，決非目前各民主國派遣出席聯合國的代表所能勝任。這是將來民主集團團結無間，及一切成敗利鈍之所關，在擊敗敵方一切挑撥離間伎倆的一點上，其關係尤為重要。

其次，我必須談到自由中國對美援一些應有的看法：有不少的人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以為沒有美援則萬事皆休，有了則萬事皆足，實際的情況却不一定這般。今天中國大陸的情形，確實是非常嚴重，他們的「一面倒」，比起蘇聯其他任何一個衛星國似乎都來得更為徹底，好像為了所謂共產或所謂世界革命，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悲劇，已在大陸加速的展開，不僅多數善良的人民正在成批的被屠殺，而且歷史已在被改造，文化已在被摧毀，倫理已將被滅絕，一切高級或低級的宗教，也將掃蕩無餘，更加上中共對所謂土改問題的胡謬，一個普遍的騷動與空前的飢餓，也勢將無法遏止而必然到來。一個單靠軍事可以解決的

問題，我們可以仰賴美援；一個超越軍事的問題，我們即有大宗的美援，又將從何致力？像上面所舉的那些情形，如果給了中共以機會，讓它再有兩三年去繼續其屠殺毀滅的工作，則中國社會所賴以結構，國脈所賴以綿延的主要條件，均將被他們破壞一空，而這個東方的文明古國，勢將非返於生番野蠻的原始狀態不止，即令我們在軍事上以美援而僥倖可以逐漸成功，但回返在那樣一個伏莽遍地荆棘滿途的大陸上，我們將何以立國？在對大陸的軍事行動開始或中止以後，美國可能繼續予我們一時期救濟性的援助，但立國基本條件的建立，這總是必得靠我們自己的。

我很憂慮，也許是過慮，好像在台灣和在台灣以外的多數自由民主人士，他們在今天所目督心注的一個問題只是在美援的如何取得，而對於如何重建與創造立國條件的基本工作，似乎還沒有切實加以思考。這是一個繁重而艱鉅的課題，決不是等到回返大陸以後，臨時可以急就，更決不是虛應故事找若干人來設計設計，就可以得出結果的。時乎時乎，我們對反共，抗俄，建國作進一步的深刻考慮，實在已經是時候了。

(四十年六月九日)

俄帝真是可怕嗎？

盡管世界和平所遭受的威脅一天天趨於深刻而且普遍，盡管在遠東一個還不能算大戰的戰場，在不到九個月的時間已經造成近百萬的傷亡，可是世人祈求和平的希望，並沒有輕言放棄。

不錯，和平是人類衷心所期待的，這一點我們決不加以否認。

盡管史太林也說：「至少戰爭在『目前』還是不可避免的」；盡管在蘇俄境內連提到戰爭一名詞也要加以某種的處罰；可是戰爭的陰影，曾沒有片刻停止給予人類以精神上的侵擾。俄帝真是可怕嗎？

襲，以致舉世惶惶，不問居住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人們，也莫不朝夕惴惴憂慮着戰爭的爆發就在今年，就在本月，甚至就在明天！而且事實也告訴大家：在東方的一個半島上，戰爭早已在那裏進行，以一個縮小的世界戰爭形態在那裏進行；也還有若干地帶，或者是若斷若續，始終打得沒有停；或者是磨拳擦掌，一觸即發。那些遍布在全世界以製造殺人武器為事業的工廠，在過去的四五年之間，本來是局部的已經停頓的，現在又已重振舊業，而且在推陳出新，不只在繼續製造，而且在加速製造。還有，那些精明強幹或已鬢髮皓然的學者，老師，他們本來可以以他們研究的所得，從宇宙奧祕的深處所尋求得來的發現或發明，全部貢獻以增加人類幸福的，可是他們現在依然只好埋首於研究室，埋頭於顯微鏡，以從事尋覓那些更精良，更有效的殺人武器！我們眼看見一大羣一大羣天真活潑的青年，已經是或準備着趕上屠場，有如待罪的羔羊；我們眼看見一大羣一大羣良善無邪的老弱婦孺，已經是或準備着陷入順流流離，宛轉就死。

在今天，人類追求和平的熱忱，可以說是空前的；同時，人類痛感戰爭的威脅也可以說是空前的。為什麼把我們陷於這樣的一種矛盾，原因究竟在那裏？

很簡單，祇要你不是耳無聞，目無見，一說你便可以明白：世界上有一個人所共知的魔

窟，那裏有一羣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說他們真有一種什麼足以自信的學說那是騙人的；說他們真有一種什麼熱烈追求的理想，那也是欺罔的；他們的目的，在打倒別人，以成就自己；在擾亂別人，以安定自己；在削弱別人，以加強自己；他們覺得，人類數千年來所積累，所選擇，所改進的文化，都不算是文化，只有他們的那一套，才是可寶貴的真正文化；各國數千年來所建立，所推行，所則倣的制度，都不是良好的制度，只有他們的那一套，才是最理想的優良制度。你們不肯放棄你們的去接受他們的，他們便要打擊你們，詛咒你們，造謠中傷你們，離間挑撥你們，甚至以武力威脅，征服，毀滅你們！想在你們與他們之間去建立和平，這是由於你的無知；想在你們與他們之間保有自由，這是由於你的錯覺；以為在你們與他們之間，還可以共圖生存，共策進步，那更是由於你的愚妄！他們是一羣充滿自卑感的人們，他們一直在妨礙你們之所有，而羞憤於他們自己之所無，所以他們寧願生息於一種不同形態的文化，不同結構的制度之下，以掩蓋他們的卑劣而發揮他們的自大，貌似堅強，實際脆弱；貌似充實，實際空虛；他們之所以要深深的隱藏在漆黑的鐵幕後面，實在是由於它無可與人以共見；其所以要閉塞他們的人民，不許與另一世界去接觸，實在是由於他們所享有的，所思索的，所營運的，幾無一足與他人比短較長！他們才真正是一隻「紙老虎」，我們

深信不疑他們是可以被打倒，被擊潰的，而且「擒賊擒王」，不首先搗毀這個魔窟，乃欲枝
枝節節而爲之，其結果是浪費時間，浪費人力，浪費物資，而適足以中其詭計！

你們以爲只要擁有廣大的土地，就是一個不可戰敗的國度嗎？拿破崙的時代，希特勒的
時代早成過去，原子時代，是無所謂不可克服的廣大空間的。

你們以爲只要擁有衆多的人力，就是一個不可摧毀的集團嗎？在原子彈的投擲與射擊之
下造成百比一，千比一，萬比一的死亡率是僥幸可能的。

你們以爲他們真正擁有更多更好的原子武器嗎？果然如此，他們決不會嬉皮笑臉，時硬
時軟，時緊時鬆，藏頭露面，盤馬彎弓的拖到現在！

你們以爲他們的祖國與藩屬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真可以堅強團結
無懈可擊嗎？「連雞不可共棲」，事實恰好相反，只要魔窟一經動搖，行見一切狐穴狗洞無
不紛紛瓦解！

假定你確實認定大戰是終於無可避免的，則與其遲發而禍大，不如速發而禍小；與其攻
瑕而待堅者瑕，不如攻堅而使瑕者潰啊！

(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美國的如意算盤

最近，由北韓放出的和平空氣，即期待和平基盤的美國國務院，也知道只是一種宣傳作用，沒有加以怎樣的重視。反之，在麥克阿瑟去職以後，美國對於遠東的布置，却絕對的沒有放鬆，下面幾件具體的事實，便完全代表這樣一個趨勢：

(一) 對日和約的訂立，已在加速的進行，這件事美蘇間可能還有一個時期的糾纏，但終於不能妥協，其結果則除掉蘇聯以外，大致可以陸續參加。中共政權必被排斥。台灣的意見被重視的可能性很小，為台灣計，即令和約內容不盡如理想，但隱忍持重，是台灣目前一

個比較安全的自處之道，能够做到參加便算是成功。以時間論，假定和約在本年内能够完成一切手續正式成立，便算是很好，但仍須附上一個蘇聯與中共不採用非常手段加以破壞或延宕的條件，（二）一個以美澳紐三國為倡首的太平洋安全協定可能先日約而成立，日約訂立以後，則中日菲韓可能被邀參加，將來因局勢的推移，參加的方面且可能更加廣泛。這個協定有兩個主要的意義，其一在加強太平洋的防共陣容，又其一則在減輕若干國家對日復興以後的威脅感，即美國亦未嘗沒有藉此以約束日本之意。這件事美國所採的步驟相當謹嚴，英法均將迎以好意。（三）關於日本的安全問題，在日本的武裝還沒有完全恢復到足以自衛的程度以前，美國是不會放棄責任的，但在和約成立，過去以盟軍管制日本的形式結束以後，美國在日本本土的駐軍，將緊縮到一個必要的程度，而把防守日本及維持日本國內秩序的責任加之於日本自身，美國所特別注重者，將只限於日本的附近，例如琉球羣島，尤其是沖繩島；其兵種可能以海空為主，陸軍僅屬次要。（四）一個包括三百個左右人員的美國軍事代表團，有被派遣前往台灣的可能，若干補充台灣軍隊實力的軍用物資，也可能由美國運往應用，但如何具體化，則似乎還有待，這件事截至目前為止，我們還只能意識到這是美國要加強台灣的防禦，以實力遏阻中共任何奪取台灣的企圖，不能便看作美國積極協助國軍準備。

作反攻大陸的一種措置，大概除等到美國被蘇聯逼迫得非應付大戰不可的時候，協助台灣去反攻大陸的可能性極小，也許幾乎是不可能的。

凡以上的種種部署，在美國以艾契遜馬歇爾為首的若干政府當局，以為只要假以相當時間，等到各方的實力充沛，配合妥貼，便可以把蘇聯在亞洲發動第三次大戰的災害消弭於無形，而目前在韓國還繼續進行的戰爭也就沒有一定要擴大到韓國以外的必要了。這雖然是美國若干政府當局主觀上的如意算盤，可是這次杜魯門總統其所以不顧一切毅然決然把麥帥撤換，實在便是從這種如意算盤出發，這幾天來杜魯門布萊德雷艾契遜等所發表的種種言論，也就不外在說明這樣一種旨趣。制止麥帥那種比較近於急進和主動的主張，改為一種比較緩進和被動的主張，是否就可以變更蘇聯的基本態度呢？在我們看這種可能性是絕對沒有的，但把蘇聯發動大戰的時間表稍稍移動却有相當的希望。可是，即令能把大戰延緩到一年或兩年以後再行爆發，其對於美蘇和歐亞的利害得失，畢竟很難計算：例如日本和西德武裝的重建，蘇聯將不惜採取種種的方法，以從事阻撓與破壞；中共政權的穩定，與蘇聯對中共的控制，均可能加強；韓戰無法中止且可能加劇，其對於美國人力與物資的消耗，必大於蘇聯的本身；時間對蘇聯在消極防禦上的加強，與積極作戰上力量的充實，均極為有益；民主方面

若干本來畏戰而不大緊張的國家，可能因這種一時的苟安，更趨鬆懈，而美國在體制與態度上，又無法如蘇聯之可以放手干涉其衛星國家；蘇聯利用這一空隙的時間，更可展開和平的宣傳攻勢，以瓦解民主國家的戰志；除韓國外，原已在動亂不寧的區域，如越南，馬來亞，伊朗，等等，蘇聯可促使其亂象擴大。即在若干其他的區域，也可能發動新的事件，以使民主國家窮於應付；台灣如目前的現狀，不獨老師糜餉甚可憂慮，且可能令中國大陸上大多數宛轉於刀俎呻吟於牢獄的人民，感到非常的失望。總而言之，只要民主國家一方面的和平幻想，一天不消滅，蘇聯便有層出不窮的方法以便利共產集團的發展；美國的立場，在提掣多數的民主國家以圖自衛，其勢宜就基本問題求得合併的解決，合併則需要的時間短而團結力可以加強；蘇聯的立場，在分別發動其衛星國家以造亂，亂象愈複雜愈普遍，則所歷的時間愈久，愈可能把民主國家拖得精疲力盡而陷於離心離德，而蘇聯乃可坐收最後一擊之效！

戰爭的原則在以「多算勝少算」，我們總覺目前美國政府當局的決策，是確有重加考慮的必要的。

(四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美國政策與臺灣自處

麥克阿瑟主張用台灣的國軍去反攻大陸，美國政府方面則一再重申對台灣的政策不變，換言之，即由美國海空軍予台灣以協助，使她得到中國大陸上去與中共作戰，也是美國政府認為可以引起大戰的一端。這幾天馬歇爾出席美國參議院軍事外交委員會聯席會議，對麥帥的主張種種有所答辯，其一種戒慎恐懼的心情躍然紙上。看來這位號稱了解中國情形的美國國防部長，從他的調停國共，到對國民政府的「一筆勾銷」，到整個中國大陸的淪陷，進一步更演成中國的善良老百姓死於戰爭，死於飢餓，死於鬥爭清算，死於轉徙流離，以至最近

死於大批的，普遍的被屠殺，至少已經超過了一千萬，似乎由他所堅持乃由他所主持的這一對華政策，依然還是不肯改變。

以蔡斯少將爲首的美軍事援華顧問團，到台已有多日，其工作似頗積極，由他們調查所得的第一批資料，日內即可向華府提出報告，將藉此確定軍事援華的範圍。美國這一舉措從樂觀的方面看，可以說是美國對華政策開始改變的轉機；但就中美兩方關於這件事的換文以及美國政府關於台灣的各種聲明加以檢討，則目前所謂軍事援華者，僅以防守台灣爲限，換言之，其主要目的，乃在鞏固美國太平洋上防線的一環，與解救整個水深火熱的中國大陸，尚無何種關係。

四月二十二日的紐約時報，美國軍事評論家鮑爾溫有一篇分析台灣軍事情況的論文，關於台灣軍隊陸海空的各方面，均有所論列，對於士氣，訓練，裝備，指揮權限等等，各有所批評，乃至由蔣緯國少將所指揮的裝甲部隊也特別提及。據作者的估計，台灣三軍的總人數不會超過五十萬，其強弱亦不完全一致，可是他的結論依然承認：一旦台灣能在中共統治還未鞏固的華南大舉登陸，還是可以獲得極有利的戰果。假定美國政府能根據軍事顧問團的報告，迅速加以補充，針對若干弱點切實加以補救，則這支軍隊對於未來反攻大陸必能發生更

大的作用，應該是毫無疑義。可是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是動用這枝軍隊的適當時機，其最後抉擇權依然不存於台灣而存於美國。「自杜魯門總統不必徵求台灣同意即嚴格指定其只許中立不許動作，這一個尚為世界多數國家所承認，且為聯合國會員之一員的政府，其在獨立自主之權的一點上，已經受了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而實際上台灣自身所得的好處，乃遠不如中共所得的之多，也為一不可掩蓋的事實。

截至現在為止，美國的對台政策僅如上述，在這樣一個不一定變而又可變的情況之下，台灣的自處之道，究竟是怎樣呢？

就我們大致所了解的：在過去的兩年的時間，台灣所最着重的工作，似乎僅在軍隊的整理與內部的安定，成效是有相當成效的，但精神上好像是過度拘謹，而缺乏進取。

兩年來的中國大陸已惡化到不成樣子，假定再拖上一年兩年，其惡化的程度只有加深，自屬毫無疑義。我們不知道針對大陸現實以準備如何收拾的這一點，是否已經下了多少切實的工夫？其所得資料或情報，是否十分可靠？

兩年來從大陸逃出上百萬普通的或政治的難民，其反共態度的堅定，似乎比較留在台灣的人們並無何等差別，我們不知道台灣的一切措施，除以直屬的七八百萬人民為對象以外，

是否對台灣以外超過一千萬的人民，也會略加考慮，或一聽其自生自滅乃至自求出路？

大陸上的游擊隊，雖仍在此起彼伏的繼續向中共鬥爭，可是所遭受的打擊也已經不小，台灣對於維護游擊隊的工作究竟做得如何？是否相當切實？我們所知道的情況實在太少。

道路傳聞，友邦對台灣的政治情況依然不能十分滿足，因而對於將來重回大陸的中國政治建設，也不無相當惶惑，甚至想別求所以補救之道，也決非毫無事實可指，這一點影響於未來者可能甚大，我們更不知道台灣對這一趨勢的思想如何？

上面所提不過就感想所及爲人所共見的略舉數端，其餘不願形諸文字或內容過於複雜的問題，還不知有多少。總之，放大眼光，展開局度，小心思考，大膽行動，台灣處在當前的環境，這樣一個態度，似乎是不可少的。

(四十年五月十二日)

遠東現狀與美國決策

遠東今天的種種糾紛，中國現在所受的種種苦難，追本溯源實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以武力侵略我東北始。由「九一八」到現在已經是整整二十年，這二十年間遠東形勢的演變，誠令人不堪回首：蘇俄勢力的逐漸滲透於遠東；中共在敗殘之餘的再起；中國領土的大部分為日本所蹂躪；國民黨政權的為中共所顛覆；英國在遠東地位的削弱；越南與韓國的戰火之無法停止；日本之由失敗而復興，雖復興而依然遭受莫大的威脅；甚至整個東南亞與太平洋之皇皇不安；以及美國傳統的遠東政策之發生動搖致引起國內空前的政爭而至今莫衷一是……

那一件事不是由日本侵略中國開始？

其所以鬧成如此的情形，原因自然非常複雜，但舉其大者，也不出下面幾端：

一、由於過去日本軍人太無遠識，根本不懂得日本無征服中國的必要，也無征服中國的可能，更不懂得必須有一強大的中國與日本切實攜手，即永無構成一真正足以安定遠東力量的可能。以致鬧到錯誤重重，誤人誤己。

二、在過去二十年間由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中國政權，日處於一種必須安內攘外的惡劣環境，其規模之宏大與風浪之壯闊，而人才與制度又舉不足以稱之，其興起也，固非倖致；其失敗也，亦非偶然。

三、清末民初，在遠東本為一英俄爭霸之局，日本則依違於二者之間。自俄國革命，中共興起，以迄國民黨之容共聯俄，英國在遠東的地位為之一變；日本發動侵華，又受史太林之鼓勵而擾及東南亞，英國的地位再變；自二次大戰後工黨秉政，側重於國內實驗該黨的主張，未遑遠略，世界霸權，已由美國起而代之，實為英國在遠東弄得如今天這樣捉襟見肘的近因。美國在遠東地位的這種變化，其所給予未來人類歷史的影響如何，這是後話，但變得太快，使遠東局勢，驟然失去均衡，就中國的情況看來，要為利害參半。

四、美國在遠東除經濟利益以外，其態度本來比較的超然，政策也比較的開明而穩健，自上次大戰結束的前後，既會以大力調停國共而遭遇失敗；又誤信非借重蘇俄則無以擊敗日本；更把管制日本與保護南韓的責任一肩承擔；於是使得美國對亞洲至少也負起了並不下於對歐洲的責任。美國近四五以來的對華政策，一誤於少數並無真知灼見或別有懷抱的所謂遠東問題專家；再誤於一二當局的感情用事；因此才把整個遠東陷到如今天這樣的岌岌不可終日。

美國近六年來以大力重建日本，完全是對的；麥克阿瑟以謹慎的態度執行此一致策，使得日本對美國發生了一種化敵為友的信心，其功尤不可沒。杜魯門總統毅然制止蘇俄所發動對大韓民國的侵略，這也完全是對的；及至中共介入韓戰，美國不惜領導聯軍與之週旋，不戰敗中共不止，更屬正義凜然。可是，假定只限於在韓國境內擊敗中共，而不能進一步顛覆蘇俄在中國大陸所建立的傀儡政權，這不僅是養虎貽患，而且使得中國的人民遭受無窮的損害，可能陷入萬劫不復。援助南韓，而不能以同等力量援助自由中國，這不僅使得援韓的犧牲歸於無效，而且將使得這六年來扶助日本的苦心不僅不足以為日本之福，或反足以為日本之禍。不能重建中日而促其切實提攜，即有太平洋公約，其力量也甚為微薄，可能使得美國

對亞洲的責任，永遠無法解除，這是今天美國確定遠東政策最應該注意的。

假定美國願於台灣以外，促成中國其他民主人士的團結，一面以加強反共的陣容，一面以促進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發展，這也完全是對的。可是假定運用不善，使此分別受到援助的力量相反相消，則可能使得美國的對華政策再度變成大錯，這也是今天美國考慮遠東決策的時候最宜用心體會的一端。

我們決不希望英國恢復以往在遠東的黃金時代，這是不必，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假定英國依然願意保持遠東這個殘破的舊堡，以成為世界民主聯合陣線有力的一環，這我們不僅不欲加以反對，而且樂於贊成。可是英國真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對遠東問題的應付，却不能不改近年錯誤的作風。英國以為一旦開罪了中共，即將使西方國家無法在亞洲立足，這完全是一種錯覺，事實剛剛與這個相反：換言之，假定英國以一種姑息態度，使中共政權一天天趨於穩固，則一切西方國家遲早真有不能不退出亞洲的一天，而且在這個與中共敷衍遷就的時候，也永遠不會給你一個痛快。英國當前所應採的態度：一、應與自由中國逐漸恢復友好的關係；二、對日和約，須從大處着眼，不必在若干的小利小害斤斤計較；三、英國最好能加入為太平洋公約之一員。過去美國對遠東的態度是超然的，英國却是進取的，因此美

國的遠東政策不妨遷就英國；今天美國對遠東是介入的，英國却是保守的，因此英國的遠東政策，應以切實與美國配合為合理。

最近美國因麥帥去職一事，引起一種空前的政爭，我們就美國若干負責當局的言論加以分析，實在感到美國的遠東政策依然多少有點舉棋不定，而且矛盾頗多，為一勞永逸，為重建世界的和平秩序，我們覺得已經是美國對遠東採取決定政策的時候了。

（四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frac{d}{dx}$

美國應有的決心

大家似乎可以放心：韓戰停火大致是可以停下來的，而且停火的期間，不會太短，可能有六個月以上；即令就不能全停，以後不再在韓國大打也不一定。但停火以後，究竟能不能談得好，就談好了又有不有用，這都是另外的問題。

在停火以後，韓國善後問題正在談判的期間，蘇聯在遠東，至少要把其他的兩個問題，繼續排列在她搗亂的程序上面，其一是日約問題，其一是台灣問題。爭日約將由蘇聯正式出面，中共從旁吶喊；爭台灣則由中共出面，蘇聯在後面撐腰。這兩個問題孰輕孰重，其決定

權仍然操在蘇聯之手。

是否需要中共進一步攻佔台灣，這在史太林只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換言之，假定中共去了台灣這個心腹之患，而在名義上真正做到了中國的統一，使聯合國也再無法拒絕中共成為聯合國的會員，甚至還要把中共提高到「四強」「五強」之一與蘇聯比肩的地位，這在史太林看來究竟對蘇聯是害是利，確實是一個問題。因此我們判斷：爲了台灣問題，蘇聯還是不願自己出面，頂多只站在中共後面幫忙；她也明知道美國其勢不能不幫台灣，中共攻台斷然不能得手；中共過去「援朝」，已經送了幾十萬人葬身火海；今天再去攻台，也不過再送幾十萬人葬身台灣海峽。可是蘇聯却絕對不會反對中共攻台，因爲中共去打台灣，至少於蘇聯有三種好處：（一）可以繼續消耗美國，仍不至爆發大戰；（二）可以加強中共對蘇的倚賴；（三）等到中共繼續遭受打擊，中共在北方的力量，一定調遣一空，然後西起伊犁，東至鴨綠江以北，無論名實，都將歸於蘇聯武力控制之下，這對於蘇聯貫澈亞洲政策，實有莫大的益處。

至於對日問題這却不然：日本的工業復興與武裝重建，這是阻止蘇聯在亞洲擴張的一個絕大障礙，斷斷乎爲史太林所不能容忍。他明知道美國對於簽訂日約已抱有甚大的決心，英

國即令在小節上還有些爭持，但終必與美國歸於一致，這是史太林所最懶火的一件大事。我相信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局已經有了一個最高決策。爲了澈底破壞日約，阻止日本的武裝，即令由蘇聯親自出面來爆發世界第三次大戰，亦在所不惜！

爲了要實行這樣一個決策，由馬力克在聯合國提出停火的建議，同時命令中共與北韓表示服從，便是第一個步驟。中共爲了韓戰，已打得疲勞不堪，可以讓她去休息休息，然後發動攻合，給予美國一種牽制。韓國這個戰場，不大適於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而北韓也實在需要得到一時的喘息；因此藉韓國問題的談判作爲掩護，至少可以延長半年的時間，然後蘇聯對遠東可以從速加強布置，以便自己親自出馬。因此據我判斷：世界的第三次大戰，可能於明年春二三月爆發於遠東，其主要的口實爲對日和約。

最近幾天美國的輿論，似乎對這樣一個趨勢也有了相當的警覺；昨天我和美國一家大報的記者談到這個問題，他也頗同意我的看法；究竟美國的政府對這樣一種情況如何決策，我却不無顧慮。

照我個人的看法，今天已經是美國應該下決心的時候了！

一、美國對日和約的內容，必須堅持到底，在韓國問題談判未結束以前，便須舉行對日

約的簽字。

二、加速日本的武裝重建。

三、加速裝備台灣，並以海空軍掩護台灣陸軍，使之在中國東南沿海登岸，不必希望一舉便把中共完全摧毀，但至少須使國民政府能在華南恢復兩省至三五省的地方，使他在地位上，人力上，資源上，能構成一個獨立作戰的體系，足以完全牽制中共，使她動彈不得。

四、醞釀中的太平洋公約，宜促其提早實現，不能以澳紐為限，必須加入日本，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英國如願參加應表歡迎。

五、在中國大陸第一步作戰的形勢，東北及華北的一部，可能由美日聯軍驅逐中共而完成軍事佔領；長江以南，可能由國民政府在美國海空軍掩護與物力支持之下，迅予光復，中共的殘餘力量，在蘇聯的協助下，仍可能立足於西北一隅，以待肅清。但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可能發生種種的矛盾，日本於此，尤須提高警覺，善為預遇。

六、韓國問題的根本解決，即完成一獨立，統一，民主的大韓民國，必須待中共潰敗，蘇聯退出遠東，並得太平洋公約國的絕對保證，始能實現，所謂韓戰停火以後的談判，也必須等到這個時候，才能得到自然的結論，否則只是廢話！

（四十年七月七日）

美國亞洲政策再檢討

韓戰也許終於會停下來，也許還要拖到聯合國在巴黎開會中作為共產集團的一個活用工具，這些都不是我現在所指意的，現在我只想就美國兩次三番來還就停火談判的心情，再作一次美國亞洲政策的檢討。

美國究竟有不有明朗的亞洲政策？我的回答是：「有」。

這種所謂明朗的亞洲政策是不是相當確定而不會繼續搖擺？我的回答是：「很難說」，必須看今後情勢的變化，和民主集團中其他有力盟國的基本態度。

依據現有的亞州政策，能不能達到美國「不戰屈人」的預期目的？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下面要就我的這三個答案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美國本來是一套傳統的亞州政策的，但確實經過一度模糊，也可以說是，幾乎近於放棄，現在則經過一番調和折衷，定下了一個「不許共產侵略繼續再向中國大陸以外發展」的基本政策了。

韓戰打了十六個月以上，美國寧願忍受絕大的犧牲，仍不願採用非常的手段以求得一個決定的勝利；現在既一再遷就中共只想把火停下來，其最大目的，不外想保持去年六月韓戰未起以前的原有態勢，並保證不復再有侵略的類似事件發生。這樣一種態度，自然可以說，極忍耐之能事了。

去年美國決定對韓用兵，同時則以第七艦隊開赴台灣海峽，既不許中共去攻台灣，也不許台灣反攻大陸，這正是這個基本政策開始確定時候的一個重要步驟。

在韓戰進行得正熱烈的時候，美國不顧對蘇聯與中共的刺激汲汲與日本訂立和約，而且接受其盟國的意見排除台灣不許參加；同時並與日本訂立一軍事性質的「美日安全協定」，

其目的也無非在遏止共產侵略向中國大陸以外繼續發展。

美國和澳洲紐西蘭訂立一個安全公約，其原始的意義本在安英國和澳紐之心，使其對日本的再起不懷恐懼而橫生枝節，致陷日約難於速成；但也未嘗不可更進一步來一個範圍較廣的太平洋公約，乃至包括東南亞的若干地點在內，這在英國也確曾表示過歡迎，不過時機還未成熟而已。凡此，也無非是從遠遠的布置一種共同防衛，使共產侵略不敢輕於超出範圍。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對於台灣的援助僅僅以有限度的軍援與經援為限，其力量也僅能保住台灣，盡管台灣當局隨時在表示要於最近期間反攻大陸，但所謂「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的說法，以美國不甚熱心之故，事實上也就只好延期了。假定美國僅僅只希望「中華民國」這塊牌子永遠掛在台灣那個孤島上面，則美國對中共的基本態度，又豈難於想像！

美國已歷次宣稱以全力援助越南，假定中共公然大舉援助越盟的話，美國確實是會要實踐她這種諾言的；因為這一點在完成她的亞洲政策固所必需，即加強法國對美的信心，於變成美國的歐洲政策也頗然有益啊。

根據以上這六點說明，已不難窺見美國亞洲政策的全貌，一般存着幻想的人們，似乎是

應該有相當的警覺了。

現在要進一步問的，便是美國對她這個亞洲政策的堅持限度究竟怎樣？很顯然，美國在過去所以形成這樣一個十分勉強的政策，所受英國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現在英國已不復是工黨內閣而為保守黨內閣，邱吉爾與艾登之流，其對亞洲未來趨勢的看法與打算究竟如何？英國對美國的影響只會加大，不會減輕，是我所深信不疑的，不過這個影響力量的內容，是不是會較工黨內閣時代有絕大的差別，當然很可注意，再加上美國自身競選宣傳，一到明年便會逐漸的趨於白熱，其足以影響她的對外政策，自不待言，何況其他地區的非常事變，足以影響到亞洲全局的，誰也不敢保其必無。因此，我們便質然認定美國這個政策不會發生變化或搖擺，這實在是一種鄰於武斷的看法。

現在姑假定美國就把這個政策繼續執行下去，甚至稍稍的加強，是不是就會使蘇聯和中共居然屈服？我堅決的回答是「不可能」。

(一) 只要中共政權繼續存在，蘇聯決不會放棄她這個足以赤化全亞洲的有效工具存而不用。

(二) 中共在韓國打了這一年以上的仗，固然死人不少，損失不輕，但究竟見了一次大

場面，而且居然與世界一等強國打了無數回合而終能保持一個平手。假定韓戰就是這樣馬馬虎虎的停下來，她不但不會承認失敗而且必定宣傳勝利，毛澤東會親口在延安對我說過：「我這幾條燭槍，可以同日本人打，就可以同美國打。」何如？這不是事實的證明嗎？因此，我們必須明白：這一年以上的韓戰，決不是中共武力的削弱，只是加強；決不是中共勇氣的減低，只是加大！

(三) 由於中共在韓戰中的捨得幹，捨得死，蘇聯對她的信賴，也只會提高，世間仍有不少的人以為中共與蘇聯可以分家，甚至以為因韓戰之故，中共內部可能發生變化，這些可怕的噩夢，實在應該醒醒了。

(四) 中日關係不可分，日本的復興，必須有賴於中國，萬一因美國這一政策之故，使日本陷於迷惘，或甚至不得已而與中共去發生勾搭，這不啻就是美國這一亞洲政策的根本幻滅！

(五) 今天在亞洲，已經有印度，印尼，緬甸等承認了中共，英國暫時也還不會把對中共的承認撤回；蘇聯既是對中共信賴有加，自然對中共的裝備還要繼續努力。今天在亞洲的反共陣線裡，還找不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更湊不足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可戰之兵，你說單憑

美國的拉攏與支援，就可以活活把一個有蘇聯作背景的中共封斂得了，誰敢相信？萬一在韓戰停止以後，她居然又衝到越南來幹上一年兩年，美國又有什麼必勝的把握？好，我不願把話說得太多，使一般高興做太平夢的先生們說我危言聾聽，但我必須再說一句：美國這個現行亞洲政策，即對中國大陸不敢以一矢相加遠，對未來的整個亞洲，整個世界，是可以遺禱無窮的。

(四十年十一月三日)

韓戰兩週年

韓戰演變到達兩年，以目前的態勢而論，只能用戰爭的方式去求解決，談判一定談判不出和平。目前為休戰談判之梗者，好像只剩一個遣俘問題，其實即令遣俘問題可以談出一個辦法，即令一時的休戰可以得着一個協議，與韓戰的基本結束，依然毫不相干。

中共這兩年來高唱入雲的是「反美援朝」，假定在今天休戰可以成功，聯軍盡管高唱聯軍的勝利，中共依然可以高唱是她的勝利；本來這個戰爭如果只是有限度打到「三八」線為止，要確定誰勝誰敗，確實也是很難的。一旦休戰實現，只要雙方的軍隊不撤出韓境，再來

開始談判韓國的善後問題，如果聯合國不肯公然出賣南韓，戰爭即依然隨時可以爆發。一個輕微的遣俘問題，尚且無法解開休戰的死結，韓國善後問題的複雜，又不知大於遣俘問題多少倍，說一定可以由和談的方式得出結論，豈不等於癡人說夢！

蘇聯年來所運用的一串和平攻勢，其目的在造成民主國家普遍的畏戰心理；蘇聯三年來控制着中國大陸，指揮中共在大陸所做出一切暗無天日的舉動，其目的乃在使得中國數千萬的壯丁除聽命從事戰爭以外，即別無方法可以生存。這兩者蘇聯都是做得很成功的：只要民主國家一天不斷念於和平，她即有辦法可以隨時隨地發動她的貓腳爪向民主國家詐索和平的代價。

單就美國一國而論，已經為韓戰場傷亡了十萬以上的青年，付出了五百億金元的戰費，但蘇聯却是不折一兵，不花一錢，依然高坐在和平之神的寶座，在那裏掀聲微笑！中共傷亡慘重，耗費也難於估量，這是事實；但這與蘇聯什麼相干？即令蘇聯已供給了一部分過剩的武器，但這是中共以賣國的條件去換來的，在蘇聯依然是只有便宜並無損失！而且蘇聯利用這次的韓戰，把國內屯積的次等武器出清，以便製造大量的最新武器，這對於未來的大戰也依然是於她有利的。總而言之，「大盜不操戈矛」，史太林實在是今日人類中惟一的大盜！

我們不「擒賊擒王」，以全力去對付這個惟一的大盜，而想以枝枝節節的方法，贏得世界的和平，豈不是被這個大盜玩於掌股之上！

即就韓戰談韓戰，假定在一年以前，聯軍即開始轟炸東北，同時以切實的方法，扶植華南幾枝有力的游擊隊，或直截了當解除台灣的中立，以海空掩護，聽其穩紮穩打，向華南逐漸推進，則不但蘇聯絕對不會動手，即中共要保持如今日的形勢也絕無可能，最低限度韓戰是可以中止的。不此之圖，一定要發明一個所謂「有限度的戰爭」，在一方面運用打仗的力量與作戰範圍「有限」，在另一方面布置戰爭的區域與儲積作戰實力的時間，却是無限；而且所謂「有限」云云者，亦甚難言之，試問美國在兩年間已傷亡十萬以上的青年，損耗五百億的戰費，假定休戰終於無法實現，即令戰場仍只限於韓國，不得已再打一年乃至兩年，則美國損耗數字的增加，又豈是我們所能想像！

中國舊時代有兩句老話：「工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天在美國真正明白遠東形勢，熟悉蘇聯心理，了解國共關係有資格的將領，依然不出麥克阿瑟與魏德邁等幾個「老兵」，美國在事實上既無採取魏德邁將地面部隊毅然退出韓國的主張，又不肯同意麥帥即令起境轟炸也不會引起世界大戰的看法，錯誤又錯誤，遷延復遷延，為了一個休戰談判，浪費了一年的

時間，使得中共又能集中到八十萬以上的實力，而蘇聯在東北一帶的佈置，也比前此加強，因為感到休戰無望，和平落空，而威脅乃一天一天趨於嚴重，於是不得已，才有昨天發動五百架以上的飛機大舉轟炸水豐電廠之一舉！

老實說，這在趨勢上，已經算是恢復到了麥帥所要走的這條老路，即令是否能澈底走上麥克阿瑟的路線尚不可知，但真要求得韓戰澈底的解決，終非順着這樣一個趨勢去做不可；可是時間又錯過了一年，麥帥所提出一年前轟炸東北決不會引起大戰的一個保證，是否依然有效，確很難說，最近艾森豪威爾說，假定他當選了總統關於遠東問題他依然要請教麥帥，這個話究竟是誠意的還是策略的雖不可知，但我們却依然同意麥帥的看法不錯。即令今天對東北對華南採取行動，或真不免有引起大戰的可能，但這在麥帥却並無責任，誰叫他們在一年前不實行他的策略，而一直遷延到今天呢？

(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日本往何處去？

在這世界暴風雨快要到來的前夕，日本究竟準備走向何處去？老實說，在今天，這問題還不是完全由日本自身所能解決得了的：第一、在去今十幾年前，由日本一部分的少壯軍人所鑄成的大錯，世人還沒有完全忘却；第二、對日和約至今尚未訂立，而且各方的所見，也還有多少的不同；第三、事實上日本今天還是在盟軍的管理之下；第四、日本經濟的全盤恢復，須以美英和中國的好意諒解為條件；第五、重建武裝，也不能在短時期內完全求之日本的自身。

就目前一般的情勢而論，日本顯然是向三條路線上同時發展：第一條路，就日本原有的憲政基礎，使之更趨向於民主，一切禍福榮辱，與世界的民主國家共之；第二條路，打破現狀，以革命方式，求得日本澈底的改造，必要時，向蘇聯與中共毅然「靠攏」；第三條路，不依存於任何一方面，亦不開罪於任何一方面，自力更生，埋頭苦幹，採我國春秋子產時代的鄭國姿態，以建立東方的瑞士為目標，對於世界暴風雨的到來，但求確保中立。

茲試將次序顛倒，就此三條路線，逐一加以檢討。第三條路線所謂把日本變成一個東方的瑞士，這不失為一個美妙的理想，就日本本土優美的天然條件論，是具有這個資格的。可是日本並不是一個小國，她擁有八千萬以上的人口，在第二次大戰中，失去了朝鮮，台灣，南庫頁島，千島羣島，大連，旅順，以及南滿洲鐵道一帶幾乎可由日本自由處理的殖民地；而日本本土的土地，並不是怎樣肥饒，一切地面的生產與地下的蘊藏，都是先天的貧乏，且不時有可怕的震災和風災，無論日本人怎樣的勤勞刻苦，終於要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日本既要把她的工商出品去換取其必需的生活物資和工業原料，則勢不能不與其他的國家發生種種利害錯綜複雜關係，不投入與人共利害的漩渦，而希望得到自身經濟上的充分滿足，在目前的世界上，決不容許有一個這樣的國家，何況今天民主與極權兩大壁壘的形成，已一天天

趨於具體與嚴格，「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否則即無異自外生成。朝鮮以雙方的爭取而分南北，德國以雙方的爭取而分東西，說日本這樣一個耐苦，耐勞，勇敢，痛快，饒有研究興趣，富於責任感，天然具備得有被人拉攏資格的優秀民族，而能始終保持其中立，那真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奇蹟。可見「瑞士路線」之不可通，是不待煩言而解的。

第二的所謂「蘇聯路線」，其無法走通更屬顯然：自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以來以迄今日，盟軍方面採取了一個最穩健而最有效的步驟便是對於天皇制的保存。在戰後五年之間，所有關於受降以及盟軍總部在日本的種種措施，幾無一不是通過天皇的名義去實行的。否則可能一切陷於紛亂，求有如今天這樣一個新生的日本殆不可能。今後，日本是否能團結全國繼續度過種種難關，也還要看多數日本人對維護這個制度的向心力如何而定。可是，與這制度第一個不相容的便是蘇聯。當世人已經把保留這個制度作為既定事實不容再有變更的時候，蘇聯依然在那裏曉曉不已，甚至要把昭和作為戰犯而加以審判。他們雖明知道這個主張不會實現，可是他們一定還要從國際間，從日本國內，運用種種陰謀來摧毀這個制度，以期削弱日本人民對天皇的信仰。幸而美國人對於這一點很懂得，至少格魯和麥克阿瑟這類的人很懂得，中國和英國更懂得，因此，一開始便沒有走錯，而且用天皇名義與盟軍管理的雙軌

制，把一個戰敗後的日本保育至今，使日本安然脫離了一個最危險的時代。我相信天皇依然是日本大多數人民信仰的中心，決不是蘇聯方面的任何邪說所能動搖得了，僅此一點，已足證明日本絕對的無法與蘇聯合流，除非日本人願意集體自殺！

從另一方面觀察，過去半世紀存在於日俄兩國間的深仇大恨，實在是無法解除。當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的消息發布以後，史太林便發表了他一段躊躇滿志的演說：

「我們老一代的人等待今天，已等了四十年，現在這個日子來到了。今天日本承認了失敗，簽訂了無條件投降書！」

其實，凡屬稍有歷史觀念的人，便了解史太林這幾句話不過是斷章取義的「丑表功」，而在此以前，史太林對日本所玩弄的，却是一整套的陰謀詭計！日本以甲午中日一戰的勝利間接的推翻了一個滿清；又以一九〇四年日俄一戰，間接的推翻了一個沙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運動，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後才擴大的，僅僅經過十二年的工夫，便把沙俄這個專制皇朝根本摧毀，日本僅是沙俄的仇人，對布爾什維克黨人毋寧說是有功的。可是，史太林清算對日的仇恨，一定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這一方面是在迎合蘇聯人民的民族心理，以鞏固自己的政權，另一方面這無異公開表示史太林政權對國際的基本精神本來與沙俄並無二致，

不過在實行政策的技術方面有若干的差異罷了。

試再舉兩例以證實史太林玩弄日本的陰謀運用是何等的純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一舉囊括了我整個東北，這本來與蘇聯的利害是不能相容的，可是，史太林欲擒故縱，不惜對「滿洲國」予以承認，且進一步，不惜把苦心經營二十多年的一條中東路亦公然賣給日本。凡此都在安日本之心，誘導日本於腹南進，一面去侵略整個的中國，一面更向東南亞去闖禍，史太林成竹在胸，知道日本樹敵愈多，其對蘇聯的威脅更愈減，而蘇聯爭取滿蒙，擴奪新疆，控制整個中國的把握便愈大。這一着史太林是完全成功的。德國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開始攻擊蘇聯，史太林在七十天以前，即同年的四月十三日，即以眼明手快的方式，從松岡洋右手中騙取了一個「日蘇互不侵犯協定」，解除了蘇聯東西同時遭受夾擊的危險。這一點，使軸心國的地位完全改觀，同時也就伏下了使日本遭遇慘敗的根子。我們還記得，當松岡離去莫斯科的時候，史太林不惜到車站送行，且表示一種最親熱的禮貌，與松岡實行擁抱，這是史太林所不肯加惠於毛澤東的。一個比較簡單的外交家，遇着這樣一個狡詐百出的對手，結果當然上當，而史太林乃得着了又一度的成功。

我為什麼要瑣瑣的敘述這些往事？因為我深知蘇聯有一大套魔術，將要開始在日本裏

演出來，我這個自來對日本抱着友好心理的人，實在不願眼看日本再去上蘇聯的當！第一、蘇聯必澈底破壞麥克阿瑟這五年來在日本所培育的日美好感，以期一舉把美國在日本的力量全部肅清；第二、蘇聯必強調日本的獨立，不許美國在日駐軍，更不許美國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第三、蘇聯可能提出一個對日和約的草案，解除日本的賠償，同時可能救毛澤東周恩來依樣畫葫蘆，免除對日的一切要求，甚至於，在口頭上還可表示退還南庫頁島、千島羣島，開放東北准許日本作有限度的經濟活動，但這些只限於口頭不會形諸約草；第四、蘇聯必發動日共及日本左傾青年，對日本朝野的親美分子大施攻擊，必要時更可鼓動工潮，以分化日本；第五、必繼續摧毀天皇的尊嚴，以瓦解日本人民的中心信仰。總而言之，非利誘即威脅，其手段將層出不窮，由蘇聯與中共派往日本的第五縱隊，可能潛伏於日本各方面大事活動。可是，我仍相信：日本的教育文化水準，比較中國為高，多數人民的中心信仰，不易搖動；美國對蘇聯的警覺已逐漸提高，必要時將不惜採用種種手段，以制止日共的活動；日本一般人民的生活已日趨安定與改善，其被煽動的可能性，已漸次減低；日本的財閥已化整為零，且已失去軍閥的憑藉，不復如往日那樣猖獗，致易為好亂者所藉口；中共在中國大陸一年來所表現的一切事實，無一可以引起日本人的欣羨；吉田內閣相當穩健，朝野亦相當融

洽。凡此種種，都不失爲使日本不容易走上「蘇聯路線」的一種有力保證。

「瑞士路線」既只是一種理想，「蘇聯路線」又崎嶇險惡，絕對的無決可以走通，然則所剩下一條坦坦大道，而爲日本今後所必循的途徑，當然便只有唯一的「民主路線」了。可是，日本適於走，應該走，而且現在已經在走的這條「民主路線」，是否就可以毫無阻礙的邁往前進而接近於光明呢？這要看日本自身的善處與決心，美國，英國，中國及英聯邦中的主要分子如澳洲，加拿大等的態度是否開明正確。我以爲大家既要拉上日本加入民主陣線，這意思就是說，要與日本恢復友好，而不是繼續把日本視同敵人。拉上日本之後，也不是爲民主陣線添上一個累贅，而是要她能够發生積極的作用。根據此兩大原則，過去曾與日本立於交戰地位的各民主國家所應採的態度，已至爲明顯：

- 一、我們應該拋棄蘇聯，以美國爲首的各民主國家，立即集體的或個別的，與日本訂立和約，不能繼續有所等待，也不能受任何拘束。
- 二、對日和約中凡足以阻礙日本恢復常態的任何條款，應一律予以刪除。
- 三、應從速使日本的經濟情況恢復正常狀態，不應加以猜忌或阻礙。
- 四、斷然接受前美國總統胡佛的建議，改組聯合國，世界兩大壁壘的分野，越劃得清楚

越好，並於此際歡迎日本重返於國際一重要國家的地位。

五、日本應有足夠自衛並參加民主陣線反抗侵略的全部武裝，陸海空須適當配合，不必附任何不必要的條件。

六、民主國家應通盤籌劃，使日本過剩的人口，能有和平移植的最大可能。

七、中國可歡迎美國的資本，日本的經驗與技術，英國的參與，重建東北，中國的條件為領土行政的完整，及參加重建工作的重要部分。

八、在中國若干指定的地點，可以接受日本移民雜居。

九、日本應打破陳舊的主權概念，毅然歡迎美國在日本保留若干足以防衛蘇聯威脅的軍事基地，至日本足以自衛時為止。

十、日本應以全力制止共產主義在日本的發展，並不應挾此作為向民主國家討價還價的工具，以自蹈玩火自焚的危險。

回憶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到達重慶時，我即在這一個晚上的十二點鐘以後，曾寫一信與當時在政府中對日問題能作有力發言的某君，希望政府於日本投降以後，立即表示寬大。我並且說：「日本這個八千萬的優秀民族，不是可以壓得死的，不出三

五年，日本必仍為國際所爭取之驕子！」去年蔣總統去職離京的一週前，我個人仍曾努力作此同一意義的活動。不幸人微言輕，而政府又自來缺乏接受先見的常識與雅量，以致蹉跎五年，在這方面的一切舉措，毫無顯著的成績可言。現在雖是太遲了一點，但如果有明白的認識，與毅然的決心，則仍可挽救於萬一。我們必須使日本自身對中國所持的態度與誠意有充分的了解，不應繼續以盟軍總部為我對日活動的唯一重心。

(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日本崛起的最好時機

遠東真正的危機不在韓國而在日本，而蘇聯之所以發動侵略，其目的也不僅限於佔領韓國，實在搶得先着，威脅美國使其不敢不理會蘇聯與中共而與日本簽訂和約。這個理由看來複雜，實際也很簡單：

(一) 只有對日問題，蘇聯與中共的利害才完全一致，一旦日本站起來了，不僅蘇聯的遠東區感受直接的威脅，中國大陸的沿海一帶，也幾乎沒有一點不可隨時被日本攻入。蘇聯命令中共加入韓戰，中共並不是不知道這是一件最吃虧的事，其所以依然不敢不服從者，也

還是因為蘇聯把預防日本作爲一個有力的理由。

(二) 蘇聯不怕台灣，中共也不太怕台灣，但他們所最怕的却是台灣這個力量與日本聯合，如此，則中共至少第一步非退往西北不可。

(三) 蘇聯和中共都知道：美國並無決心參加中國大陸的戰爭，但日本與台灣一旦聯合則美國非以海空全力支持不可，最後或仍須率入，如此，則遠東大戰的形勢以成。

(四) 人總是要受歷史支配的，俄國人在遠東是與日本正式打過仗的，而且打的是大敗仗，他們深知道日本確是一個能戰的民族。加以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蘇聯因人成事，投機取巧，乘人於危，僅僅只打六天的仗，而所得的却比任何戰勝國都多：一、整個東北包括旅大，二、南庫頁島，三、千島羣島。這些都是日本的生命線，蘇聯充分知道，日本對英美不能報復，對中華民國也必須言歸於好，惟有對於蘇聯，一旦有機會，日本却非報復不可，何況蘇聯是人類的公敵，日本打蘇聯更可博得舉世的同情呢！

(五) 日本有的是人力，而工業製造能力在遠東也是首屈一指，即令目前正式裝備好的部隊還不多，但經過訓練且富有在東北和整個中國大陸作戰經驗的士兵和將領卻非常之多，而且早已磨拳擦掌等待了多少年。以日本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地面部隊，配合美國最優秀的海

空軍，再加美國用最新武器予日本軍隊以充分裝備，這實在是史太林毛澤東一個不能不頭痛的事實。

(六) 蘇聯今天要以她少量和劣質的原子彈去破壞美國，並無何等把握，反之，美國以冲繩島，日本，台灣等處作基地，運用她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原子武器，即能予蘇聯和中共以致命的打擊，即不能予整個蘇聯以毀滅，但至少蘇聯必須退出遠東，中共政權必然歸於消滅，史太林和毛澤東絕對沒有辦法可以逃出這個惡運，已經是顯然的事實，除非他們在事前俯首屈服。

(七) 蘇聯在未來一次大戰的命運，大抵決於三種方式：(一) 最理想的是歐亞同時發動，而同時勝利；(二) 首先擊敗歐洲，而亞洲完全屈服，或以歐洲戰勝之師及歐洲的物力以對付亞洲；(三) 首先在亞洲失敗，迫不得已，乃在歐洲以求一逞，即能支撐若干時期，亦已得不償失，不敗何待？如果等待日約成立，日本武裝已到百萬以上，則蘇聯在亞洲失敗的命運已定，她如何可以不爭？

說到這裏，我更有一番理由，必須向日本人提出：(一) 日本過去一部分軍閥所發動對中國的侵略，完全是錯誤的，不僅無此可能，而且無此必要；因為日本有了這樣一個錯誤的

行動，乃種下了今天遠東的禍根，日本人是必得負相當責任的。參與民主陣線，並與台灣密切合作，以恢復十九年前「九一八」以前的原狀，這是日本復興唯一的途徑，也是日本補過唯一的機會。

(一) 日本今後仍須參與世界大國之林，必須過問世界大事，義務當前而想逃避，即無異自毀其前途。一種真正的災害，是無法可以完全逃避的，越想逃避所受的害可能越大，因此今天日本除挺身以當大難之衝，已別無其他的第二條路可走。

(三) 日本過去確實是戰敗了，但是敗於科學不如人，並不是敗於勇氣不如人，這一點我們完全承認。過去戰勝的國家，中國因為自身多故，在日本這六年的復興過程中，確實沒有給予日本多少有形的幫助，可是却給了日本不少實質的鼓勵，而且不會向日本施行過半點的報復。這次美國所提對日和約草案，中華民國實首先贊成，而且幾乎沒有附任何條件，這種精神便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日本也最能了解。至於美國，這六年以來，對日本之愛護提攜，真可謂無微不至，我們只一看麥克阿瑟元帥離去東京那樣一種黯然消魂的樣子，我們便可想像當年「江戶兒」的那種襟懷與氣概。今天在亞洲受赤禍最深的是中國，對防赤負責任最大的是美國，別人有好處對我而忘之，這是不祥的，這種東方精神，我也承認只有日本

人最能理解，當年東鄉元帥在對馬海峽一戰發出最後的命令說：「皇國興廢，在此一舉」，現在日本又面臨到這樣一個時機了，還更有什麼徘徊猶豫的餘地呢？

(四) 蘇聯是虎狼之國，你去惹牠，自然要冒着幾分的危險，可是這隻老虎却終於是咬人，你去打牠，牠要咬你，你對牠以笑臉相迎，牠也還是要咬你，到頭來不免一咬，又為什麼不三拳兩腳，把這隻吃人的東西給牠收拾得一個痛快，為人類除害呢？我相信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就在今天也還有多少留在一般日本人的血液裏邊的。

最近蘇聯對和約已發出聲明，說簽定日約如果沒有蘇聯和中共參加，他們便準備採取行動；一部分日本的俘虜，確已被蘇聯編入所謂國際志願軍；駐美的蘇大使潘友新，和駐東京七個蘇聯的軍事代表，已同時歸國；蘇聯在北海道以北若干地帶，已有大量軍隊的布置，也是事實；雖然依然帶得不少惆悵的成分，但蘇聯對日約不能不爭，却是很顯然的。

最後，我還得再說幾句：只有中日兩國同時復興，而又切實攜手，才是安定東亞的一個真正力量；也只有中日兩國與美英合作對蘇作戰，才有根絕亞洲赤禍的可能。

(四十年六月十六日)



對中日和約簽訂的感想

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和平條約，終於在昨天於台北簽字，我們細讀十四條和約本文，議定書兩項，照會第一號第二號，以及同意紀錄一二三四四點，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我們的外交當局在一個長時間的折衝商討中，雖已發揮其最高忍讓的精神，但仍能堅持其不可犧牲的立場，以完成中日間八十一來年關係的一新頁，要為近三年間中國外交活動上，一最可慶幸之事。

愚昧的中國共產黨，從她廢止中華民國國名及毀棄中華民國國旗的一天開始，便已完全

註定了她終被消滅的命運。吾人於中日和平條約的建立，又得到了一個顯明而具體的確證。

中日和平條約簽字，再加上舊金山和約的同時生效，日本確已完成了她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雖依據美日安全條約，美國仍須於日本保留一部分的駐軍，但此為事理之當然，事實之所需要，亦即今後一切共同反共的民主國家間可能互有的常態，對這樣一個情況不能不感到芒刺在背的，應該只有蘇聯與中共，決不是日本有知識的國民所值得大驚小怪的。

我們沒有理由反對日本在目前尖銳的國際環境中，在言論上與行動上，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但就日本與民主國家間已簽定或未來尚須繼續簽定的一串條約而論，則日本確已走上了必須與一切民主國家共同奮鬥的一途，而決不容其徘徊瞻顧。即令在日本國內仍有一部分為共黨宣傳所頗倒及一部分過度小心謹慎而心實無他的人士，想把這樣一個大勢多少的扭轉過來，但事實上將不能發生何等根本的影響。

史太林萬事都可忍耐，惟獨美國以無比的決心，從歐亞兩方同時加強其對蘇聯的防禦，緊縮其對蘇聯的包圍，尤其是日德兩國在東西的同時崛起，則到底無法忍耐。蘇聯駐美的大使潘友新，盡管在那裏指責舊金山和約為「非法」，盡管外強中乾表示決不撤退蘇聯佔領日本的軍官；盡管到了明天，周恩來也依樣畫葫蘆，對中日和平條約同樣來一次無聊的否認；

但這類空言之不足以嚇倒民主國家，也正如他們的武力之不足以嚇倒民主國家是一樣！今後蘇聯可能採取的行動，只有真誠屈服與瘋狂冒險的兩途，此外的任何姿態，都將歸於無效。

在亞洲，美英中日四國的正式攜手，再繼以太平洋公約的普遍成立，即無異敲起了蘇聯勢力必然退出亞洲的喪鐘；所謂蘇聯的真誠屈服，除非她正式放棄中共而聽其瓦解，否則即惟有訴諸戰爭！看樣子蘇聯在最近的過去，盡管在外交上，亦助在所謂冷戰的和平攻勢上，雖是一敗再敗而敗到不可收拾，可是對於武力似乎依然沒有完全喪失她的信心，尤其對於僥倖得來的一片中國大陸，她似乎也決無束手放棄之理，如此，即就亞洲這一局部來看，戰爭畢竟是無可逃避的。

日本吉田首相，於舊金山和約生效之日，一面強調表示日本願與民主國家合作以保衛世界的和平與自由，一面強調調整武裝以求得自身防衛力量的增長，這在原則上是不錯的；即在外交辭令上，也是很能動人的；可是世界的和平與自由是否能得到真正的保衛，須決於對蘇的一戰，亞洲和平的重建，更完全決於中共政權的根本滅亡，不把這個觀念澄清而加強其自信，加速其努力，則不惟日本當前的處境確實是荆棘滿途，即未來可供日本活動的天地，亦復異常的逼窄。

自然，在中日和平條約簽訂並生效以後，中日兩國自當互以平等獨立的兩個國家，而圓滑進行其通常的外交關係，可是我們當這個中日兩國正常的-new外交關係還沒有開始以前，有一個主要的觀念，我們必須在這裏鄭重提出：中日兩國依於地理文化的接近，經濟關係的複雜，兩國國民在情感上的交流，誠然在若干尋常事項不能不依據兩方的相互利害在相互尊重與親睦的原則之下而自求解決，可是另有一個絕對不可忘却的主要之點，即中日兩國今後的處境，實同為參與民主國家這一陣線的一員，其利害不是兩國單獨的利害，其關係也不是兩國單獨的關係，必須同時顧及此一陣線的共同利害與共同關係而極力避免其矛盾與衝突；推開窗子說亮話，今後在亞洲一切反共的工作，無論是戰爭的或類似戰爭的，其與此一事實有關無論其為間接或直接的任何安排，商討，行動，都必須與一切參與反共的民主國家共之，尤其對於與遠東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以及對反共在事實上立於領導地位的國家為然，而決不容許中日兩國單獨的低頭耳語或私相授受，以致產生任何謠言或決定的事實。這是我們鑒於當前國際的形勢，以及中日兩國過去的種種錯誤，而不能不提出的一個警告，希望兩方當局為着建立兩國未來的圓滿關係，以及我們下一代的青年國民的福祉，對這一點予以充分的注意而隨時提高其警覺。

在中日和平條約訂立以後雙方國民可能自動的致力之點，大抵不出兩端：其一比較是一時的，即我們如何來共同對付共產黨以排除我們兩個國家立國的共同障礙；其二是永久的，即我們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兩國國民間情感的交流上，如何來共同做一種比較基本而深遠的工作，以消除過去和未來的一切誤解，而積極的樹立一種必須要有也不能不有的親厚關係。這兩點要詳細說起來，真是經緯萬端，決不是這一篇短文所能詳盡，但有幾個主要的原則，却可首先提出，以為我們從長討論的基礎：

(一) 我們必須確認蘇聯在中國大陸所建立的政權，這不僅對中華民國是一個永久的威脅，同時也是對日本的一個永久的威脅，我們因此必須共同致力予以排除。

(二) 亞洲永久和平的重建必須以中日兩國的提攜為開始，也必須以中日兩國為基幹。

(三) 我們必須承認中日兩國相互衝突或相互猜疑，只於中日兩國有百害而無一利，並

宣以此旨趣去教育其國民，以謀於兩國間建立一個正常的心理狀態。

(四) 我們對一切一切，都要力求實際，而不尚空談，我們對於未來的和平世界，與和平人類，要先研究如何去「予」，而不必先著重在如何去「取」。

(五) 今後日本可能遭遇的困難，我們不應該把它看成只是日本的困難，同時亦即是中

國的困難；反過來說，日本對中國的困難，亦必以同一態度去體會之。
今後的中日關係，果能從這類基本原則去出發，我相信兩國一個共同光明的前途是決不會遙遠的。

(四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左舜生選集 時評集

目 錄

「毛周政權」與所謂「臺灣解放」.....	一
時局與人才.....	一
共產集團的狠處是不打！.....	一
我們對美國秘密的了解.....	一
孫案的歸宿究竟怎樣？.....	一
我們對蘇聯的一次突擊.....	一
二九	一
二五	一
一三	一
一九	一

從日本的政府改組談起

三三

關於和議

三九

英國留台大員談話的我觀

四三

談談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四七

看過「毛和尚」一篇長文以後

五五

分析章士劍的詩解剖章士劍這個人

六三

從庚子拳變談到清末政治

七五

爲邊界緊急事態敬告香港有力人士

八九

從日本動向看中華民國前途

九三

時事述評

九九

「毛周政權」所謂「台灣解放」

從去年六月起，中共開始叫囂「解放台灣」，在時間上已經快到一年了。除由美國壓迫自由中國送了他們一個大陳，並由他們奪去了一個幾百人防守的一江山島以外，中共便沒有採取其他任何積極行動。至於隔海開放幾砲，這是配合着這種叫囂的應有之義，當然不足重視。

我們老早說過：中共攻台只是一面「空大鼓」，其目的僅在構成一個緊張局勢，使「台灣問題」成為國際上一個急迫問題，更運用若干國際無聊的和平掮客向四面八方從事播弄，

「毛周政權」所謂「台灣解放」

把這個人爲的急迫問題，渲染得更爲急迫，他們便可希望不戰而有所得。

以中共當前的實力論是不敢戰，以經濟情況論是不能戰，以大陸的民心與士氣論是不願戰，周恩來在萬隆會議的宣言說：

「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向美國打仗。」

周恩來說這個話的動機是虛偽的，但這兩句話所說明的事實却一點也沒有錯。同時另外一個意義，從這兩句話也可看出：中共若干年來在大陸所做的反美宣傳，事實上是等於零，也可以說是無的放矢，換言之，即中國人民對美國依然友好，依然不願和美國打仗。

如果中共真要以武力「解放」台灣，事實上便非和美國打仗不可，中國人民既不願打，請問中共對這個仗如何打法？

這還是就大體說，就表面說，如果我們更作進一步的分析，則中共之不能以武力侵略台灣，亦即不能以武力與美國去碰，則事實上更屬顯然。

當前的所謂中共政權，實質上便是「毛周政權」。「毛周政權」的基礎有兩個：其一爲他們現有的武力，其一即所謂「統一戰線」，而黨不與焉。他們的現有武力不起變化，黨便無法抬頭；「統一戰線」有其需要，黨的力量便自然削弱。

今天最足以使得「毛周政權」發生動搖的，便是不顧一切居然以武力去奪取台澎，居然與美國去打仗。

要從自由中國和美國合作的手中去奪取台澎，決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至少得動員地面部隊的精銳一百萬，再加上現有全部的海空力量，而有效無效且不可知。萬一這一百萬的精英葬身海峽，全部的海空力量也打得零零落落，不復成軍，試問毛周所憑藉的這第一基礎，還剩下什麼？尤其首當攻守之衝的三野，如不幸全部犧牲，請問道位做了五年「總理」的周恩來，他還有什麼第二套把戲好耍？

這還是就失敗說，毛周已經要失掉他們這一有力的憑藉，非陷於十分的尷尬不可。如不幸他們這樣一次的對台侵略居然成功，那毛周便更加無可倖免的非垮台不可。

失敗對毛周不利的道理大家還容易懂，成功對毛周更不利的道理大家便不容易懂，且聽我再加分析。

美國現在的態度是容忍的，其所以容忍而又不得不容忍之故，不外兩大原因：其一是台澎還屹然存在；其二是英國不肯與美國切實合作。如果中共真以武力侵台，美國以條約關係到底非參加戰鬥不可；如果參加戰鬥而同歸失敗，這在美國便不只是一个面子問題，而是一

個關係自身的利害問題。太平洋的這條防線既已突破，日菲澳紐立即遭受威脅，亞洲南部更立即感到不安，到這時候，所謂英美間的歧見，將不復存在，美國繼續作戰的勇氣也必然增加，如此，則大戰的形勢已成，而蘇聯乃終於「不能袖手」。

大戰不起，蘇聯對中國大陸還只需要作有限度的侵略；大戰一起，蘇聯便要作無限度的侵略；等到蘇聯不能不憑藉中國大陸作為與美英所領導的「民主聯軍」的決戰之場，到那時候，今天的所謂「毛周政權」，便早已不復存在，起而代之者，乃為另一個與蘇聯完全一體的「新傀儡政權」！因此，侵台這一工作，就「毛周政權」看來乃是敗固不可，勝更糟糕，天下事情之微妙往往如此，可惜大家不去加以體會就是了。

以上還是就中共與蘇聯的關係說，至於說到「毛周政權」另一基礎的「統一戰線」，則與武力侵台的關係，乃更為微妙。本來首先背叛中華民國向中共去靠攏的，便是這一大羣統戰分子，周恩來憑藉這一基礎，乃居然維持了五年的「毛周政權」，這在另一羣人看來，真所謂眼中之釘，遲早必得拔去之而後快。可是只要台灣一天存在，所謂「統一戰線」，便無法使它毀滅。這羣統戰分子儘管也在隨聲附和，高呼「解放台灣」，可是他們內心明白：台灣千萬解放不得！他們的存在以台灣的存在而存在，「毛周政權」又以他們的存在而存在，

這個道理，毛周懂得，周愈來更懂得，一部分有腦筋的統戰分子也懂得，真不懂的乃是過去的「高饒集團」。時候還沒有到，他們便想動手推翻「毛周政權」，其被犧牲是活該的！

依據我這一種看法，台澎確實是安如磐石，美國只要謹守條約，用不着過度張皇，更用不着派遣地面部隊到台灣去駐紮。今天台灣所應該注意的，乃是以大力確保金馬，如果真有人勸誘自由中國放棄金馬，我們應該以堂堂正正的言辭去答覆他們：「金馬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依據中華民國的憲法第四條，非經國民大會決議，任何人都是沒有權去加以變更的！」以上的論點，僅就台澎金馬的保守立言，非所論於反攻大陸，真要反攻大陸，則除軍事以外，同時必須着重政治，政治不能澈底民主，即將永無反攻的可能，這是我們五年來一貫的看法。

(原載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自由人)

時局與人才

——反共成敗決於新人才的有無

時局仍在一種慢性的發展中，表面似乎是鬆弛，骨子裏却依然異常吃緊。

在本刊發行初期，我們便有一種共同的認識：知道反共問題的全面解決，決不是怎樣輕鬆，其第一期的計劃，便非有一個十年的打算不可。

我們也會認識：軍事是反共的主要因素之一，今天無論是共產集團與反共集團的任何一

國，都在對軍事力求精進，我們對此當然不容有絲毫的忽視。

不過，我們也會說過：反共比之抗日，其性質要複雜得多，換言之，反共不單是鬥力，而且必須鬥智；鬥力是戰爭，鬥智可能是一種更激烈的戰爭。因此，我們進一步的認識，便是除軍事的一個重點以外，如何使軍事以外的各部門，能與軍事取得密切的配合，並能個別發揮其最高的作用。

老實說：爲了應付今天這樣一個艱難局面，目前的人才是不够的；不只今天不够，即過去的五十年，也一直是不够；不過在當前這樣一個形見勢絕的形勢之下，乃愈顯其竭蹶就是了。

一、人才爲反共之本

假定我們把過去的六年撇開不算，從今天起，重定一個十年的反共計劃，其第一件主要的工作，也就還是在「人才的培養與運用」。

現在我想就這個問題，作一點比較具體的考慮：

今天衡量人才的第一個標準，應該祇談友敵，不談恩怨。這兩句話是老生常談，人人能

懂，也人人可以接受，問題只在能否實行。把「友敵」與「恩怨」兩者相提並論，分別友敵還相當的容易，完全拋開恩怨便似乎有些困難。我平常也會想到，以恩怨兩字應用在運用人才的一方面，在某種場合，實在未免言重：古今中外成功的政治家，大抵有一絕大的本領，即他們往往能「化敵為友」，而斷不肯「逼友為敵」，至於恩怨，却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人物所十分置重的。但中國歷史上有一種傳統的觀念，便是「人惟求舊」。這好比一個匠人運用一種工具，用久了，他總覺得十分合手，即有新的、銳利的工具，也往往不肯輕於一試。在這樣一種：合手不合手的觀念之下，去求人才，國家的事敗壞於冥冥之中，恐怕已經不少數啊！

二、人才之成由於歷練

學校可以培養人才，留學可以培養人才，訓練班也偶然可與人才的成就生出關係，可是
一個真正的人才的出現，畢竟有賴於事實的歷練。換言之，教育只能給予一個可能成為人才的基本條件，即良工能示人以規矩，不能示人以巧的意思。因此一個初出學校大門的青年，我們只知道他的書是不是讀得好，却不能斷定他是不是未來國家的一個人才；必須等他離開

學校，有了十年二十年的歷練，我們才能够加以正確的判斷。一個現代強大的民主國家，往往能够人才輩出（專就政治一方面看），這並沒有什麼巧妙，因為他們所實行的是一種多黨政治，在朝者不必永遠在朝，在野者也不必一輩子在野，人人有歷練的機會，即人人有成為人才的機會；同時，在朝者因有在野者隨時可以起而代之，即中材也不敢不力爭上游，在野者因必須訴諸國民的選擇，平日也斷不能不留意到國家的一切現實，因為彼此都須務實而不蹈空，隨着時代的演進，總隨時都有新一代的人才去完成他們每一時代的使命。

三、極權制度爲人才之敵

共產黨的極權政治不然，他們在事實上只容許一黨，即令環境的需要，不能不演出若干偽裝，但這也是過度時期的一種現象，其歸結還是以消滅異己爲原則。既然只有一黨，則政治的表現，便只能劃分兩個階級：一個是治者階級，一個是被治者階級。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才，到底無法歸於一黨，則國家的動亂必無已時；如果被治者不能永遠以被治者自甘，則國家也決無寧日。即令一黨果能集中多數人才，既不能以民主方式爭於黨外，也一定以陰謀詭計爭於黨內，這在最近的半世紀以來，也幾乎成了一種定律：蘇聯建國還不到四十年，流血

的清黨已不知經過了多少次；中共還不過是一個五六歲的孩子，但內部早已各懷鬼胎，最近的高餓一幕，不過是所暴露的一鱗一爪而已。就共黨談共黨，如果您承認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是人才，但您有什麼方法證明貝利亞、馬俞可夫便不是人才？如果您假定劉少奇、周恩來是人才，您又有什麼方法說明高崗、饒漱石一定就不是人才？所可惜者，他們是自陷於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因此他們便只能演出這種蘇聯式之爭、中共式之爭，而決不能變成艾森豪、史蒂文生之爭，艾登、艾德禮之爭，鳩山與吉田之爭就是了。據我想，一個人假定不是心盲或目盲，他對於這兩種制度的選擇，總應該是沒有猶豫的餘地的。

今天的反共工作已經是急於星火，我們還在這裏高談制度，高談培養人才、運用人才，豈不是近於迂闊？可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今後的反共大業能否成功？須決於有不有多數新人才出現，這個形勢已經是洞若觀火。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期待人才的產生與人才的共存，極權制度却只能有人才的戕賊與人才的對消，這也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四、反共友人的贈言

再抄我一段上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作為我這篇短文的結論吧：

「以來資資格出席這次在台北開會的亞盟，蘇聯的反共領袖波倫斯基對香港時報的記者于衡說：『我們決不贊成用共黨的方法反共，更不能用法西斯主義來反共，因為那樣人民會厭棄我們，像厭棄共產黨一樣的厭棄我們！』這個話真與我們五年來的言論如出一轍」。

共產集團的狠處是不打！

今天海外一般流亡人士的心理，我們大致是清楚的：

他們決不以確保台澎及中國沿海若干島嶼為滿足，他們所熱烈期待的，是終有一天能够
返回大陸。

自由中國在這六年以來，所用以團結海外人心的，便也正是這個「反攻復國」的口號。

以一般的形勢來說，自由中國可運用作為反攻的機會有三：一、世界大局突變，民主與
極權的兩方，終於找不出根本妥協之點，而卒致不能不以兵戎相見；二、中共自身，基於若

共產集團的狠處是不打！

干的矛盾而發生內漬，乃至分裂；三、大陸人民，不堪中共的暴政，不斷發生各種積極或消極的動亂，陷中共於無法鎮壓。

關於第一點，民主一方自動向人挑釁的可能性很小，極權一方，他們也充分懂得：他們那種束縛馳驥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最是缺乏人和，以之從事現代的戰爭，實在太無把握。至於說十年以來，武器特別進步，戰爭的破壞力過度可怕，因此相戒不敢以戎首自居，這反而是僅僅是不敢打仗的次要原因之一。

現在的和平聲浪，以極權一方叫得最響，他們這種畏戰的心理，實已情見乎辭，果然大戰爆發，首先潰敗的便是蘇聯，中共及其他附庸，當然也要隨之瓦解。大家看見上次大戰，蘇聯居然戰勝了德國，便誤會着蘇聯的戰鬥力真是如何的了不起，實際乃是希特拉犯了戰略上嚴重的錯誤，而又自信太深；同時蘇聯並非單獨作戰，乃是混在民主陣線中的共同行動；再加上日本又並不忠於軸心，不肯在東方與德國協力以收夾擊之效；否則這一共產主義的祖國早已壽終正寢，何至貽禍至今呢！

現在蘇聯眼見德日兩國均已復興，其重建武裝的心理又異常積極，而且都和民主一方拉得很緊，這實在使得蘇聯十分胆寒，因此她不能不抬出和平的幌子，以調整國際的形勢，而

中共以武力「解放台灣」的這一企圖，也就不敢不暫予放棄。當去年六月中共開始發動侵台的時候，我們便早知道不會有這麼一回事，因為這實在與蘇聯所處的國際形勢太不相容；中共可能根本沒有這種決心，即有，也終必被蘇聯加以制止。這一看法，有一年來本刊的文字可查，並非我們以事後諸葛亮自居也。

現在這一普遍的和平攻勢，與尼赫魯、狄托等的中立運動相得益彰，本月的巨頭會議，也不會和這一大勢相反。因而，自由中國想利用世界突變以從事反攻，這一機會，確已暫告消失。

其次，中共內潰的因素，確實是有的，而且不會不有，可是表面化還早。今天台澎金馬還屹然存在，朝鮮越南的統一無期，日本的態度未定，美國的壓力未鬆，中共內部總還可相安無事，或者他們會把一次的大清算，變為無數次的小清算（例如最近的高饒事件），以求得這一大潰裂的趨於和緩，也正難說。本來，中共的領導分子，如毛、周、劉這三頭，原也並無過人之處，但在此時即發動內部的衝突，確於他們不利，這一點常識他們是有。因此自由中國想把反攻大陸的機會寄望於中共的內潰，至少在最近的將來還是希望甚微。

復次，今天大陸的人民除少數在這五年以來經過中共特別泡製的青年以外，絕大多數對

中共政權十分厭惡，自屬事實。但中共政權的基礎為暴力與組織，也可說是有組織的暴力，蘇共三十多年來鎮壓所謂「反革命」的經驗，他們也確會經過一番學習；不有外面的反共力量進入大陸，說一類零零星星的反抗或破壞，便可給予中共以基本打擊，而不會隨時被中共加以撲滅，這便未免把中共的力量估計過低。

上面三點，我們僅就客觀的形勢，加以概括的分析，至於積極的對策，只好避免不談。因為根據過去數年的經驗，我們知道積極的對策，不會引起重視，而且可能被曲解為別有懷抱。

現在共產集團的一個總方針是孤立美國，中共的一個小做法是孤立台灣。其具體的行動可以看得出來的：一、除美國外，對一切方面都可表示妥協，必要時且可實行讓步，即對美國也還可因時因事加以不同的處理；二、擴大所謂中立路線，不惜對一般標榜中立的國家，特別表示親熱；三、從四面八方煽動反美的情緒，以種種方法擴大反美的事實；四、在歐洲積極的爭取德國，在亞洲積極的爭取日本；五、蘇聯對她的所有附庸，但求大體上的步調一致，一切小處也可相當的放鬆。說到中共對台灣的特別做法：一、凡可以分化台灣加強統戰的一切工作，他們還要積極推進；二、從海外各方面去煽動華僑，爭取華僑；三、力求打進

聯合國；四、對台澎乃至金馬，竭力避免施用武力；五、對東南沿海集中兵力，以打破台灣反攻的企圖；六、對海外各方加強貿易關係，以解救其自身經濟的窘迫，並減低別人對她恐懼。

以美國當前世界政策，尤其是亞洲政策，蘇聯覺得大可施展她的狡謀；以台灣的現狀，中共也覺得他們還大有運用餘地；以蘇共和中共這兩種做法配合起來，便是他們標榜的所謂「和平」！

總而言之，共產集團的凶狠處不是「打」，而是「不打」！民主一方，在不打的情況之下，吃了大虧，這真是活該！

（原載民國四十四年七月二日自由人）

我們對美國態度的了解

美國和中共的代表，仍在日內瓦繼續談判中。他們可以公開的談，也可祕密的談，究竟談些什麼，大家不會完全明白。

據我看，大凡可以公開的，他們一定盡量公開，例如繼續釋放若干留在中國大陸的美國平民聽其返回美國，或若干留在美國的中國學生，聽其返回中國大陸之類。可是中共其所以熱心於這次的談判，其重點並不在此，他們在開始談判以前，首先便把最為美國所關心十一名美國空軍人員釋放，這便是表示他們不願在這類的問題上多費時間。而只希望借着這次的

談判，進一步造成一個周恩來和杜爾斯會談的機會，關於這一點，王炳南也並不諱言。像這樣一種做法，中共是自以為十分聰明的。

可是，這樣一個明顯的趨勢，一即由大使級會議過渡到外長級的會議，乃引起中華民國的極度不安，輿論空前激昂，政府似乎也已向華盛頓方面有所詢問，要求美方澄清對於這一趨勢的真實態度。於是美方一再非正式的有所表示：他們說，美國和中共這次在日內瓦的談判，決不涉及「台灣問題」，或者說決不損害中華民國的權益。他們也說，美國和中共會談並不包含美國對中共即予以承認的意味，至於杜周是否可能在最短期間以內見面，此時自然更談不上。英國為配合美國這樣一類的聲明，也表示他們願意支持美國，把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問題，在本年的聯合國大會依然延緩討論，換言之，便是可再延宕一年。英國本來是主張中共加入聯合國的，至於印度、緬甸、印尼這類的國家，自然是惟英國的馬首是瞻，更不必說。英國在目前其所以採這樣一種穩重態度，無非在和緩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以免妨礙她對歐對亞的全盤政策，至於基本態度却是早經確定，決不因時間的拖延而有所變更。

我們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之下，是否可以得遇且遇的、再拖一年再說呢？果然如此，便等於聽天由命，靜待宰割，所謂延緩一年，實質上乃無異於「緩刑」一年，其危險確實是不堪

想像！

以我們所了解，美國的真實態度是很顯然的：

一、台灣是太平洋的重要基地之一，美國絕對不願輕於放棄（至少在韓戰爆發以後的情況確保如此），因此她對台灣的軍援，最大限度要做到台灣自身的武力足以自衛，必要時美國的第七艦隊並非不可撤退；經援則要做到台灣的近千萬人足以自活，不應因匱乏而使得該基地的秩序難以維持。換言之，便是請您吃饱了飯，拿着相當良好的武器，好好為我在這個基地上站崗，至於您在站崗的時候腦筋裏幻想一些什麼，她當然可以不問。有人把美國這樣一種態度完全解釋為美國的自私自利，我却不以為然：至少堅守南韓、日本、沖繩、台灣、菲律賓，乃至南越、星馬、泰國這一線，使共產集團的侵略不能繼續前進，總還是美國的理想的目標之一，至於依照美國的現行政策，這一目的能否達到，自然是另一問題。

二、「德國不統一」，便無所謂歐洲的和平，這一點，英美似乎已經有了共同的認識。至於「中華民國不統一」，乃決無所謂亞洲的和平，則英美的認識與決心，乃均感不足。美國和中華民國所訂的一個共同防禦條約，其時效祇限一年，而且連金馬也不肯包括在內，其無意於援助中華民國去恢復統一，態度豈不是非常明白！

三、美國基於已往的豐富經驗（例如斯狄威爾時代、馬歇爾時代），好像他們目前對台灣所採的態度，乃十分謹慎；凡是一切到過台灣的美國朋友，他們大抵是在軍言軍，在經言經，決不欲踰越範圍，使得他們的言論或行動，對於自由中國的自尊心，發生不良的影響。

可是，美國的若干輿論，或曾經到過台灣乃至相當深刻了解台灣現狀的美國朋友，在他們離開台灣以後，偶然和我們作私人間的接觸，他們却依然表示充分的不安。他們似乎覺得自由中國的政治、文教、宣傳，乃至爭取與國、團結僑胞等等工作，並不能與反攻復國的這個大題目，完全相應，自然更談不上機動與靈活。至於權力者與權力者之間，隱然有若干矛盾存在，在，則他們乃不僅不安，甚且進入一種憂慮。自然，他們這類的看法，決不欲與自由中國有現實政治關係的人員去談，即偶然和我們這些不相干的人說說，也還是極有分寸。他們當然知道我們是愛護中華民國的孤臣孽子，他們也可能假定我們所知道的比他們更多，他們不便多說，也無須多說。我個人近來每每遭遇這種場合，確實感到我們的這般國際友人，用心是良苦的。

四、依據上舉三點的分析，美國對自由中國的希望，似乎確有其一定的限度；他們和他的國家一樣，決不願看見台灣海峽爆發真正的戰爭，更無意挑動我們、贊助我們去反攻大

陸，甚至他們還假定：即令世界有了重大的變化，或大戰果真爆發，以台灣的現狀而論，也未必能作有益的運用。「兩個中國」之說，導源於英國，但依據美國這種心理的自然發展，她和英國形成一種不言而喻的默契，也並非無此可能。乃至英美還可共同假定：中共儘管口頭反對「兩個中國」，但在美國承認她和聯合國容許她加入的條件之下，周恩來也未嘗不可簽上「欣然同意」的四個大字。自由中國的強烈反對，是在她們意料中的，但在逐漸造成了既成事實以後，空言反對又有什麼用處？中共在目前確實想造成一個杜爾斯和周恩來談話的機會，要談的是什麼？一句話揭穿，便是這麼一件事！

上面這一番深深淺淺曲曲折折的說法，便是我們對美國態度或政策的一種看法，至於如何應付，則五年來我們在本刊已經說得很多，今後乃有待於羣策羣力，更有待於最高責任者的靈機一動！「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我們目前的心情，確實是這樣一種無可奈何，而又不忍忽置的心情而已！

（原載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十日自由人）

孫案的歸宿究竟怎樣？

自從所謂孫立人案發生以來，時間已達一月，即九人調查委員會的任命，明令也遠在上月的二十。截至現在為止，關於孫案內容，政府方面尚無半字發表；即孫案所由引起的郭廷亮等一案，好像是已經正名定罪，確認郭為「匪諜」，但辦理郭等一案的經過究竟如何？國民也毫無所知。正因為關於這兩案（實際可能只是一案）的內容國民一無所知，因此不免引起種種揣測，時間拖得越久，這類揣測便越來越離奇，如果不趕快得着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處理，這確實是於政府有相當損害的。

孫案的歸宿究竟怎樣？

本來，在中國的「政治哲學」上，原有所謂八字的心傳，即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是也；關於調查的技術，也有所謂八字妙訣，即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是也。好像過去的吳案與王案在當時確曾引起輿論界相當的衝動，確也會引起國際上相當的重視，可是事過境遷，除吳國楨曾在美國的報紙雜誌上大做其文章，對自己的處境有所說明，及對他所認為公然排斥他的人有所指摘以外，王雪艇先生則至今無半句申辯，即對他所熟識的朋友也隻字不提。這兩件事延至現在，總算是化小化無，已成過去，可是對一般國民所留下的印象，却相當深刻，及至這次的孫案發生，輿論界還往往拿它與吳王兩案相提並論。

平心而論，吳國楨沒有什麼了不起，其人品與能力，充其量也不過是「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假定不寄以方面之任，而要他在外交部做一位禮賓司司長，專司招待來賓，或積資做到一位常務次長，乃至做一個小國的公使或大使，總也還能够略有表現，決不如今日一般情況的糟糕！至於王雪艇先生則是中國學術界所公認的一位憲法學者，歷任大學教授、大學校長、參政會祕書長、外交部部長、總統府祕書長，素以穩重見稱，說他有時候穩重得未免過度，容或有之，但要舉出他有如何重大的過失，我却找不出任何的真憑實據，現在吳王兩位的政治生命，總算暫時告一段落，但孫立人一案的歸宿又將如何呢？

孫案與吳王兩案的性質微有不同，其原因便是他是一位高級將領，曾以上將的頭銜，做過長時間的陸軍總司令，且會參加過國際性的重要戰役，其地位為國內所周知，也為國際所注目；而我們今天的軍事，又確實是與一個友邦在密切合作之中，以利害共同之故，則教他們不予以關切，亦為事實所不許；因此，我不能不想到九位調查委員對國家對國民所負的責任是如何的重大！

在這九位大員當中，除何敬之先生至今留日就醫未能出席以外，其餘八位如主任委員陳辭修先生，他是一位國人所愛護的副總統，其地位的重要，僅次於總統一階，且會歷任重要軍職，軍紀之應如何嚴肅？軍心之應如何維繫？他當然知道得最為明白；如張岳軍先生，他是今天一位最高導演長，三十年來的政治，他是始終參與的一人，中國政治的癥結何在？國民所希望於政府者為何？他當然也比任何人更為清楚；如王亮晴先生，他是自始追隨孫先生參加革命的元老之一，且以法學權威為國際所知名，究竟在過去幾個月中處理郭案的經過如何？如有證據係以何種方法取得？如孫立人確與郭案有關，他究竟應負何種責任？我想他以法學者的見地，一定對國民會有一番嚴格而公正的交代，所謂「化小化無」、「有因無據」一類的搪塞敷衍是決不會見於這一次報告文書的；如許靜仁先生，他更是八十以上的高年，

對政治具有五十年以上的豐富經驗，而至今神智未衰，對國家在這半世紀以來的一切成敗利鈍，他即不躬與其役，也總是耳聞目睹，而晚節尤為此老所十分愛惜，得他毅然參加，自然更可增加國民的信心。此外如吳禮卿先生、俞大維先生、王雲五先生、黃少谷先生四位，無論人品、學問、經驗，也無不是各有千秋，而俞先生在這一屆的行政院中，尤其負國內外重望。他們決不會以僥倖了事，一定要獨抒己見，詳加討論，求得一個水落石出，以副國民的期望，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對這個案子，誠然不希望拖得太久，可是我們明白中外的明眼人尚多，九位大臣所交出的這本卷子，總希望十分審慎、十分週密，千萬不可留下許多漏洞，經不起中外輿論的批評，尤其不可給予共匪一個蹈瑕抵隙的機會！最近黃少谷先生答覆立委李公權先生的質問會說：「此委員會的任務，是鄭重的、莊嚴的，一定會努力的忠實的秉公調查，相信調查的結果，會絕對公正，並符合國家的最高利益。」黃先生說這個話，雖是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份答覆一位立委，但剛好他也正是調查委員之一，我們不但希望黃委員能說得到做得到，即對其他八位委員，我們也正抱着同樣的心情！

（原載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由人）

我們對蘇聯的一次突襲

這次中華民國不受任何國家的威脅，婉辭謝絕友邦的勸告，毅然決然否決外蒙傀儡加入聯合國，給予蘇聯一次嚴重的打擊，確實是一件最痛快的事。

尤其可笑的，乃是蘇聯着慌到手足無措，在她一律否決其他十三個自由國家入會以後，並且聯帶他四個共產傀儡也無法入會，自己知道所造成的過失太大，引起的仇恨太多，不得已乃把她的否決撤銷，另提一除日本和外蒙其他十六個國家同時入會的新案，以圖補救。蘇聯在聯合國，本來是一個行使否決權的專家，這次居然幹了這樣一回丟臉的事，聯帶代表一

個大傀儡的毛澤東同志也感到無限羞慚，一個代表腳踏兩邊船的鳩山和重光，也遭遇到輿論的嚴重責備，這確實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最精采的一幕。

不過，痛快是一回事；深刻檢討，以求今後立於不敗之地，又另外是一回事。從這一次我們在聯合國的成功，我覺得政府今後應該特別注意的有如下的各點：

一、這次我們在聯合國代表團所採的行動，雖然是基於全國國民一致的要求，執行政府堅定的決策，可是代表團為執行這一決策的一切表現，都能做到恰如分際，有條不紊，確實是值得我們喝采！我們知道，蔣廷黻代表不是一個有任何黨派關係的人，也不是一位由科班出身的職業外交人物，他乃是一位研究外交史和國際問題的學者、教授，這可看出關於外交人才的選擇原不可挾有任何成見。又，平日政府關於任何外交問題的處理，在號稱友黨的野黨方面，素來紀少與聞的機會，但在聯合國代表團中，却還始終保持了青年民社兩黨的兩名顧問，在陣容上究竟還像個樣子。

二、關於調整外交陣容，我們在本刊上屢有建議，尤其以駐日本和南韓的使節為然，我始終認定董顯光王東原兩位大使，決不能勝任處理日韓兩國外交的重大責任，甚至連觀察研究也談不上。我們知道，日韓兩國和中華民國在亞洲反共陣線的關係上是何等重要；日韓兩

國間的糾紛，以及日本對蘇聯和中共態度的舉棋不定，又是何等的令人慄慄危懼；可是我們在外交上關於這類問題乃不能有任何貢獻和補救，寧不令人扼腕！這次日本因為未能進入聯合國的失敗，乃立則決定把他們的駐美大使井口貞夫召回而代以谷正之，其駐聯大的觀察員加瀬俊一，也將被召回而代以駐加拿大使松平康更，他們關於處理外交人事問題這種斬釘截鐵的手腕，難道不值得我們參考，不值得我們警覺！

三、我們這次的否決外蒙，只是我們在聯合國闖過的難關之一，今後却還是難關重重。這次蘇聯撤銷她自己的否決而重提新案，在蘇聯的面子上自然是一次大大的屈辱，可是她緊接着把新案提出，在利害上却不是沒有經過考慮；多加入四個共產國家關係還小，把亞非在聯合國的集團突然加強，却對於蘇聯和中共在亞非兩洲的活動大大有益。蘇聯僅僅把聯合國作為她們外交鬥爭的點點之一，在聯合國以外作多方面的活動與滲透，才真正是她們外交的命脈所在。關於這一點，所有反共的民主國家，都應該有所覺悟，尤其中華民國更非澈底覺悟不可！我們既然在事實上處於一個和蘇聯直接衝突的地位，假如僅僅只能在聯合國和她鬥爭，在聯合國以外，我們却不能還手，則仍非失敗不可。據我們預測，在明年聯合國大會以前，蘇聯和中共一定還要策動一次亞非會議，其主要目的並不是要把中共擠進聯合國（這一

點她們知道依然很難」，陰謀的重點，乃在大拆民主國家的台，以達到她們赤化整個亞洲的最高目的！如何好好的來應付這一幕，乃是我們今後主要的外交課題之一。

四、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團，以人才論，誠然比較其他外交方面的遠為良好，可是為應付今後的一個艱難局面，却仍嫌人手不够。即以現狀論，我們在代表團的分子，除參加開會以外，便連多寫幾封航空信也不能不加以考慮，更不必說會外活動。本來外交活動就是一種相當奢侈的生活，我們在別處所見其他國家的領事館之類，也往往比較我們駐外大使館的規模良好，其宣傳交際等費用的充裕，更不必論。甚至就連中共，儘管今天大陸的老百姓窮到煤米油鹽也天天成問題，可是他們關於外交費用的大宗外匯支出，也還是要打腫臉充胖子。聽說最近一次與政府有相當關係的文化使節，被別人的首相送出大門，客人還得臨時去找街車，大使館連一部車子也不肯代為租用，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現在政府用於聯合國代表團的經費是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必須讓他們稍有開展的餘地，總似乎是不可少的。

以上幾點，只是隨便提出談談，意在促取政府的注意，我們今後真要穩定，提高我們的國際地位，應注意之點太多，固不僅外交一方面的人才與經費而已。

（原載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自由人）

從日本的政府改組談起

去年四月，我因為參加赴日訪問團的方便，關於這次日本政府改組中的幾個重要人物，如前任首相鶴山，以及最近參加自民黨總裁競選的岸信介、石橋湛三、石井光次郎諸君，都曾有過一度至三度的會見。

當時我眼中的鶴山首相，健康自然是有問題的，可是以他那種談笑自如的風度，並證以後來他還能作一度遠赴莫斯科的長途旅行，假定他還想繼續幹下去三五年的話，也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可是當他把日蘇復交和日本加入聯合國這兩件大事辦好以後，便毅然辭去自

民黨總裁，亦即聯帶解除內閣總理的職位，單就這一點來說，鳩山確不失為一個知進知退善於保全晚節的政治人物。

吉田茂在戰後多度組閣，居然把一個殘破之餘的日本從容挽救轉來，自然是功不可沒；可是因為他不能實踐對鳩山的諾言，久久拿着一個自由黨的總裁不肯放手；乃至過度重視自己的女兒女婿，使他們在政治上發生若干不良的影響，以致引起黨內的責言；從這一點拿吉田和鳩山兩相比較，吉田的出處，似乎還不及鳩山來得裕如。

在一次自民黨招待訪問團的席上，岸信介以幹事長的資格代表致辭，態度相當矜慎，但措辭却非常得體。據當時一般日本人的看法，則久住東京而熟悉日本政情的中國人亦然，他們大抵同然一辭，以為足以代鳩山而起的，當以岸首屈一指。

去年十二月十四，自民黨舉行臨時黨大會，其惟一重要的工作，便是讓鳩山辭去總裁，而另行選舉一人為新總裁。第一次開票的結果，投票總數為五一票，而岸得二二三票，雖未能超過半數，但比之石橋的一五一票，石井的一三七票，畢竟是壓倒的多數。這個時候，岸派似乎還沒有失去他們的信心。繼續舉行第二次投票，以石橋石井兩派事前有了默契，石井的票乃大多數改投石橋，卒以七票的多數取得自民黨總裁的地位。這一結果揭曉以後，石

井和岸同時在場高呼「石橋總裁萬歲」，並且同時趣前向石橋作親切的握手；這一點乃當時會場的環境使然，還不一定便可說明自民黨黨內的確有民主；最足以表現他們確有民主精神的地方，乃在石橋一經當選以後，即企圖作消弭黨內派系裂痕的努力，而岸也居然竭誠與石橋合作，毅然擔任石橋內閣中的外務大臣一席而不辭。這種地方，乃表現一個政黨對於國家的使命，僅僅只是為了公眾服務如何始能收得較大的效果，而決不是為的一二領袖人物的權利地位之事。

說到中日兩國模仿西洋政治制度的開始，假定日本一方從明治元年（一八六八）算起，中國一方從戊戌維新（一八九八）算起，日本所早於中國的時間，也不過三十年。可是日本在這九十年的過程中，雖然也經過一時期的軍閥搗亂，但一般從事政治活動的文人，却隨時都在制止軍人的越軌行動，遇必要時，甚至不惜以生命與之相搏！自從軍閥經過對我八年侵略戰爭失敗以後，日本軍人的氣餒，乃完全落到低潮，軍人自身固然覺得作戰失敗而感到無限的羞慚，而吉田秉政的七八年間，也從來沒有對舊日的軍人假以任何顏色，因此戰後日本的政治，乃得逐漸納入民主的常軌，而軍人干政之風，已趨絕跡，這一點決不是美國的影響使然，而實在是由於從事政治的一般文人有了一種自覺的努力。儘管吉田的秉政時間，日本

的輿論隨時都在對他表示不滿，但我依然樂於為他辯護，因為，我覺得他在大體上，總是不錯的。

我們進一步檢討中國在這六十年的經過怎樣呢？一開始康梁與譚嗣同輩，便看中了袁世凱所手練七千人的新建軍，其結果康梁不會利用袁世凱，而袁世凱却反而利用康梁！辛亥一役，袁世凱何以一下便取得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大家以為袁世凱真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嗎？還不是因為他所手練的北軍六鎮變成了他奪取政權的私人工具！民五梁啟超與蔡鍔策劃討袁，卒置袁於死地，這總算為文人吐了一口氣，可是當時一般的文人對於這一點把握得並不怎樣堅牢：梁啟超還想依附段祺瑞以成功名，章士劍也要利用段祺瑞一黨政權滋味，甚至連青年黨的曾琦也不惜奔走軍閥之門，以為向國民黨分取一杯羹的準備！至於後來十年的軍閥混戰，更是隨時隨地都有若干的文人政客穿插其間。其咎不完全在軍人，這般教猱升木者也應該分負其責。這種助長軍人干政的風氣，在中國延續了幾十年，等到我們退出大陸以後，似乎應該是稍稍改變了，可是事實上想憑借軍人力量以達到他們政治目的者，好像依然是大有其人，因此軍人以粗暴的行動和言論干涉人民的思想、哲學和行動的例子，也還是俯拾即是。

中華民國的憲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又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這兩條條文，是我們參與憲法起草的，根據幾十年的痛苦經驗，然後才作成這種硬性規定的。假定今天依然有不自愛的文人和軍人，依然要公然作出種種憲法以外的行動，我們應該不顧一切起而力爭，即會使我們陷於犬養毅、高橋長清一類的命運，也應該在所不惜！因為我們洞若觀火：如果軍人干政之風不能絕對加以遏止，我們的民主政治便永遠不會有實現的一天，而且我們還要永遠落伍在日本的後面！

（原載民國四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自由人）

關於和諧

大致在三年以前，我在本刊便會有過這樣一種硬性的判斷：中共決不會以武力攻台，自由中國在一切反攻條件不會完全具備，也決不會進攻大陸。我這個判斷所以堅持不變，除掉一般的普通理由以外，自信對於雙方負責當局的個性或心理狀態，以及台灣和大陸的實況，也並非是一無所知。

不久以前，我在本港的另一刊物，也會有過一種類似的看法，我覺得：在今天內內外外一切微妙關係錯綜複雜的情況之下，任何一方動武的可能性都很小，今後所能繼續表演的，

只是鬥智。

依據「鬥智」的原則，中共所打出的牌，第一張是「和平解放台灣」，第二張是「繼續統戰」，第三張是「對美和緩而特別強調外長級會議」，第四張是「國共直接和談」。關於最後這一點，自以周恩來表示願意親自前往台灣和寫信給蔣經國為登峯造極。至於他們所希望產生的副作用，例如：擋開美國和自由中國的交親；表示他們充分愛好和平，以便對若干中立國家的爭取；掩蓋他們根本沒有力量去奪取台灣；分散國際的視線，使蘇聯對東歐和中國的緊張局面，能夠鬆一口氣；此外的作用尚多，當然用不着一一列舉。

依據我過去三十年或最近十多年所積累的觀察毛澤東周恩來等雖不是第一等的蠢材，但是在目前這樣一個大局面之下，憑藉他們那點小聰明便可以應付裕如，我却不能給以及格的分數。尤其是周恩來，因為他不長於對一種複雜局勢的分析，而又很容易把一種小作用誇張得很大，因此他的判斷往往陷於錯誤，所收的效果決不能如他所預期。

關於國共直接和談的攻勢，以最近幾天，更鬧得甚囂塵上，台北方而已經有了多度的闢謠，但以路透社十一日從台北發出的一電較為說得具體。這個電報，港方各報均已登載，甚至共黨的報紙也不例外。據路透社的記者說，這個電報的內容，他是得自「一官方人士」。

這位「官方人士」雖然強烈的否認了國共在遠東或瑞士進行和談的這一傳說，但他却證實了蔣經國確從香港方面收到過三次中共給他的信件。不過這三次信件不是今年收到的，而是一九五五年收到的，但一九五五年的三封信何以會與最近幾天的和談攻勢混為一談？該「官方人士」却沒有加以解釋。該「官方人士」又說：蔣經國對這些信件「置諸不理沒有答復」，甚至「連看也沒有看」，不復，不看，自然也不失為一種態度，但假如看了以後，即把這三封信在報紙上予以披露，同時義正辭嚴的加以駁斥，這豈不使得中共老早死了這樣希望和談的心，同時也使得一般國民和國際友人減少許多疑慮！蔣經國在一九五五年其所以沒有採取這種斷然的態度，我想一定有他的理由，不過這一年多以來，使得中共得到一個繼續糾纏和向國際胡亂宣傳的機會却是事實。

還有一點，在今天的台北，名義上的地位與權力高於蔣經國的還有不少的人，除總統以外，至少有副總統、行政院長、以及其他各院院長，中共要建議和談，不以這些人做對手，而獨獨選擇了蔣經國，這可看出中共對台灣近年政局，另有他們的一套看法。關於這一點，目前我祇想解釋為：這又是毛周輩在那裏賣弄他們的「小聰明」。不過「小聰明」畢竟不會有什麼用處；今天的所謂「和平解放台灣」，實質上便是澈底消滅中華民國！像這樣一件大

事，有什麼人敢於冒天下的大不韙，而居然出來作正面的主張呢？我想就寫一百封信給蔣經國，也不會發生作用。

不過話得說回頭，中共確有一股死皮賴臉的耐勁，他們寫了三次信無效，說不定四次五次以至無窮次他們還是要繼續寫的，單單給他們碰一個軟釘子，即不復不看，總嫌不够，爲了澈底澄清這種闖謠，還是不如把他們的來信公開，堂堂正正加以駁斥要來得有效。

（原載民國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自由人）

美國留台大員談話的我觀

正在這個中共和諸政勢似乎鬧得非常起勁的時候，美國三十三位環遊世界的編輯人和廣播評論家，以探訪新聞的姿態到達了自由中國的政治中樞台北。

就在這三十三位到達台北當天的午後（本月一日）美方三位留台的高級人員：包括美大使藍欽、美軍協防台灣司令殷格索中將、美軍顧問團團長鮑文少將，在招待會中，便和他們有過一次談話。

我們根據合衆社的報導，對於他們這次談話的結果，得了一個頗為清晰的印象：

美國留台大員談話的我觀

第一、我們知道這一羣代表美國新聞界的人物，當他們未到達台北以前，在他們的頭腦中，原早已有一大堆有關自由中國的問題，迫切的希望得到解答，因此在他們下機伊始，在第一次招待會中，便很坦率的向他們本國三位留台的高級人員一一提出；而且問題的性質，確實非常重要。這一點，足以證明美國新聞界對於自由中國的前途確實是非常關心，間接的也足以證明美國的人民，確實也渴望能得到他們翔實的報導。就這個意義來說，我們覺得他們在一次能有三十幾位新聞界人物來訪，實在是非常可感的。

第二、在殷格索中將回答他們問題的時候，他沒有忘記美國對條約所負的責任；他相信台灣地面部隊，足以打擊中共在台登陸的任何企圖，而無須美國的幫助，惟一旦中共使用空軍，美國乃有參戰的必要。殷格索在談話中沒有涉及金馬，更沒有涉及反攻大陸。

第三、談到中共入聯合國問題，藍欽以為如果成為事實，自然是「不幸」，但對中華民國來說，不一定就是一種「災禍」，而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態度也不會改變。以往藍欽不會說過這樣的話，這次藍欽由美回合不久，我們是否可以解釋這僅僅只是藍欽個人的一種看法？但我們不宜忘記藍欽是一位美國派駐中華民國的大使。

第四、在一羣編輯人和廣播評論家的發問中，曾提到蔣總統的健康和對中華民國未來

的推測，我們覺得這似乎沒有必要，而且好像是不應該。蔣總統誠然已屆七十的高齡，但一般的健康情況良好，而且比之於李承晚和愛登諾這般人還算是比較的年青；假如我們以新聞記者的身分，在華盛頓的公共場所，向我們的董飄光大使發出：「假如艾森豪總統一旦舊恙復發，需要有短期間的休養，他的總統職務將由何人代理」這樣的問題，美國的人民豈不要笑我們太無常識？可是我們的美國朋友確會把這樣「不必要」，也「不應該」的問題提出，而藍欽大使的回答則是：「我們有各種理由相信，其時能『正常的』、『合法的』、與『和平的』繼續下去！」是則就藍欽的話下一轉語，假定蔣總統真要有人代理的一天，難道還會有「不正常」、「不合法」、「不和平」的事實出現嗎？因為這羣美國朋友這樣的一問，令我聯想起上月二日「新聞天地」上一篇美國通訊，我們知道胡邁博士在美國，也會被人向他提出這種同一性質的疑問。同時，最近一兩年，我們在港九偶然接觸到我們「友邦」的朋友，他們也往往把這件事作為一個話題；甚至就在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閒談，也每每對這一問題有所涉及。然則從華盛頓、紐約，經過台北，一直到香港，像這樣一個「不必要」也「不應該」有的問題，似乎在若干關心自由中國前途的中外人士之間，已經成了一個公共的而且普遍的疑慮，這個使得多數人懷有這種的疑慮的事實，是什麼人造成的？像這樣一種疑

慮陰影的擴大，即令不會成爲「災禍」，但確實是一種「不幸」，我們希望自己感覺到有責任的人，應該切實加以反省，不需要以「官話」擴塞，而是需要爽爽朗朗以事實與天下人以共見。

（原載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六日自由人）

談談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不久以前，偶然在報上看見有人提到五十年前張之洞所叫出的兩句口號：「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我確實有些感到茫然。

我記得，在「五四」前後，會有人主張過「全盤歐化」；抗戰以前，會有人提倡過「中國本位文化」；甚至就在今天，也還有人；過去對於孔孟之壽，多少也會唸過幾句，因為處在眼前這樣一個時代，精神實在苦悶不堪，覺得孔孟的一套，依然可取來作為一種精神上的倚靠。凡此種種，我從來不敢妄贊一辭。

談談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依照我個人愚昧的想法：假定有人，對於中國的哲學、歷史、文學，或即用舊日的名詞所謂義理、考據、詞章，真是感到相當的興趣；也確實具有相當的能力；甚至還懂得一個現代學人所必須具備的一套治學方法；便不妨依據自己的嗜好，下工夫去搞一搞，搞得通稿不通，都與別人不甚相干，但千萬不要誘導多數青年，和您一道去走上同樣的路子。照我所了解，現在的一個大學畢業生：（一）要他把本國文字，和一種外國文字，弄得相當清楚；（二）對現代常識能或多或少的懂得一些；（三）對他自己所選修的一個科目，能找得一點進修的門徑或基礎；便算算是高材，只要在十個大學畢業生中有一個能具備我上面所舉的三個條件，我承認這種大學教育便不算是完全失敗。至於天才特出之士，在任何一個大學也偶然有之，這是例外，不在我估量的範圍以內。假定今天某一位大學教授，對於自己所講授的一班學生，全不知道他們所已具的是何等程度，不問青紅皂白，便向他們高談什麼「中學」「西學」的比較；而且說明何者必須「爲體」，何者只能「爲用」；甚至涉及文化問題，還要硬說有所謂「中國本位文化」；這便難免不要誤人子弟，甚至可以一定要誤人子弟。

張之洞，他不僅有「中體西用」這樣一個說法，同時他還是清末規定新教育制度和課程的主要起草人，儘管這類制度和課程早已經過了無數的變遷，可是我們要研究五六十年來中

國教育的成敗得失，或敍述中國近代教育史，張之洞也還是一個必須顧到的人物。現在既有人提到他這兩句老話，所以我順便來談談張之洞這個人。可惜「自由人」的編者限制我這篇論文只許寫兩千字，因此我不能詳談研究張之洞的過程，只能在對他的認識上提出我幾點初步的結論，這一點必得請讀者原諒。

第一、我對張之洞所生的時代（1837—1909），和他所遭遇的環境，十分同情，因此在近代人物中，我對他相當的尊重；在涉獵他全部遺著的時候，我自信對他的心情，也相當了解。

第二、論其所學，張之洞自然是通過科舉制度而脫穎出來的一個人物。他雖是北方人（直隸南皮），但因為他的父親張鍊一直在貴州做官，所以他不僅是出生於貴州，而且在他十三歲以前的童年時代，也是在貴州度過的。便因為這個緣故，他才有機會受業於他們的同鄉人韓超（字南溪，直隸昌黎人，也在貴州做官，一直做到貴州巡撫）。韓超是胡林翼的好朋友，胡也是他父親的同寅，因此他乃更有機會向胡林翼質疑請益。大概張之洞後來的種種成就，受着韓胡兩人的影響是不小的。論到咸同時代的其他人物，張之洞除對曾國藩沒有直接的關係外（因為曾在同治十一年便已死了），他對左宗棠算是有兩度立於同一陣線：第一度

當光緒六年（1880）爲了伊犁問題張之洞嚴厲彈劾崇厚的時候，左宗棠還在新疆督辦軍務，他們兩人可算是遙相呼應。第二度當光緒十年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處理對法問題的時候，左宗棠也正以欽差大臣的資格，督辦福建軍務。就在對法的這一幕，張之洞在一方面十分推重彭玉麟（時彭在廣東會同督撫辦理海防），一方面他又特別重用馮子材，至後才能轉敗爲勝，造成一次空前的諒山之捷！至於張之洞和李鴻章的關係，則時間更久：光緒十一年的對法和約，二十一年的馬關和約，二十七年的辛丑和約，張對李確會表示過許多不同的意見，儘管李鴻章罵張說：「張香濤作官三十年，仍不脫書生習氣」，可是張對李却依然相當的尊重，尤其庚子東南自保這一幕，使得大半個中國沒有淪於浩劫，張和李的主張，更是完全一致。我所以要列舉上面這些事實，只是說明張之洞在時代的關聯上，確實是一個上接咸同的後起之秀。

至於，說到張之洞對於所謂「中學」的違詣，我們只要翻翻他的「讀經札記」、「輶軒語」、「書目答問」、和「勸學篇」這類東西，便可知道他在中國舊日的學人中，却佔不到什麼地位。可是他的詩文不太壞，駢文更下過工夫，在他做京官時代的幾篇有名奏摺，確也相當有力。因此我對張之洞的估價，他只是一個比較能幹政治的「文人」而決非「學人」。

我們只看他所交的朋友，如王闡運、樊增祥、易順鼎、梁鼎芬……等等，他都非常珍重，這却是一班咸同元老所不願幹的。說到他的所謂「西學」，以他的「勸學篇」下卷為代表，這可說是戊戌前後一般留心時務的文人早已耳熟能詳的，那裏談得上什麼學不學。尤其在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他在一篇頗為冗長的「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的奏摺上，強調反對中國人研究西洋哲學更是近於荒謬（原文太長，恕我不在這裏徵引）！在他幕府中的外國留學生，如梁敦彥、李鴻銘之流，本來只有一些外交文字上技術的貢獻，專尤其對中西學術的異同抱有非常的偏見，因此他在這一方面連耳食的機會也不太多。因為張之洞自身對所謂「中學」、「西學」的造詣不過如此，所以他既容不下一個中西常識相當豐富的黃達蕙（黃對張只有過一度接觸，便為梁短期泛泛的關係），更容不下一個對國學有深造的章炳麟（章對張只有過一度接觸，便為梁所排）！這實在是時代限之，學力限之，一件無可如何的事。根據以上所述，可見張之洞對於中西學術的比較，實在沒有發言的資格，我們在五十年後還去稱述他「中體西用」的一類謠諑，實在是大可不必而又大可不必！

第三、論其事功，張之洞確實是清末一個突出的人物！他在地方服官三十年以上（包括湖北四川兩任學政，一年多的山西巡撫，五年多的兩廣總督，十七年以上的湖廣總督，兩度

署理兩江總督），每到一處他總要創辦許多事業，尤其以在湖北最久，成績也特別優異，一方面他能大膽辦事，一方面他也能放手籌款，而他自己却又並不要錢。我嘗說：「在清末，以一縣建設之力而能影響全國者，莫如張謇之於南通，以一省之力而能影響全國者，莫如張之洞之於湖北！」說到湖北這個地方，在地理上自然是十分重要，論到它的收入，却不能與川、粵、江、浙等省，相提並論，可是在清季五十年之間，胡林翼一度用之而成為太平天國的勁敵，張之洞一度用之，乃開創中國近代建設的一個規模，能够不說他們是豪傑之士？今天的毛周劉輩，殺兩千萬人去鞏固他們的政權，奴役兩千萬人，還要餓死幾千萬人，然後才勉強去執行他們的一個五年計劃，居然還敢於以建設的成績去欺騙人民，比之於張之洞豈不應該愧死！據說章太炎民初到湖北見着黎元洪，曾提議為張之洞在湖北建銅像，可見公道自在人心！我們要認識張之洞，應該從這些地方着眼，稱述他對學術的見解，却反而抓不着他要點。（關於張在湖北建設的內容，我最近將有專文在香港某雜誌發表，在這裏恕不能多說。）

最後，我想起張之洞晚年的兩首小詩：

璇宮憂國勤濡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胆事，調停頭白范純仁！（新舊）

南人不相宋家傳，自翻洋橋警杜鵑，辛若李（綱）、虞（允文）、文（天祥）、陸（秀夫）輩，追隨寒日到虞淵！（讀宋史）

張之洞在晚年，不僅想調停新舊，眼見革命風潮一天天擴大，他尤其熱心調停滿漢，卒之新舊無可調停，滿漢也終於潰決，在他去死前的兩月，以諫阻攝政王載灃重用他的兩個老弟載灃載灃主持軍政大計，大碰載灃的一個釘子，乃氣得病發嘔血，卒於宣統元年的八月二十一日，去清朝之亡，也便只剩下最後的兩年，所謂「追隨寒日到虞淵」，不幸竟成語謠！以我們今天的心情，來讀他這種詩句，也真是感慨至之啊！

（原載民國四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自由人）

看過「毛和尚」一篇長文以後

在過去幾年，我們對中共在大陸的一切行為，曾不斷有所指摘，並斷定：以他們的種種做法，不僅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而且可能使得中國數億人民，陷於更大的災難。

像我們這種看法，有不少的人總以為我們是由於一種成見，他們以為我們既然站在一個無可商量的反共立場，其對中共的詛咒，當然無所不用其極，像這種不依據客觀事實，而徒然訴於一種主觀的情緒，其所得出的判斷，不會十分正確，自屬顯然。

像這種批評，並不完全來自敵人方面，甚至就在我們的朋友中間，抱着這種謹慎態度的

看過「毛和尚」一篇長文以後

也大有其人。正因為如此，乃不容許我們不對數年來所發表的言論，加以深切的反省：一、我們的反共，果然只是一種主觀的成見嗎？二、他們所標榜的「為人民服務」，難道是絕無誠意嗎？三、中共在過去誠然是多行不義，殺人如麻，但近年他們確在從事建設，而且態度相當積極，何以斷定他們決沒有成功的可能呢？四、他們特別重視「蘇聯老大哥的經驗」，這自然是一個笑話，可是蘇聯革命後，畢竟有了四十年，對世界雖然毫無貢獻，但她却能鬧得全人類都在頭昏腦脹；中共的「一面倒」是命定的，而她要把舉世鬧得不安，其目的也正與蘇聯一致，她不向蘇聯去學習，更向誰去學習呢？五、像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國家，忽然來了一次「古之所無」的所謂「革命」，其不是十年、八年所能搞得好，這是當然的；過去國民黨曾在大陸執政二十年以上，現在退到台灣，執政又將十年，都不會做出如何優良的成績，大家對國民黨的責備何以這樣寬，對中共的責難又何以這樣嚴呢？……凡此等等問題，我們都會不斷提出，以作為我們反省的資料，可是經過多方反省的結果，依然不能改變我們對中共的看法，換言之，我們對中共前途的判斷，依然是：「以他們種種的做法，不僅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而且可能使得中國數億人民，陷於更大的災難。」

毛澤東，這正是今天儲安平所指出一羣「老和尚」中的一位「方丈」，他儘管滿口像喚

阿彌陀佛一樣的唸着馬克斯和列寧，可是在中共這一羣老和尚中，却沒有任何一個曾經把馬克斯經典和列寧經典真正的搞通過。在這裏我可以插入一個故事：當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他的岳父楊華生校長，曾教毛讀讀胡會左的遺著，毛經過一番涉獵以後，楊問他：「對會（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這三個人你最佩服那一個？」毛回答：「我最佩服胡潤之，假如沒有胡，會左要成功是不容易的。」楊說：「對，你的見解很不錯，你既是這樣佩服胡，你何不就把胡的號作爲你的號呢？」據說這就是毛澤東又叫毛潤之的由來，這可看出毛在成爲共產黨幾年前的思想是一個怎樣的底子。

從毛算起，加上周劉，以及他們的「五老」「八帥」，這都要算是他們老和尚的一輩。大抵這一羣人，後來都只能在行動上去表現，表現在圍剿中求掙扎，表現在二萬里長征，表現在密洞中苟延殘喘，他們確實對於共產理論並沒有什麼建立。所以他們始終要拿着馬列主義這面旗子幌來幌去，這是所謂「拿着雞毛當令箭」，知道不如此，便不能嚦聚黨徒，不能欺騙羣衆，也無法取得外援。後來居然生意一天一天發達，市面也一天一天繁榮，乃至奄有整個中國大陸，於是他們乃覺得這個馬列買賣確實做得，因而到今天爲止，他們依然要裝出一個好像搞通了馬列的樣子，甚至還進一步非把別人的思想，也一代代爲搞通不可。可是

經過七八年的瞎搞，由這次「大鳴大放」所表現的成績，我們才知道今天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一個也沒有被他們搞通，甚至便連「人民大學」的先生們，其不通也依然如故！這本來嘸哈稀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事實上，原來就是不可能的。

從這次「大鳴大放」所看到對中共的批評，大抵都是針對中共這幾年在大陸的行動，而很少涉及他們的理論，這因為中共對於所謂共產理論的建設，截至目前為止，依然還是一個真空管，決不能構成批評的對象，因此這班批評者，便只好就事論事，毫不客氣的暴露他們一部分惡劣的行為。可是所暴露的儘管還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却是擊中了他們要害，抓破了他們的臉皮，因而這位「毛和尚」乃不能不惱羞成怒，趁着在所謂「人代會」開幕以前，才把這篇「王大娘的裹腳布」拿來發表，而定所謂六點的鳴放標準，這樣一來，於是乎，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們乃成了「毒草」，而史良、宋慶齡、何香凝這幾位婆娘，却成了又香又艷的「香花」！「香花」暫時還可擰在瓶子裏，「毒草」却非來一次「斬草除根」的清除不可！

可是我總覺得毛和尚還得十分的當心：「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中共要繼「大鳴大放」之後來一次「割草運動」，總得首先估量估量像章、羅

這類的「毒草」，在今天的大陸究竟有多少，其滋蔓的範圍究竟有多大。據一位久住北京的靠攏分子最近在香港對人說：「自從中共蠶據大陸以後，一直到去年為止，被他們屠殺的所謂反革命分子，有案可稽的，總共是二百七十多萬」；而「毛和尚」所承認的則為八十萬；但據我一個最保守的估計，則至少為兩千萬。我這個兩千萬的估計並不是瞎說的。湖南的洪江，這個湘西桐油的轉口站，本來只是一個四五萬人口的小市鎮，據一位在洪江有三十年傳教經歷的內地會牧師在他回國前在香港親口對我說：「他在洪江住了三十年，因為傳教的關係，對於當地這四五萬人的面孔，他幾乎一一都能熟識，他在所謂『解放』以後，在當地還繼續住了兩年，眼看見一批批的提出『公審』，一批一批的載出鎗斃，依據他逐次的紀載，其總數實超過兩千人。」大家試想：四五萬人可以殺掉兩千以上，假定中國真有六億人口的話，則被殺的豈不有三千萬以上？這還是說的最初一期，後來，更有所謂「三反五反」，更有不少的役役和放逐，更有一次對南韓的侵略戰爭，再加上餓死的、吊死的、跳樓死的、跳水死的、吃安眠藥死的，我「一腳掛子」只估量為兩千萬這個數字，豈不是再保守也沒有了嗎？

在這裏大家還得注意！我所指出這兩千萬被殺的人，他們大抵是有身家的，大抵是有社

看過「毛和尚」一篇長文以後。

會關聯的，假如他們沒有身家，或沒有社會關聯，中共便不會感到有殺他們的必要。他們每一個死者的家屬，每人只以五口計，則為一億人；他們每一個的親友只以十口計，則又為兩億人；因此我們知道：自從中共經過這一場大屠殺以後，今天大陸的人口，至少已經有半數以上，確已變成了中共的死敵，這類的死敵，便正是「毛和尚」口中所說的「毒草」，而且這種「毒草」乃是由這兩千萬人的鮮血所灌溉而繁榮滋長出來的！我不反對「毛和尚」再開殺戒，繼三反五反以後，再來一次大規模的「割草運動」，可是必得當心你們的手，必得當心你們的刀，專靠殺人以維持你們這個所謂社會主義的政權，終有一天是要碰壁的。

自從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們發出了他們一番正確而切當事情的議論以後，香港的朋友們有不少覺得我們應當對他們寄以相當的同情，甚至應當對他們遙為呼應，這一點我却不敢苟同：我總覺得他們之「被割」，確實是罪有應得。他們都不是傻瓜，過去都會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們和中共發生關係，至少都有二十年的歷史，中共之毫無人性，中共之絕對不講交情，他們應該早已明白，天下本來是中共打出來的，他們不來「黨天下」還讓誰來「黨天下」？他們容許你們這班「野和尚」在他們的廟子裏掛單，這已經算是天恩高厚，而你們却還不能安分守己，好好的接受「領導」，居然抓着機會，便想出頭來「鬧亂子」，

其不幸而掉入他們的圈套，豈不是咎由自取！

正寫到這裏，周恩來這篇又長又臭的裹腳布，又送到了我們的手裏，匆匆翻閱一過，暫時還不想多說話，但借此機會，就周這個人在今天中共中所處的地位來作一番估量，也許還能幫助大家對中共前途多有一些認識。說到周恩來這個人，他本來就是以統戰起家，自從他在黃埔任教官算起，他所布置的一切力量，始終就是外重內輕，換言之，論到黨內的關係，周恩來不如毛劉；反之，黨外的關係，毛劉却不如周恩來。今天美帝未倒，台灣尚存，「毛和尚」不能不借重統戰這面旗子來鬼混幾時，因而周恩來才取得今天這個地位，換言之，周恩來不過是今天在這一片的「毒草」中所開放出來，一棵有刺的玫瑰，本來遍身就染得有不少毒素，已經把毛劉們恨得「牙癟癟」，可是他還不自檢點，年來更要跑到四面八方去大出風頭，幾乎使得大家只知道大陸有一個周恩來，而忘記了在中國共產黨中，更有一個謎一樣的劉少奇一個人物！大凡一個獨裁者，都是天然有一種最強烈的忌刻心的，他們只能看見不如己者，決不能看見勝己者，爲了一句「空梁落燕泥」的詩句，便可以被一位獨裁者殺掉這位作者的頭，周恩來在這些地方似乎還毫無警覺，風頭依然是濫出不已。即以這次毛周的講演比賽而論，「毛和尚」花了四個月的工夫，才整理出一篇二萬五千字的講稿，周恩來却一搖

筆便是三萬五千字，僅此一點，已經是死有餘辜！現在大陸上的「毒草」是這樣多，我相信經過一番「割草運動」以後，究竟三十年來這些「毒草」是什麼人培植出來的，一定會有人要起來追問責任，到那時候周恩來就得當心你的頭！

（原載民國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自由人）

分析章士釗的詩解剖章士釗這個人

章行嚴（士釗）最近在香港住了半年以上，見過不少的人，也做了不少的詩，這些詩我看過一部分，大抵沒有什麼，不過表示他一點垂暮的心情（他今年已七十有七），在有意無意之間，也多少發幾句牢騷就是了。一直到上月二十四，我才在香港大公報看見他一首答張君勸的詩。這首詩不是寫把張君勸看的，是寫把毛澤東看的，也是寫把一切共產黨人看的。實言之，他這次在香港住得太久，見了許多他不應該見的人，也說了不少他不應該說的話，中國人無所謂秘密，關於他的言論和行動，自然大陸上早已有不少的報告，假如他不做這

樣一首詩向毛澤東去交卷，即令不會馬上遭到清算，但在他未死以前還想出來走走，總難免不有问题。他寫這首詩的動機只是如此，詩內所包含的種種說法，原也不一定就是他的由衷之言，這好比一個當律師的人，既已接受了某方當事人一筆出庭費，便不問某方有理無理，他總得有為某方辯護的義務，假定他這首詩僅僅只寄把張君勸，而不在共方報紙上堂而皇之的發表出來，我們原也可以置之不理，放他過去；可是現在他已經拿來發表了，而章行嚴確實又是一個長於咬文嚼字的人，不愧第一等的訟棍，如果不嚴予駁斥，讓他以這種狡辯來順倒黑白，淆乏是非，我相信難保不仍有若干人要為他這種似是而非的議論所迷惑，最低限度像章行嚴這類的幽靈，更難保不在最近的將來，依然會要在海外出現，我很了解，像顧果陳貞慧等的一篇「留都防亂揭」，誠然不見得有教於南明的滅亡，可是明之亡不亡是另外一件事，但為天地間保留一點是非羞惡之心，為讀書人保留一點正義感，像阮大鋮這類的人不能不加以口誅筆伐，却是等於「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現在我把章的原詩逐段錄下，逐段加以解釋和糾正。

第一版

七年不見張君勸，一紙飛從美西岸，發端勉強語寒喧，吐棄獨裁如噴飯。憶自東髮
十八九，爾我登壇始論難，政見縱或洞一垣，躬行至多才及半；即此一半又潰裂，南北
紛紛生動亂，從知吾無治國能，已旣無能應截斷。截斷衆流聽疏濬，大禹功成絕水患，
成功在人己亦利，萬事何必由己辦。

這一段，是說張君勸有一封信給他，信上痛責共產黨的獨裁專政。然後說到他自己和張
君勸在清末民初很年青的時候便以言論自見，可是後來毫無結果。表面雖是實備自己無能，
重點却在譏諷君勸的無能也正和他一樣。自己旣已無能，至少便應該閉口勿言，聽憑別人去
幹。至於「成功不必自我」的一番說法，這也無非是一個去死不遠的落魄文人，在充滿一種
自卑感的時候，借這個話來遮掩羞，其言似壯，其心實衰。

第二段

君言專制不可耐，須知大國形勢散，六萬萬人期久安，重典劣能戢暫叛，一家怎如
一路哭，老儒之言何侃侃！民勞祇在改革始，勢大直擬雪埋洞，荆公妙句我高吟，放得
春回功可接，於今正是春回日，大浸稽天真悖慢。（原註：王荊公詠雪云：「勢大直疑

埋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此純爲己行新法招致民怨設想，與今日形勢正同。）

這一段，真是喪盡天良，他簡直說共匪在大陸屠殺兩千萬人（毛在北平公開承認殺八十八萬，章本人在香港對人說殺一百八十餘萬，當然都不可信）完全是對的！他的惟一理由，便是說中國這個國家太大，人口太多，不用「重典」大大的血洗一番，他們便會要隨時造反，換言之，就是說大陸人民根本不贊成共產，共匪其所以要大施屠殺，完全是爲了他們鞏固政權的一種方便！試問：共匪所殺的這兩千萬人，大抵都是有身家的，每人的親屬最低以五口計算，今天在大陸上便直接有一億人受了共匪的損害！怎麼可以拿「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這句鬼話來輕鬆鬆的搪塞呢？至於他在這裏扯上王安石的兩句詩，完全是因爲下文他還要提到王安石的新法，乃先在這裏伏一筆，至不惜把今天大陸的水深火熱，比之於大地春回，就詩輪詩，這自然是章行嚴的得意之筆，可是應該懂得和阮大鋮的「詠懷堂」詩和「燕子箋」劇本，豈不更高出章行嚴不少，但他有什麼方法可以逃避當時和後世的唾罵呢！

第三段

君知國力大強盛，未料民主也燐爛，保民富國均難能，盲目抹煞疑妒憎。君不見令

行直如水下流，蕩蕪貪污成渙汗。五十年來溢上海，淨洗如中灤巴漢。尊賢容衆難盡洽，日新自爾廣壯觀。蓬生麻中蓬自直，古語心藏今眼看。名士被戮妄傳耳，偏心多口彌可恨，像耳風謠飛刺天，東坡舊巢故仍黃。（原註：海外妄傳惡耗，謂張東蓀、梁漱溟被殺，君竟誤信如此。）

這一段居然說中共也有民主，真是匪夷所思。所謂「保民」，難道把無罪的人民，不經偵查，不用審判，不許辯護，一卡車一卡車推出郊外槍斃，這叫做「保民」嗎？難道奉着蘇聯的命令，把成百萬的壯丁，投入韓戰的火海，去從事侵略，這叫做「保民」嗎？難道奴役幾千萬的人民，去建築邊區幾條毫無經濟價值的鐵路，架上幾道鐵橋，以加強蘇聯對中國的控制，或便利蘇聯將來在大陸的作戰，這也叫做「保民」嗎？說到「富國」，更可笑！把人民以血汗經營的工商業，一律收去，美其名曰「公私合營」；把人民勞力換來的農產，半買半搶的一律搜括，美其名曰「農村合作」；把人民所掌握所加工的土產，一律以廉價收購，又一律以廉價向海外傾銷，美其名曰「為國家爭取外匯」；今天一般逃出大陸的難民，可以在香港嘗到既甜且熟的哈密瓜，可以喝到既醇且香的茅台酒，也可以吃到金燕腿、天津梨、奉化桃、天台橘，可是，大陸的人民是怎樣呢？除極少數的共產貴族可以盡情享受以外，一

般的善良老百姓，却連一個、一杯、一片也得不到口！他們一年所配購的布，不够添一件新衣；一月所購的油，不能在鍋裏畫上一個太極圖；農村所剩下一點極少的糧食，不够每一農家吃兩頓飽飯；這一切一切的現象是爲了什麼？爲了「富國」呀！國富了又怎麼樣？去到國際上充胖子；去大開雞尾酒會、跳舞會、其他各色各樣的晚會，以招待他們的國際朋友；去購買更多更新的武器，到天安門去示威；去援助他們的友邦，準備爲人類帶來一次更大的災禍；去養活無數的共幹、特務一直把老百姓壓迫到死！章行嚴還記得「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這句「老儒之言」，但何以獨不記得另外一位老儒說過的這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呢？好吧，大家等着瞧，看他們這種所謂「國富」，究竟富到那一天？

不錯，五十年來的上海，確實是「濫上海」，可是「濫上海」之所以濫，總不能說與上海黑社會那種「包娼」、「庇賭」、「販烟」、「運毒」、「綁票」的猖獗行為，沒有相當的關係吧？從前有不少的無恥文人，包括黃炎培、楊度、章士釗這般大文人在內，確曾一一投入黑社會領袖之門，而爲之點綴，爲之張目，能說上海之濫，這般文人不應負相當的責任嗎？據說中共已經把上海的黑社會完全肅清，果然如此，自然算是一件好事。

可是他們「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過去那般供黑社會利用的文人，他們却又一一收爲

己用，而且凡黑社會一切「殺人越貨」的行為，共產黨又無不一一便為之，而這般文人之為共匪張目，為共匪辯護，也無不格外努力而變本加厲，形式有變而實質不變，一切災害依然是落到老百姓的頭上，範圍更推廣及於全國，然則上海一處在表面上有變動，如何便值得這樣誇耀？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根本靠不住；共產黨縱有天大本領，也無法把鴉片烟一律禁絕，至少還有不少的人照常抽煙，這種事別人可能不知道，章行嚴總不能說不知道，更何必閉着眼睛瞎說呢？

不錯，張東蓀、梁漱溟我們也知道還沒有死，但早已失了自由，從前有一位風流皇帝，會賞行縱囚，到期道羣被縱者依然一一回到牢裏去。今天的毛澤東却只能縱出一個他認為確有把握的章行嚴到香港來走走，如果他能把張東蓀、梁漱溟、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之流也一樣縱出來走走，我便願意舉起雙手承認毛澤東確實是超越漢祖唐宗的「千古風流人物」！

第四版

分析章士劍的詩解剖章士劍這個人

吾儕嘗生殆無用，畢生辛苦剝奔竄，晚節幸見太平年，向來服善又何憚？我來香港已半載，且暮習聞市井怨，大抵販與女傭，內渡荒荒生謗訕；蕭紳謂是見聞切，心與耳叶鼓目論。（原註：張向華曾謂余曰：內地人民太苦，吾家老媽子親眼所見。）；食力上進一是無，糜爛生涯都可讀。（原註：香港老媽子以主人好賭博，能多抽頭，爲好場面。）

縱退一萬步承認張向華家裏的老媽子不足以批評共產黨；也可以承認這般廣東老媽子所看見的只是廣州附近的一隅，不足以代表共產黨所推行全國的善政全貌；難道在這次鳴放期間，久在中共政權下做到部長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各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各日報和定期刊物的編輯或記者；乃至在共黨內部積有多年黨齡的開明分子；他們所發表的反共言論也可與張向華家裏的老媽子等量齊觀嗎？還有，這次在長江大橋的傍邊，領導漢陽中學學生反共因而慘遭殺戮的王建國、鍾毓文、楊松濤三位教師，難道他們也是「食力上進一是無」的人物嗎？我一面希望台灣方面能把王、鍾、楊三烈士的神主，以盛大典禮，恭送加入國山的忠烈祠；一面我也希望「阮鬍子」於煙癮過足之餘，把頭腦清醒清醒，不要「盲目」的把這類鐵一樣的事實，加以一筆「抹煞」！

第五段

吁嗟乎！男兒立說須自主，舊制過去同夢幻，英倫近已淪附庸，憲章聊可作清玩。

昔聞新會論政體，力言今制不可換，諒君不作湯武想，建言焉惑冰與炭。海通以還士夫起，士夫功罪難遽判。晚年靖共第一念，應使英雄絕羈絆。幾人奮發泥沙中，克己化人真好漢！已不能有惡人有，自惟怕入斗筲算。

這一段已正式進入對君勣個人的統戰，我想君勣先生自己可能有嚴正的答覆，用不着我多來越俎代庖。但在這裏他要抬梁啓超，意在以梁啓超壓倒張君勣，說梁在前清主君憲，入民國以後，在洪憲與復辟兩役，他却是竭誠的維護中華民國。可見梁祇是承認現實，現在的中華民國既已被共產黨一筆勾消，你便來擁護「人民共和國」好了。這種地方可見章行嚴決不了解張君勣，君勣最能堅守原則，其性格剛剛是與章行嚴相反的。

最後一段

君今避地已有年，管車歸來百姓勣，吾詩歷是北山移，忠言庶當左手券。任公低首

宋新法，新法夭折心憤惋，今人手提新法來，節節打通物非腐，此中不同在何處，着眼體制得冰泮：宋人用君不用民，成敗利鈍爭一寸，名流不附設黨綱，不解統戰亦枝蔓。此事作始真太簡，吾徒讀書何顛頂！任公善變天下知，一路揭開勝爻象。此公而在不心服，吾賄以頭學巴曼（原註：此重慶典故）！君知梁先強過我，何能背友作欺謾。

王安石變法是以中國人變中國之法，今天中共的這一套，乃是「一面倒」在蘇聯懷裏，而以附庸姿態一切惟蘇聯之命是聽，拿這兩件事來相提並論，可謂撥於不倫。任公是一個國家民族觀念極強的人，戊戌一役，任公為日人所救，避地日本，大隈等也對他維護備至，可是後來大隈組閣，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當時反日的言論，也以任公最為澈底。任公一生，在學術思想上誠有不少的變化，但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他却是謹守宗旨，堅持原則，雖百變也不離其宗。任公生前，已發表過最透闡的反共言論，假定他今天還活着，一定站在反共抗俄的一邊，我確信毫無疑義。章行嚴雖不會投入梁門，但任公對行嚴却未嘗不加以青眼；今天章行嚴已「盡棄其所學」，而一切惟毛澤東的馬首是瞻可憐亦復可笑！章行嚴自己要變，這是章行嚴的自由，一切由章行嚴自己負責，反之，掉轉頭來，利用一個死無對證的事實，厚誣前輩，這却太不應該，你就提一百個頭來賭，我們也決不相信。

章行嚴這次在香港，不僅有詩答君勸，還做了一首長詩送我，我現在只錄出八句，請大家與答張君勸的一首參看：

「……龍性吾不具，喪時先具馴，烙印縱未退，媿傍九方歎！此來務蕭散，訪舊徒

傷神，賴此一夕談，堪謝眼中人。……」

所謂「龍性吾不具」，這是表示他自己原沒有堅強不屈的個性。所謂「喪時先見馴」，乃是說遇着這樣一個不好的時代，他實在支持不住，只好首先馴服！這可看出他送張的詩裏所說「晚節幸見太平年」，完全是一句假話。「烙印縱未退，媿傍九方歎」這兩句，是回憶他清末在上海和章太炎、張溥泉、鄒丹威等鼓吹革命的那一段光榮歷史，以及民國初年在「民立報」發表文字和他自己辦「獨立周報」及「甲寅雜誌」那一個黃金時代，證明他確是蓋過火印的一匹好馬。今天這個火印縱然還沒有退掉，但是站在一個懂得他這匹馬的九方皋（列子作九方，莊子淮南子作九方歅，實一人也。）傍邊，却是不勝慚愧。「此來務蕭散，訪舊徒傷神」，是說明他並非奉命來從事統戰，不過蕭散蕭散而已；就是看看一些老朋友，也徒然增加心裏的難過。「賴此一夕談，堪謝眼中人」，這兩句，關於「一夕談」的內容，姑予保留；只看「堪謝眼中人」這一句，便可知道他是如何願意得着我的同情和諒解！以這八

句詩和他前面那首氣盛而言不宜的長詩，兩相比較，其精神的分裂為何如，這實在是一大悲劇，我也不願再說下去了。

從庚子拳變談到清末政治

——為紀念拳變六十週年而作

去今六十年前，即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在中國的北方，由若干萬下層社會的人民和一個頗預無知的政府，合力拍演，造成了一幕幾乎牽動整個世界的非常事變，是即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庚子拳變」之役。

關於這件事的起源、擴大、及其收束，我最近曾寫了一個近五萬字的長篇，連載於本港

出版的某刊物上，自信所搜羅的資料較為廣泛，去取相當嚴格，敘述也較有系統，現在老友雷嘯岑先生要我寫這篇紀念文字，我不願就我這篇長文作一提要拿來塞責，準備藉着這次的事變，來談談清末的政治。

清末共有四個葉赫那拉氏：第一個便是慈禧，她是咸豐帝的妃子，同治帝載淳的生母；第二個是慈禧的胞妹，咸豐帝的老弟奕譞的福晉，也就是光緒帝載湉的母親；第三個是慈禧的弟弟桂祥的女兒，光緒帝的皇后，亦即辛亥決定下詔退位的隆裕太后；第四位還是桂祥的女兒，她嫁給端王載漪，載漪之為慈禧所寵信，乃至立他的兒子溥儻為大阿哥，也就是靠他這位福晉才討得慈禧這樣的歡喜。這四位葉赫那拉氏，自以慈禧為榮冠，她自同治元年迄光緒三十四年，掌握中國的政權，凡歷四十七年之久，其基礎便大體建立在這一血緣與親戚的關係上面，滿清末年一切的腐敗與黑暗，也莫不從這一基礎上逐一的表現出來，而卒促成清室的滅亡。

當滿清未入主中國以前，即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天命四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他們把當時一個相當強硬的部落葉赫（今吉林伊通縣及其附近之地）滅了，對葉赫人民加以瘋狂的屠殺，男丁幾無倖免者。時葉赫有酋長二人，長曰錦台什，次曰布揚古，均被

縊而死。據說布揚古臨死前曾痛恨的說：「但凡我葉赫能存一女子，將來亦必傾覆滿洲！」因為有這樣一個故事流傳下來，清朝的祖制即限制葉赫氏不得入選宮闈。真沒有想到清末年的三個皇帝：前兩個——載淳與載灃是葉赫那拉氏的兒子，後一個——溥儀又是葉赫那拉氏的孫子，甚至一個準備做皇帝沒有做成的溥儕（大阿哥）也還是與葉赫那拉氏有血緣關係！儘管道只是一種巧合，可是，中國歷代史上這類的巧事，却司空見慣，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所謂「代漢者當產高」，也不外就是這類的把戲！

好，言歸正傳，還是讓我來談談清末的政治吧。

這裏所說的「清末」，係指清朝的最後五十年（包括同治十三年，光緒三十四年和宣統三年），在這五十年中，自慈禧秉政以迄她的死亡，便佔去四十七年，而最後宣統的三年，如以溥儀繼承同治而兼祧光緒，以醇親王載灃監國，慶親王奕劻仍留中樞處於領導地位，這一切一切依然是慈禧的關係，而且完全是由於她的安排，她的這個皇太后尊稱，也讓渡給了她的內姪女，不過隆裕不能和她的垂簾聽政就是了。因此，我們說清朝之亡，乃亡於慈禧之手，這是完全合於事實的。

慈禧以咸豐元年入宮，年十六，初號懿貴人，四年，封懿嬪，有寵於咸豐帝奕詝；六

年，生同治帝載淳，翌年，進懿貴妃。十一年七月，咸豐帝崩於熱河，同治帝即位，慈禧母以子貴，乃與皇后鈕祜祿氏並尊為皇太后，其時鈕祜祿氏年二十五，慈禧年二十七，同治帝則甫六齡；寡婦孤兒，以不堪質要政務王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尚書肅順等的專擅，慈禧乃投袂奮起，勾結恭親王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置載垣端華肅順於死，因而造成一種兩宮垂簾聽政之局，這便算是慈禧長期掌握政權的開始，也可看出她的手腕頗不平凡。

在同治這一朝，因為有慈安（即鈕祜祿氏）主持於內，奕訢文祥等翊贊於中，更得曾、左、李諸鉅公匡扶於外，乃能次第敉平變、捻、回諸亂，而造成一小康之局，居然號為「中興」。在這一期以前，儘管經過了兩度的鴉片戰爭（第一度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第二度一八五六到一八六〇），可是當時這般據有權位的人們，對於西洋之所以為西洋，還完全沒有認識，只是因為吃了兩次敗仗，乃懂得船不如人之堅，砲不如人之利，洋貨大量輸入，金錢逐年外流，不能不感到相當威脅，因而考慮到防禦與抵制之方，於是中興諸鉅公，乃開始究心於洋務。所謂洋務者，其着眼完全在軍事與經濟，與政治文教無關，其第一期的目標為兵工與造船，進一步則將煤鐵的開發、紡織的發展、更進則為鍊鋼、築路以次及於郵電等等。

在那樣一個時候，要舉辦這類的事業，不僅奕訢等可以贊成，即慈禧也認為無可反對，甚至頑固派如大學士倭仁之類，他也僅僅不以由科舉出身的人進同文館為然，但並沒有說船不應該造，槍砲不應該用，於是中國乃居然步入一個所謂「洋務運動時代」。這一時代自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開始，至甲午對日戰敗而宣告完結（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凡歷三十餘年，中國若干有力量的人物的心思才力固然都集中用在這一方面，則國家有限的金錢，也從這一方面消耗不少。領導這一運動的人物，前期為李鴻章，後期乃加上一個張之洞，其他如曾國藩、左宗棠、沈葆楨等對前一期的推動亦與有力焉，但時間很短（曾在同治十一年即已逝世），經手的事不多，其重要性乃遠不如李張兩位。而為李鴻章所最得志的，乃即在此一洋務運動時期，居然由他一手建立了一支北洋海軍，不過從實際說來，李一生的英名，也便為這支海軍斷送了一大半，其所以造成如此這般的結果，道理是很簡單的：原來洋務運動中所包括的一切項目，這並不是西洋文化的本源，而只是西洋文化所開出的花，結出的果，我們要學西洋，不首先着眼於他們的政治文教，而斤斤於其枝葉以求之，這好比拖着一條辮子穿西裝，裹着一雙蓮步嫋嫋的小腳來參加賽跑，其弄成四不像，而結果歸於慘敗，豈不是理所當然？

我現在便拿北洋海軍作個例子來看一看當日洋務內容腐敗的實況吧。中國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在光緒十一年成立，實際上雖由李鴻章主持一切，但上面一個負名義的首領人物便是慈禧太后的妹婿，光緒皇帝的老子醇親王奕譞。海軍衙門是當日一個最闊的衙門，其經費除一部份撥自國庫以外，另一部則由各省分攤報効，慈禧是一個毫無知識，死要錢而最愛享受的女子，現在眼見這樣一個肥缺，「肥水不落外人田」，當然非派她一個最親信的人去主持不可。果然，因為奕譞管理海軍衙門之故，修建頤和園這一筆浩大的支出，便由奕譞把海軍經費提去了三千萬兩！北洋這一支艦隊，是由主力艦四，防守艦十二，練習艦二，補助艦四構成的，全部二十二艘，除掉平遠、鎮海、潤寧、泰安、操江這五艘是同治中葉和光緒初年分別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造成的以外，其餘的一十七艘，便全部購自外國。說到當日購買這支艦隊的事實，其濫費也真是可驚：以定遠、鎮遠這兩艘最大的鐵甲艦（其每艘的噸數為 7035，馬力艦 6000，速力 14.5，炮數 120，船員 330）來說，乃是德國斯旦丁伍爾廠定造的，其造價共為三百萬兩，可是經手的李鳳苞，便侵吞了回扣兩成，共為六十萬兩！以此例推，其他的一十五艘共被侵吞去多少，當不難想像。定、鎮這兩條大船是光緒十一年到達中國的，因此北洋海軍便於十四年宣告成立。先是十三年四月，慈禧命奕譞巡視北

洋海口，同時還派她一個朝夕不離的總督太監李蓮英隨同前往，在一般海軍人員的眼中，奕譞尚屬次要，只有李蓮英才够得上說是慈禧本人的真正代表，因此鬧得聲勢煊赫，一般屬屁鬼的面目也完全暴露，以致引起御史朱一新的嚴重參劾，甚至說到「深宮或別有不得已之苦衷」！其實別的「苦衷」也不見得有，無非因為這也是一個最有油水可揩的閥差事，因而順便叫她的達英去撈一把，同時達英與她的關係既然不可分，無論蓮英在任何地方所受到的恭維，她也就「如同身受」就是了。我上文提到同治一朝，慈禧還沒有十分的胡作亂爲，但何以到這個時候，她便變得如此猖獗呢？原來在光緒七年，她已經把慈安太后毒死，十一年藉口中法事急，更把奕訢趕出軍機，所有軍機大臣，都換上了她自己的親信，於是她乃大權獨攬，一切可以爲所欲爲，惲毓鼎說：「辛巳後（按辛巳爲光緒十年）土木游宴之風始盛」見惲著「崇陵傳信錄」，便可看出慈安死而奕訢去，乃是清廷愈趨於腐化的基本原因。縱慘敗，寡廉鮮恥，既有慈禧在上面大力提倡，因而貪污糜爛之風，乃瀰漫全國。著「東方兵事紀略」的姚錫光批評當日的北洋海軍說：

「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掣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遼南

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

果然，甲午八月黃海一戰，乃被日本打得大敗，再經五個月，所謂北洋海軍者，乃在威海被日軍殲滅無餘，而擁有洋槍洋炮的淮軍，也幾乎無役不湊，卒至不能不尋求和，李鴻章親自前往馬關，也僅以身免。當日論我海軍之失敗者，謂日本的船小而新（日本最大的松島旗艦，便只有四千二百七十餘噸），炮少而快；這兩點我太不如敵人，其實這還只是皮相之論。

我們要確切認識日本的明治維新，他們自始便是把改革政治文教和建立近代化的海陸軍與發展工商業齊頭並進，在甲午戰爭的時候，日本憲法的頒佈已歷五年，議會的召集已經是第三屆，預算決算的制度，久經確立，凡預算上用於軍事部門的經費，不僅是明治天皇不得不過問，即他們的內閣又豈能亂用一文？中國沒有意識的洋務運動者，其想法剛剛與此相反，他們以為只要有了類似外國的近代武裝便可對付外人，有了工業製造便可抵制洋貨，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甲午之戰便是這樣敗的，換言之，非完全敗於軍事，而實乃敗於政治。有人要問，像這樣一種明白淺顯的道理，難道當日便沒有人能見及此嗎？我可以回答，有是有的一，可惜太少，而且屈居下位，人微言輕，無人肯聽，便沒有人敢照着去實行，例如著「盛世危言」的鄭觀應便會說：

「……西人立國，……亦有體用，育材於學堂，論政于議院，居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當時留學法國的馬建忠寫給李鴻章的一封信上也說：

「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爲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爲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爲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蒞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見馬建忠「通可齋記言記行」「記言」第二卷）

像這類的話都說在甲午以前，尤其黃達憲的「日本國志」對日本的維新，更有詳細的紀載，是何等的深切著明，可惜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滿腦筋爲舊觀念所充塞，張尤其被無數線裝書弄得昏憤糊塗，總以爲多買船，多造砲，多開幾處紡織廠，便可以強兵，便可以富國，乃卒召致甲午之敗！

甲午一役其影響的惡劣，實遠在過去三度的對外戰爭（兩度鴉片戰爭，一度對法戰爭）

之上，不獨洋務運動完全破產，國家也快到無以自存，於是代表維新派的康梁，代表革命派的孫中山，乃同時並舉，起而要求政治改革。這個時候，革命的機運還沒有成熟，於是康梁的維新運動乃首先登場。好容易做到一個「百日維新」，但卒為貪位懇懃的慈禧，頑固守舊的榮祿剛毅，以及投機取巧的張之洞袁世凱等所活活扼死！一般維新志士，有的是殺了頭，有的是被充軍，有的是被革職而且失掉了自由，在北京，在全國各地，所有的新氣象皆被一掃而空，一個柔弱而有心向上的光緒皇帝，不僅被拉下寶座來，乃至弄得性命也幾乎不保！無數頑固守舊的分子，一個個笑逐顏開，所有在維新期間丟了官的人們乃又一一抱笏登場，彈冠相慶！以這樣一羣人擁戴著一個昏庸貪殘的老太婆來指揮一切，這便為「義和拳」安置了一座發育滋長的溫床，同時也就為一切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鋪平了一條蹂躪中國人民的道路！

平心而論，所謂拳「匪」是可以原諒的，惟有這般只為個人打算，不知天高地厚縱容這班「拳匪」來從事排外的人們，才真是不可原諒的。慈禧也畢竟不是一個完全不能考慮利害的，截至這個時候為止，她已當國三十九年，又何至愚昧到不知中國一國決不能與世界列強為敵？她之所以陷於這樣一個重大的錯誤，其原因可以說相當複雜：一、她當國的時間這樣

長，眼見外國對中國的欺侮侵凌，也真是豈有此理，她安得不異常憤慨？二、戊戌以後，她更痛恨外國人，她恨他們保護康梁，又恨他們同情光緒皇帝，她也恨外國人使她的廢立計劃不能實現。三、在她左右的一般人，其知識高於她的並不多，又為她的積威所規，縱有不同的意見也不敢向她侃侃直陳。四、她的教育程度畢竟有限，平日大致只能聽聽戲看看小說，從戲劇和小說中，加強了她對神權的迷信，當然也是可能的。五、數陳富國強兵的洋務論她還勉強可以聽得進以外，說惟有澈底改革中國舊有的政治制度和文教設施才能謀國家的長治久安，這種道理她當然不懂，因此她惟有頑梗到底。及至聯軍攻入北京，倉皇出走，她乃泣不可仰，這可見她畢竟是個女人！

當拳變初起，孫中山已謀起義於廣東，唐才常等則籌劃到長江一帶發難。（其時孫三十五，唐三十四，正是生龍活虎之年）。孫曾透過何啟遊說當時的香港總督 Blak，要他勸李鴻章據兩廣獨立；唐也透過日本人，對張之洞表示願以自立軍掩護他割據兩湖，與滿清政府脫離關係；惜乎李張均不足以語此，而張且掉轉頭來，在兩湖大殺與自立軍有關人士至三百人以上，這也是張之洞在這一幕中最不可寬恕的一端。

慈禧自庚子九月在西安建立行在政府以後，迄翌年十一月重回北京，一直到光緒三十

年日俄戰爭結束以前，在這五年之間，她也確實做過若干適度的改革，前一期大抵出於榮祿的建議，後一期則與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有關，但此五年間改革的事項，並不能超出康有為「百日維新」的範圍。可是，在庚子十二月下詔變法的時候，却要附帶把康有為痛罵一頓，用其言而棄其人，這也足以證明她毫無誠意，毫無悔心。等到日俄戰爭的結果，日勝俄敗，從此朝野都確信非立憲決不足以圖存，於是她也就順應潮流，有九年預備立憲的宣佈，其時她的高齡已經七十有一，她想再有九年，她是否尚在人間且不可知，因此樂得以此來相敷衍，相推宕，其實在她的心目中，並愛新覺羅氏的祖制也不管：例如滿清祖制不許女后垂簾干政，她却一而再再而三非垂簾不可；祖制不許太監出北京一步，她却放縱安得海、李連英到外面大肆招搖；祖制不可預建儲貳，她却要豫立大阿哥以代光緒；她的個性是這樣頑劣，即令及她之身而立憲有成，又豈是一部憲法把她束縛得了？好在光緒三十四年她畢竟死了，除放出最後的毒餌，拖着光緒帝同死，並從奕譞這一枝再擰出一個小皇帝以外，她也就再無可為；而載灃的資望與能力又不如她遠甚，因此在她死後不到三年，武昌革命軍的義旗一舉，滿清卒告滅亡！傾覆滿洲者果然為一葉赫族的女子，其時距葉赫之亡與布揚古之死，凡三百〇八年。

(原載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十日自由人)

爲邊界緊急事態敬告香港有力人士

目前香港所遭遇的大陸餓民入境問題，以我所了解，恐怕是香港有史以來所碰到的最大難題之一；即以當年日本武力進佔香港來比較，也僅有此嚴重，而無此複雜。

我們要求得問題的解決，或先求得這一緊張情況的和緩，都必須先對問題的本質有明確的了解，或至少對問題的可能變化，先作多方面的推敲。

第一、這個問題的延續性決不是很短時間的，而是帶有半永久性的。這個道理很簡單；周恩來在「人代會」所發表十項整理經濟的原則，我會有專文分析，我知道以大陸目前仍在

繼續推行的辦法，以及十多年來他們對大陸破壞的澈底，周恩來的所謂十項原則，幾無一字一句可以發現，而只能徒託空談。換言之，中國共產黨既不肯澈底放棄他們的基本做法，今後三年五年，他們便只有繼續製造饑民，而決不能減少饑民。現在大陸的饑民，已經不是以幾百萬計，幾千萬計，而是以幾億計，這真是亘古無比的一股洪水；香港不幸正處在這一洪水氾濫的邊緣。過去大陸人民，多少還抱有幾分希望：以為去年天時不好，今年或許好些；以往中共對他們百分之百的高壓，百分之百的擣取，現在情形變了，也或許能稍稍放鬆；再加上，海外親友，對他們十分關心，過去有若干小款，不斷的匯回大陸；近年有大宗糧包，源源的寄回大陸；這對於維繫他們這種希望，當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可是，等待復等待，這一切一切的希望，大部已經落空，或快要落空：天時不僅不會好轉，而且過去從不被水淹的地方，現在忽然有了水；過去從不發生旱災的地方，現在也遭了乾旱；共幹不能看見農田裏生產任何東西，也不許人民掌握任何物資，有即加以所謂「收購」，實際等於搶掠，共產黨向人民搶掠，不自今日始，也決不至今日止，以共產黨近年在大陸推行一切一切的荒唐辦法，他們除向人民實行搶掠以外，也別無其他良策；別人的所謂饑餓輸出，還是相對的，中國共產黨的飢餓輸出，則是不折不扣的；他們已經抱定宗旨：只許他們的黨員，他們的軍

隊，以及若干直接為他們服務的人員可以吃得飽，至於其他絕大多數人民的餓倒、病死、勞動折磨而死，他們是在所不恤的！試想想：今天大陸的人民已經完全陷於這種狀態，他們除逃亡以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但這還只能說明當前香港這種嚴重情況的一方面。

第二、當大批飢民向香港湧進的開始，我已察覺這可能是共產黨一種有計劃的行動。他們之所以這樣做，說他們只是怕干涉羣衆自惹麻煩，這還是看得太簡單，今天大陸人民的憤怒確實已經到達了爆炸，不轉移人民這一股怒氣向外宣洩，這對他們政權的威脅實在太大；他們要以武力向外侵略造成第二韓戰，他們知道他們的軍隊已經十分不穩，可能立即向他們倒戈，於是他們乃想出這一着向香港「飢餓進軍」的惡毒辦法，據連日報紙所紀載，飢民所口述，這次大批飢民之得以迅速集中香港邊境，不只是出於共產黨的縱容，而且是出於共產黨的指導！香港如果不加阻止，大量予以容納吧，你容納十萬，他們可以來五十萬；容納五十萬，他們可以來一百萬，兩百萬，五百萬，……以至於無窮！這正是他們「人海戰術」的一種活用！如果加以阻遏，甚至因雙方的偶或不慎而造成慘案吧，共產黨更是「製造慘案」的專家，他們還會在飢民的後邊拋擲手榴彈，開動機關槍，樂得使事態擴大；到了事態擴大以後，他們又必然振振有辭，惡人先告狀向世界大肆宣傳，說香港已動用武力，對付飢民！

我們對當前香港政府的處境，真是萬分同情，而不知何以善後？

第三、共產黨這一「飢餓進軍」的目的，還不止於上面所說的這樣單純：他們現在正有事於東南亞，自印度邊境包括泰、寮、南越、星馬，無一而非他們擾亂的目標，而這一帶地區，又確與香港的安定與繁榮不可分割；他們以武裝搗亂東南亞，以徒手飢民搗亂香港，雙管齊下，他們認為可以發生一種牽掣作用，使反共的方面備多力分，然後他們才可以在東南亞得心應手，暢所欲為。就整個世界說，美國自然是共黨攻擊的第一目標，就東南亞一局部來說，英國在這一區域的潛力，他們也斷然不會忽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鑒於香港當前的狀況，英國確已到了考慮基本國策的時候了！

上面乃是就幾個重要觀點加以簡單的分析；急則治標，我們治標的下手方法怎樣？

一、中華民國在台北的政府，乃是為了大陸六億待救的人民而存在，決不單是為了保護台灣二千萬的人民而存在，無論如何困難，也必得賭乾坤一擲，立即提出一個具體而有效的辦法：征用租用乃至暫停客運，必須每天有船隻開到香港，至少運載兩千飢民前往台灣，姑以一月為期，人數不超過六萬。能以這一番支援香港政府，然後政府才能取得向世界呼籲的資格，向聯合國呼籲的資格，也才能取得與香港正式商談第二步辦

法的資格。不然，便可能引起舉世的譏評，認為我們的政府太不負責，也太無能力；何況留居香港三百萬的僑民，也是支持政府反共的一大力量，正受着共黨的威脅，更不能置之不顧呢？

二、香港有力人士，以時局迫不及待，更應立即成立一臨時組織，其參加分子，應一本人道主義與自救精神，超越中外、政治、宗教、地域、任何關係，以人力、物力、思考、支援香港政府；政府也應該對此項組織的開會派出負責代表，共同商討，以求僵局的打開，緊急事變的應付。

（原載民國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自由人）

從日本動向看中華民國前途

日本自佐藤榮作的新閣出現以後，能毅然拒絕一個以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入境，這總算是日本最近幾年以來一次難能可貴的傑作。

當中共最初得到這個被拒的消息以後，曾一度劍拔弩張表示強硬的反應，認日本這一舉措，必有「嚴重的後果」。其實，不僅嚴重的後果不會有，乃至連輕微的後果也不會有；這一點，不只我們看得明明白白，佐藤內閣也看得明明白白。

目前日本議會的黨派力量，除自民黨外還有一個次要的社會黨。佐藤內閣當前的做法：

乃是打算把對中華民國和南韓的關係加強，這一點由自民黨出面來做。例如佐藤的阿哥岸信介，已於本月六日偕同石井赴台，並攜帶有佐藤致蔣的親筆函件，而且打算以一億五千萬美元的長期貸款，作為實現日台經濟合作的初步，便可看作他們所謂加強對中華民國關係這一工作的開始。這還是日本政府黨一個比較單純的舉動，至於繼此以往，日方還要以民間姿態的團體或個人作出種種活動，以與他們政府的這一方針相策應，自然不在話下。

如何加強日本對南韓的關係，這次佐藤內閣的態度，確也相當明朗：佐藤登台伊始，便說明要恢復久經停頓的日韓會談，就表面的跡象說，這次雙方似乎都真想得到一個結論的樣子。同時，佐藤內閣更決定先以兩千萬美元，作為對南韓的緊急援助，繼此，據說還打算以有償的方式，以六億美元助成南韓的經濟建設。現在此項會談，已於本月三日在東京揭幕，困難儘管還有，如佐藤內閣與南韓當局能持以毅力，若干照例的反對聲浪，還是不難平息下去的。

對於中國大陸，尤其對於若干日本人所幻想的所謂擁有六億人口的這一廣大市場，他們當然不肯放棄。佐藤曾聲言仍當本着所謂「政經分離」的這一原則，力求對大陸的貿易發展；此外還要加上所謂「文化交流」這一項目以資點綴。不過自民黨為了顧全自己的立場或

面子，究竟不好完全由該黨自己出面，於是放任乃至慇懃社會黨及其他左傾團體或個人，以及若干惟利是圖的工商人物，去完成這另一篇矛盾百出的文章。中共這次儘管遭受彭真代表團被拒的恥辱，但他們覺得究竟還有文章可做，於是也只好以「銀樣蠟頭」的姿態，保留他們仍得運用日方左傾分子繼續實行滲透、煽動、顛覆的這一線索。於是關於鐵產、鋼材、化肥，以及燃料煤等等的交易，雙方已準備照常簽字。

上面僅就日方對中華民國、南韓、以及中國大陸的動態作一簡單的分析，至於如何具體化，自然尚待事實的展開。就中共、日共、以及韓共的一貫作風，他們當然一口咬定佐藤內閣最近的這些舉措，無非是由於「美帝的策動」，這是他們的「反美八股」，實際的內容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這樣簡單。換言之，假定日方完全無反共的需要，中華民國與南韓也無打破當前僵局的企圖，乃至中共也只知道一味橫衝直撞，根本便不願與日本保持這一不痛快的微妙關係，則佐藤內閣這一系列的做法，便將完全失其根據，即有「美帝的策動」，也決不能造成當前的這一形勢。

現在我暫時撇開日本對南韓，對大陸的關係不談，單就如何加強日本對中華民國的關係這一點，提供我如下的幾項原則性的意見。

一、加強日本對中華民國的「經濟關係」這一點，在互利的原則下是可以做的。佐藤既然承認他們對大陸的貿易可以在「政經分離」的原則下去求擴展，則除掉「真正的反共」我們也可與日本合作以外，其他純屬中華民國自身的政治問題，我們便必須保留獨立的立場，絕不能容許日本置喙，更不能接受任何束縛。

二、佐藤鑒於日本的國力漸充，公然以「亞洲第一先進國家」自命，聲言要提高他們「對亞洲問題的發言權」，不能以正確的行動與人共見，而先夸其談發出這類的言論，這是日本人傳統的輕率態度，我們不必和他們作理論上的爭辯。但所謂「提高對亞洲問題的發言權」，如果涉及到所謂「兩個中國」，或「一合一中」乃至所謂「托管台灣」這一範圍，而輕予附和或公然策動，我們便必須毫不猶豫的予以迎頭反駁，以警醒他們的迷夢。我們至少不可忽視有一部分日本人是始終不能忘情於台灣的。

三、在軍事與經濟力求進步，自然是今天的中華民國應該着意之點，無可非難。可是假定政治措施永遠無法與軍經配合，則所謂軍事與經濟的進步，也就好比沙灘上的樓台，根基不厚，結構不堅，一有風波，便立刻變為蜃樓海市。我們必須澈底覺悟：十五年前所以遭遇一度空前的失敗，軍事的脆弱與經濟的空虛，固不失為主要原因之一，但政治無辦法，要為

失敗最基本的癥結所在。過去剿共，原有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一種說法，但心知其意，而又永遠因循不肯切切實實的去做，其陷於今天的一種窘境夫豈偶然？最後我要說幾句老實話：由蔣先生所領導這近四十年的政權，原有為中國奠定一萬年不拔之基的可能性，但因為始終不肯就政治作出一「平實」、「深切」、「遠大」的設計，永遠只能枝枝節節而為之，一直到今天還不肯幡然改圖，以為拖下去便會有奇跡出現，老實說，拖的時間已經不多，不信只有人定可以勝天，奇跡是終於不會實現的！何況就外交的立場來說，我們不能以政治方法先求得大陸以外三千萬人的切實團結，便永遠只有被人牽着走的分兒呢！

（原載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自由人）

時事述評

聯大復會以後

聯大復會以後，許多人推測，以為又有一場熱烈的爭辯，但照這幾天的情況，却剛剛與預測者相反，這是無怪其然的：一切是非，早已說得明明白白；一切事實，他早已弄得清清楚楚；今天大家要看的是積極的行動，決不愛聽無謂的空談。說到開會，共產黨都是專家，只要大家願意和他們去胡扯胡鬧，在他們看來這已經算是他們的一種勝利。因為他們明白：

只要你還願意坐下來和他們談話，這已足以證明，你還沒有決心和他們硬幹，除硬幹以外，蘇聯是一切無所顧慮的。聯大演變到今天，已經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毅然決定把這個侵略者趕出會場；一是不聲不響的長期休會。就遠東一隅而論，什麼韓國問題，越南問題，這早已不是空談所能解決得了的問題了。

事實明白了又怎樣？

美國新任出席聯大的代表洛奇，前天在會場發表演說，列舉十項事實，證明蘇聯是製造韓戰支持韓戰的罪魁禍首，這十項事實的內容是這樣的：

一、韓戰本由蘇聯發動，並繼續予以支持；二、已被消滅的北韓軍，係由蘇聯命令中共參戰始得復活；三、在過去一年，蘇聯對中韓共軍源源裝備，使他們能作有效的戰鬥；四、中共軍原只有輕配備，現在則已有重配備；五、從韓國海岸所撈獲的大批水雷，證明係蘇聯獨家經造；六、共軍所用飛機，一律係蘇聯供給；七、蘇製二八式新機，亦已證明在北韓上空出現；八、共方空軍除陸續遭受大批損失外，現仍擁有飛機二千五百架以上，而且半數是噴射機，當然一律都係蘇聯供給；九、中韓共軍的飛機，已超出四千四百架以上；十、北韓所用

的高射砲，大部有雷達控制，亦係蘇聯製品。

不錯，這些都係事實，洛奇先生把這些事實歸納起來再說一遍當然也很好，實際不說大家也都知道。過去杜魯門先生以「警察行動」與「有限戰爭」八個大字，以致養痈貽患到今天，現在的艾森豪總統當然一一都已明白了，可是明白了又怎樣呢？

艾史會晤有用嗎？

邱吉爾首相，曾表示願與史達林談談；史達林曾表示未嘗不可；前天艾森豪總統聲明在三種條件之下，願在到達莫斯科的中途，與史達林元帥見面。我想不只艾森豪有三個條件，史達林也可能有三個條件：一、請美國總統與英首相枉駕莫斯科，法國參加則可不必；二、由美英代表一切民主國家，承認上次大戰後的一切既成事實；三、蘇聯決不發動戰爭，但別人要打，蘇聯却不負責。假如蘇聯的條件輕鬆到這一步，我不知道美總統與英首相是否欣然命駕？

我自然不希望艾史晤面之說，只有一種「趣談」，我尤其不希望向史達林去作「和平請願」會變成未來歷史上的一大「笑話」！

再武裝與再投降

最近因為中共表示願意遣回留在中國大陸的日本俘虜，於是一般對中共存着幻想的日本人，乃大肆活動，實際已有不少的日本代表早已到達北平，而且商討得有相當的結論。除了接回這一大批的日俘以外，日本代表之去北平，還有不有其他的使命，則我們不得而知，但日本人沒有放棄和中共大做生意的念頭，而且事實上也早已做，這却無法否認。

蘇聯的飛機隨時侵入日本的領空，甚至飛到東京上空偵察，這大抵都是事實；而且只要五顆原子彈便可把日本結束，這也並非是不可能；我們不了解日本當局乃至日本人民面對這種事實，究竟準備怎樣？

日本今天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美國並無永遠為日本守門的義務；我們也早說過，史達林對於日本的再起，絕對不能放鬆，今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換言之，假如日本沒有決心準備以武裝自衛，便只有出於再投降之一途。現在已經是日本選擇於再武裝與再投降的嚴重關頭了。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自由人）

吉田能硬到底嗎？

吉田在上次組閣時，我們即有這樣一種逆料：假定他不願，或不能成立一合理的聯立內閣，他這次的內閣生命，即無法維持長久，醜醜復醜醜，乃卒有此次的不信任案發生。本來，吉田之所以能造成一長期秉政的形勢，其原因在外；其所以日趨削弱，而卒演成當前的現狀，則原因在內。

自然，在今天而要主持一個國家的大政，國際的支援，確實是少不了的，可是假定自身沒有確然可以自立之道，國際的形勢即最有利，也終於無法維持。

日本在過去的七年，其政局隨時都有一種國際力量在那裏左右，但同時亦有一必須擺脫國際而求得卓然有以自立的代流；這種情形，尤其在與各民主國家訂立和平條約儼然成為一獨立國家以後，表現得更為迫切。自由黨外的黨，與自由黨內的派，隨時都有一種不利吉田的醜醜，一有機會，必然乘機爆發，我們不能完全解釋為一種權利之爭，換言之，吉田內閣之繼續存在，所及於日本國家的利害，亦確實有其必須考慮之處。

即以建軍一事而論，在吉田自以為他的態度是很穩健而且是頗為巧妙的，可是在當前的國際形勢，無論就任何方面去着眼，都無法使這條吉田路線繼續的走下去。換言之，你不想過度的去刺激甲，同時則不免開罪於乙；你能博得丙的同情，同時亦無法博得乙的滿意；自

處於小媳婦的地位，而想以一種圓滑的態度，周旋於兩姑三姑之間，其陷於今天這樣一種狼狽的形勢，這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在上次吉田組閣中，我曾為他策劃，最好是擇可合作者儘量合作，而成立一合乎多數國民期待的聯立內閣，這是就吉田自身所具備的強點與弱點不得已而必須擇取的一種辦法；即為日本打算，也只有此一途。

我承認，就到現在，吉田還是具備得有相當雄厚的本錢，質言之，即在這次的大選，他也還有可能獲得較大的多數，可是，假定他不能向聯立一途邁進，又不能使他的政策趨於明暎，即令能再有吉田內閣出現，亦將必陷於搖搖不定，百事無一可為；果不幸到了這樣一種境界，其貽害於自由黨者尚輕，貽害於日本這個國家者實在太大！假定吉田不徒然在稱位以自娛，對國家還有相當的責任感，這實在是他一個應該好好考慮的時候了。

馬倫可夫高叫和平！

馬倫可夫十五日在他們的第四次最高蘇維埃會議中，發表了一篇演說：除改組政府的案子照例請求該會議予以通過而外，乃特別針對國際現狀，高叫和平。他的話似乎比過去史達

林所說得更為具體：他不僅強調了可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平相處，他還表示可以遵守國際間所訂的一切條約，甚至於他還特別提出美國，認為也可以彼此相安無事。

這些話，在我們一個自由中國的人聽來，真是要笑掉牙齒！蘇聯也還懂得所謂遵守條約嗎？過去蘇聯和中華民國所簽定的條約也不算太少，並且還明明白白在條文上表示過只承認國民政府，可是後來怎樣呢？

不過，蘇聯在當前的情形之下，他們還需要暫時的和平却不一定是真的：他們所有一切對內對外的問題，確有在暫時都求得一個安定局面的必要。毛羽未豐滿者，不可以高飛，烏倫可夫這個初生之犢，他似乎並不是不明白他自身所有的弱點，看他對內的一切布置，總還是在一個力求安定的原則之下，在那裏執行；甚至就對衛星國家的偶發事件（例如捷克總統之死），也在那裏竭力彌縫，惟恐暴露了蘇聯的破綻；然則他現在還要高叫和平，甚至不惜向美國眉來眼去，其心情是不難了解的。

假定在三月半年之後，他們的內部可以相安無事，一切衛星國家也無顯著的問題發生，您看他還會買美國的帳嗎？又是民主國家一個上當的機會來了，我們且注意美豐的態度怎樣吧！

和平真有可能嗎？

自烏倫科夫繼史達林掌握蘇聯大權以後，莫斯科便不斷放出種種的和平空氣，假定蘇聯在目前仍沒有發動大戰的必要，他們的這種和平願望也可能是真的。

維辛斯基回到聯合國以後，也許有一具體的和平案提出，其內容可能包括下面的各點：

- 一、凡蘇聯在二次大戰後所既得的種種，絲毫不能動搖。
- 二、美國承認中共，並歡迎中共加入聯合國。
- 三、蘇聯和日本依據舊金山和約訂立雙邊和約，由日本永遠放棄兩庫頁島、千島羣島。
- 四、美國重申雅爾達協定繼續有效。
- 五、美國停止對西歐和日本建軍的督促與援助，並撤退在歐的駐軍。
- 六、美國停止援台援越。
- 七、假定美國對上舉各點在原則上可以同意，蘇聯即可命令中共與北韓結束韓戰。
- 八、韓戰停止，越南亦即不難如法泡製。
- 九、在韓越兩方的戰爭停止之後，自然也可商量全面的裁軍問題。

凡此等等，自然都是蘇聯可有的如意算盤，所成問題的，便是艾森豪能不能，願不願向馬倫科夫遞上這樣一封降表？假如可能，而且願意，則美國必須繼續出賣自由中國，必須甘心承認美國十幾萬青年在韓戰場所流的血都是白流，不僅放棄朝鮮，而且更放棄日本，同時也就是放棄整個的亞洲，美國同時退出歐洲，即是說美國依然返回到門羅時代！如果說艾森豪威爾不能這樣做，也不願這樣做，則他的對案我們也不難想像：即解放所有蘇聯的衛星國家，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無條件的停止韓戰越戰，蘇聯依然關起門來，去建設他們一國的社會主義！

今天的形勢已確實尖銳化到了這樣的兩極端，其間何止十萬八千里，居然還有人一聽到這樣的和平唱片，便欣然色喜，奔走相告，這一班搞國際政治的人們，不現實到了這樣的程度，這真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一大奇蹟！

中共遣還日俘

二次大戰後留在中國大陸的三萬名日俘，已正式得着中共的同意開始遣送回國。最近由秦皇島和上海開出的兩艘日輪，載有此項俘虜近四千名，已於昨日（廿三）抵達日本的舞鶴

港，繼此當陸續有所遣送。

我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這樣的：

日本站在國家的立場，當然不能聽他們幾萬人的人民自生自滅的留在海外，他們要交涉運回，這在原則上是很對的。我們所應該注意的，乃是中共這次為什麼居然這樣慷慨！中共在這幾年中，究竟對這羣日俘做過些什麼工夫？他們這幾年在大陸所過的生活怎樣？我們不大清楚，但中共在此時居然把他們遣回，其用意是不難明白的：

一、中共確實想對日本賣一點好感，尤其在民主國家和日本先後訂立了和平條約以後為然。

二、他們很想把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加以沖淡。

三、日本果真重建武裝，這在中共不能不認為腹心之患，能够加以和緩，自然是有益無損的。

四、日本人未能忘情對大陸的貿易，這是中共所了解的，在民主國家對大陸加強禁運以後，中共當然也想多開闢輸出入的途徑。

五、在此時配合蘇聯的和平攻勢，如此一做，當然也像具有價値的樣子。

六、在此一大批日俘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是受過中共嚴格訓練的，而且可能有少數已經是共產黨，把這羣人滲透到日本的各方面去，自然可以發生種種的作用。

我們知道：共產黨不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而且決不採取毫無意義的行動，在此時送還日俘，這在中共確實是有若干的妙用的，日本人當心一點吧！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自由人）

不幸的英美歧見

人與人相處，和國與國相處，都有其一定的分際，一超越這一定的分際，便難免不發生歧見和衝突。

關於當前世界整個的局勢，英美間不無多少不同的看法，並且也會採過若干不同的步驟，這是事實。可是這樣不幸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不難諒解，也不難和緩消弭於無形，只看雙方負責當局的手法和態度怎樣？

遠在兩年前，我們便曾為英美間可能發生的歧見抱過憂慮，當時我們的建議是這樣的：凡屬原則性質的方面，英國最好多尊重一點美國的意見；凡屬運用原則的技術方面，美

國也最好多尊重一點英國的意見。在歐洲，尤其在英國利害關係複雜的地帶，美國最好多推重英國一些；在其他地帶，尤其是太平洋，則英國却應該多推重美國一些。

我這種主張雖太近乎理想，但確實也只是一種低調，因為我知道：人與人相處，不宜損害對方的尊嚴；國與國相處，更絕對不宜損害對方的尊嚴。

據我看，英美兩方最近所發生的爭執，雙方在言論態度上，都多少不無遠越範圍之點，最好能够及時加以糾正。解決當前一切複雜的問題，一一須訴諸我們的理智，激越的感情發揚得過度，確實是於事實無補的。

我們希望英美兩方，在一個英美不可分、不能分、不宜分的原則之下，彼此多作一番冷靜的考慮，尤其在最近期間，凡足以引起對方特別不快之感的行動，更宜極端的謹慎。舉例言之，如美國對援英的費用特別予以削減，或邱吉爾首相竟撇開美國，單獨與馬倫可夫去會談，都是應該極力避免的。

日本明仁太子訪英

因為英女皇加冕的典禮，日本鄭重其事，特以明仁太子前往參加，我覺得這實在是最有

意義的一個舉動。最近我在東京看過幾次電影，凡涉及明仁太子在旅途中的新聞片，都極能引起一般觀眾的注意；尤其看見他在夏威夷、舊金山、加拿大等處受着當地日僑那樣熱烈的歡迎，更使得大家非常感動。可是假定這位太子偶有一個舉動不大自然（例如帽子不會戴得十分妥當）却又引得大家鬨堂大笑。我覺得日本人的這種笑聲，絕不會影響到太子的尊嚴，我只覺得這是日本人民對皇室的一種親切之感。日本的皇帝已經不是一個神，只是一個人，這是八年以來日本實行民主一個最大的進步。

在過去，無論是中國或日本，一位像太子這樣身份的人要到外國去走走，可真是不容易的。我記得在戊戌以前，即有人建議要光緒帝到外國去遊歷，儘管光緒帝本人並不反對，但格於當時的成見，究竟不能見諸事實。根據日本現行的憲法，日本皇帝在實際政治上原是不負什麼責任的，但他究竟是全國團結的一個象徵，讓他到外國去增加許多見聞，更多學習一點民主風度，這實際對於日本未來的政治，也還是間接有益。

日本當前的政象

這兩天日本的政象，好像吉田還是要倔強到底，我們只看他把對重光的約晤突告取消，

便使人意識到這是日本未來政治的暴風雨將要發作的一個信號。

假定吉田所採的這種態度只是由於他本人的一種個性，關係尚屬輕微；假定吉田所以寧然採取這種態度的裏因，是因為他對於改進黨或其他黨派已經有了特殊的辦法，則對日本政治未來的影響，便可能更為惡劣。好在事實在幾天之內便要揭開，我們且稍安毋躁的等待着看吧。

我們覺得日本的政局需要安定，大家既無法抑止左派的趨於團結，便不能不希望一切的右派也能團結。我相信吉田也決不會反對團結，但團結之道只能在誠意與正當的方法之下行之始能有效，否則譬如治絲益棼，這對日本的政治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自由人）

台灣的米價

對於台灣的動靜，這是一切流亡在海外的人們所關心的，聽到一個關於台灣的好消息，大家一定欣然色喜的奔走相告；反之，聽到一個不好的消息，總希望它未必一定確實，或者有不容易為外間知道的特殊原因。

可是，有一件事，總是爲大家所一致放心的，便是以台灣可能生產的糧食，養着台灣現有的軍民，總無論如何有多，而決不會不足。

他們的這一判斷，係根據下面的幾點事實：

一、農復會這幾年仍繼續在台工作，且得着美國較多的經援，大家都相信他們的工作，一定於糧食增產有益。

二、軍隊的經理，一致公認比以前辦得好，像在大陸上那樣的浪費，應該早已絕跡。

三、台灣的地面不大，而且四面環海，加以稽查嚴密，如過去定私、屯積那類的惡劣現象，也應該沒有發生的可能。

四、台灣中央與地方的行政當局，都會表示過台灣的糧食有多，每年有十萬至二十萬噸可以出口。

五、最近台灣並沒有發生什麼不可抗的災害。

如此等等，都足以說明台灣的糧食決無問題。

但不幸最近發生了一度糧價的波動，數字而且相當的可驚，一直要等到美援的小麥和麵粉大批湧到（見二十五日香港時報），才使得這個形勢漸趨和緩，而且誰也不敢擔保類似的

事實，在將來便絕對不會再度發生。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是不是台灣當真發生了極荒的事實？或另有其他的理由？我們確實不大明白，希望有關當局加以合理的說明，使得一切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們，減去他們一種不必要的憂慮。

和談忽然秘密！

板門店的和談停而再開，據說聯軍方面的新案已有重大的讓步，可是共方代表依然無權決斷，又得再行停會一星期，以靜待莫斯科和北平的訓令。這次的會議沒有公開，真象外間還不明白，但世界上的共產黨，自有歷史以來，便從來沒有痛快過一次，萬一他們又有新的對案提出，聯軍是否準備再讓？

總之，六月是一個嚴重的關頭，所謂三國會議，也可能與板門店有所配合，假定六月內依然停不下來，恐怕便只好一直打下去了。

蔣代表回任

出席聯合國的首席代表蔣廷黻，據說已於今日飛返任所，這多少有點出我的意料之外，依照他在台灣所說的種種，我幾乎懷疑他不再作回任的打算了，但他畢竟回去了，蔣代表的忠勇，實在是令人感佩的。

年來我們也期待政府對外交陣容能够相當的加強，最好除聯合國外，對美歐亞三方，各有一個像樣子的重點，站在這三個重點的人員，應儘量把做官和坐領外匯的人們減少，一定要他們有所活動，表現成績，否則單靠在聯合國內一處的奮鬥，實在是太孤單了。

英美法會議

英美法三國會議已在籌備中，美國已一再聲明，她之召集這一會議，並不是為開四國會議的預備，所謂五國會議，當然更是妙想天開！

英美間的歧見能否消弭，這一會議當然大有關係，但美國對英將有所讓步，是我們所不難想像的。不過讓步的條件只是民主一方團結的加強，而決不是向蘇聯靠攏；我們對邱吉爾首相的基本態度依然不發生懷疑，但此老歡喜表演驚險的鏡頭多少有點令人害怕就是了。可是假如您約略的知道英國當前內在的實況，則邱吉爾首相不得已而來這一手，您對於一個懂

得現實的政治家總還是可諒解的。（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自由人）

日本有力者發起防衛協會

據前天（六月一日），路透社和中央社東京專電，日本一部分的舊軍人與金融界領導人物已聯合發起組織「日本防衛協會」，並於今天（三日）即可宣告成立。所謂舊軍人包括前駐美大使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河邊正三等；所謂金融界領導人物，包括日銀總裁一不田尙登、東京工商界聯合會會長藤山愛一郎、及前工商大臣岸信介等。

據中央社說，該組織係全國性的，第一步計劃，即準備以日金五千萬元用於文藝集會方面，以激起日本民眾的愛國主義與自衛精神云云。

我覺得，日本在今天有這樣一個推動再軍備的組織發起，可謂正合時宜，而且可預卜其前途無量。

無論世人怎樣愛好和平呼籲和平，只要像蘇聯這樣一個侵略的野心國家還不會倒下去，戰爭終於是避免不了的。

日本在上次戰爭中之所以失敗，乃失敗於他們單弱的政策錯誤及科學之確不如人，決不

是失敗於他們人民之不够勇敢。

日本目前的一切一切，已十足具備一個一等國家的資格，所不如人者，僅僅只有軍備一點。

以日本目前人口的繁殖之速，土地之小，資源的貧乏，各方面市場不容易打開，她當然是非向外發展不可的，所謂「防衛」云云，這不過是一種初步的說法，就將來論，當然不是「防衛」所能了事。

像蘇聯這樣一種國家，自己既領有廣大無邊的土地，擁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豐富資源，已經奴役了全世界七億以上的人民，而是野還心不死，仍在繼續不已的隨時隨地發揮她侵略的凶險，請問：我們除掉齊心協力把這樣一個國家打倒、支解以外，還會有什麼真正和平的道路可走？

在今後的十年，全世界自由人類的歷史使命是很顯然的：一、切實制止蘇聯及其走狗當前的一切侵略行爲，例如目前的韓戰越戰，斷不能敷衍了事；二、從歐洲把東歐一切被奴役的國家解放，至少把蘇聯人一律驅逐；三、從亞洲把中國大陸包括新疆、蒙古、西藏全部解放，使她成為一個統一、獨立、和平的民主自由國家；四、支解蘇聯，她所能領有的土地，

只能以足夠他們兩億人民營和平生活為度，所多餘的，應分配於世界一切土地不足的國家。

日本目前還有不少搖擺不定的毛頭小子，也有不少迎合潮流的投機專家，但我確信：日本這個民族，確有其優良本質，她決不會背棄自由世界而為這一股惡潮捲去。所謂「日本防衛協會」的發起，這不過是日本人發揮這種優良本質的一個開始而已。

蔣胡組黨

假定果如最近國民黨發言人沈某所說，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還是依然有效，還是應該由大家去一致擁護，那末，凡屬中華民國的公民，便應該人人有組織政黨的自由！不問您用公開的、或祕密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手段，去妨礙或制止別人組黨，便是一種無可辯護的「違憲行為」！

據前天（六月一日）合衆社和泛亞社同從台北發出的專電，說出席聯合國的首席代表蔣廷黻，在他最近的留台期間，曾向人表示準備組織「中國自由黨」，而胡適教授也可能參加為發起人之一。這個消息，在蔣胡方面只是舊話重提，半點也值不得驚異；所可引起我們注意的，只有他們兩位都是最近會在台灣作過多方面接觸的人物。

就我所知道，今天確實還有少數的落伍分子，天天在那裏從事反民主、反自由的違憲行為。可是今天留在海外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百分之百非爭取民主自由不可。他們這種爭取民主自由的决心，可以說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我主張：不問蔣胡等的組黨能否成功，一切愛好民主自由的人都應該堅守立場，好好的分別團結，組織不怕小，小一樣可以有力，等到時機成熟便不難匯為一股洪流，讓這班落伍分子在這洪流中活活的淹死！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三日自由人）

南韓的悲壯

從純正義的觀點看韓戰的現狀，確實是令人悲憤的：

追溯韓戰之所以起來，乃由於蘇聯嗾使北韓對南韓加以侵略；韓戰之所以擴大，又由於蘇聯命令中共參加；禍首罪魁，其為蘇聯，自屬毫無疑義。美國倒率聯合國毅然對共匪加以反擊，聯合國更進一步宣布中共為侵略者，全世界輿論翕然，則心存綏靖的少數國家，也為這種正義的空氣所逼，只好站在一個服從多數的立場，一時不敢採取何種異動。

不幸曠日持久，像這樣一個局部戰爭，乃延長了三年之久，金錢的損耗以美國為最多；

吃苦頭以南韓爲最大；中共「打腫臉充胖子」，有苦說不出；一旦蘇聯認爲時機到了，不能不以結束韓戰來配合她的另一戰法，於是遷延了兩年的停火談判，乃忽然急轉直下，而得到了目前的一種進度，可以說停戰已成了既定的事實。

以戰爭來陷美國於張皇失措的是蘇聯，以停戰再陷美國於「爲德不卒」的也是蘇聯，假定韓戰真是這樣結束了，南韓所受的威脅，自然只有加於三年以前；美國所受道義上的損毀當然更不是任何物質上的損失所能比擬；以傀儡資格奉命維護的北韓與中共，最多也只能扮出一副苦笑的鬼臉，而博得一個「能戰」的空名；而所有關於這一戰爭的實際收穫，乃一切一切爲蘇聯裏括以去！

蘇聯從這一戰贏得了三年的備戰時間；從這一戰暴露了民主國家無數的弱點；從這一戰她加強了對東西衛星國家的控制，也確確實實探了她的唯一對手美國作戰的能力，乃至美國所能領導其他民主國家的一種限度！

最近兩年，我們在本刊曾不斷的呼籲美國要選擇她的對手，千萬不可賣出很大的氣力和北韓中共這類的下屬去糾纏，因爲我們明明白白的知道：不痛擊蘇聯，世界問題永遠不會解決；不痛撃中共，亞洲一局部也永遠不會安寧；不幸，美國既無打蘇聯以解決世界問題的企

國，又無打中共以解決亞洲問題的打算，於是一錯百錯，乃陷於如今這樣一種苦境，而完全墮入了蘇聯所預設的一個陷阱！

麥克阿瑟在兩年前知道打中共決不會引起世界大戰，實際上美國如果在開始干涉韓戰的時候即以同等的力量來壓迫中共，則韓戰也許三個星期即可結束，何至要延長到三年？即令不幸因打擊中共之故而引起蘇聯的直接參戰，等到斯太林一命嗚呼，蘇聯在歐亞一切的衛星國，乘此時機也便會紛紛樹起獨立的旗幟，而使蘇聯趨於瓦解，而所謂三次大戰也就早已光榮的結束了哩！

截至目前為止，韓戰的前途大致會如下面的一種形態：

一、南韓儘管作一種悲壯的表示，但一時的休戰總是要休下來的。

二、所謂「政治會議」，在半年內斷然談不好，實際一輩子也談不好，要靠口舌爭取韓國的統一與獨立，可謂清天下之大善。只要蘇聯認為非打不可，當然隨時可以再打，一切的主動在蘇聯，美國惟有聽憑擺布。

三、所謂五個監視俘虜的中立國家，波捷本來是幫凶，原無所謂中立，印度意存偏袒，以取悅中共為原則，當然會和波捷打成一片，於是瑞士瑞典便成了配角，一切只好聽人之所

爲，還有什麼話說？

四、南韓是作戰的主體國家，如不得南韓的同意，印度便居然派武裝部隊進入韓國，真是豈有此理！尼赫魯浪出風頭，愛管閒事，如果和南韓發生衝突，真也是自作自受。

五、更滑稽的，是讓共方派遣代表以九十天的時間去說服這幾萬不願回去的俘虜，還還不知道要演出多少的悲劇，真是開千古未有的奇聞。

六、中共想藉此機會混進聯合國，希望依然甚微，不過還是很難說，今後更有什麼人能判斷美國的真實態度呢？

七、政治會議一旦開幕，中共與北韓，便會同時在北平和平壤舉行勝利慶祝，本來，以兩個這樣的下駕，居然和美國所領導的聯合國打了三年，即令多死幾個人，還在他們原不在乎，要他們不自以爲勝利，這是不可得的。

八、有人依然抱樂觀，以爲美國之斷然主張停戰，只是戰略的改變，艾森豪一定還有第二篇文章，據我看，也不見得。
（原載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自由人）

大凡一種複雜的事象，或經過周密的設計而構成了一種力量，便不是用一種簡單的方法所能對付得了的。

共產黨在中國的宣傳，已經有了三十年以上的歷史，一個投機靠攏的分子，自然多少受了這種宣傳的欺騙，但一個真正的反共者之所以形成，也還是因為他對共產黨的這類宣傳未肯加以忽視，或進一步更能予以澈底的研究。

共產黨控制了全世界的八億人口，即不為蘇聯勢力所直接控制的地帶也感到皇皇不安，隨時都受着共產黨嚴重的威脅，這不完全是憑着他們的武力，實際是巧妙的運用宣傳做了他們的武器。要鑑別共產黨一切宣傳品（包括文藝作品）所含的毒素，自然是不太容易的，但假如你只採取一個簡單的方法，運用政治力量，一律加以禁止，或一舉而焚之，這不但無損於共產黨的毫末，且還足以增加其氣氛，因為自來歷史上執行焚書禁書的人，並沒有一個是成功的，而只足以證明你除此以外，別無其他更有效的辦法。

如何才是防止共產黨宣傳有效的辦法，說來話長，但舉例言之，則有如以下的各點：

一、一個國家的正常教育，必須辦到充分的健全，對一般青年學子，必須使他們有較多方面的興趣，假如他們懂得共產主義不過是世界許多荒謬學說的一種，而且今天許多共產國

家所實行的，比較這種學說更荒謬到一百倍，只要他們有這樣一種基本認識，你就讓他們去接近共產主義的讀物，也就不會有什麼害處，或者還可能認識得更清楚，而增加他們反共的決心。

二、人總是要去尋求精神食糧的，大凡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國家，他們一定是百家爭鳴各說各的理論，各舉各的事實，他們出版的書刊，真可說是滿谷滿坑；這些東西不一定都是很健全，但量多了，究竟讓大家可以比較，可以選擇，可以抵消，至少利多於害。假如你把一個國家造成了文化的真空地帶，或對共產主義以外的任何刊物，也一定要吹毛求疵，加以一筆抹煞，老實說，這真是共產黨所求之不得的。

三、說到最基本的，還是要政治能給予人以正當的希望，要使大家都感到民主政治的推行，確實比共黨專政為合理，為比較的多有人味，然後大家才會對共產黨「望望然去之」，否則「猶吾大夫崔子也」，狗肉與羊頭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區別，你儘管說你的是如何如何好，共產黨是如何如何壞，也還是難於使人加以接受的。

最近艾森豪總統會對美國一部分的學生演說，他不贊成麥卡錫這類的「焚書論者」，而主張學生不妨到圖書館去看看共產黨的書籍，這證明艾森豪對美國的政治與教育確實有了相

當的把握，站在民主的立場，我覺得他這種說法是相當的穩健的。

共產主義在中國流行，最初是從日本文間接輸入的，毛澤東所見到的「共產黨宣言」，便是陳望道根據日文的重譯本；事實上凡有關共產主義一切書籍的出版日本確較中國為早，十七年前我在日本各書店所看見的共產書籍已經是到處充塞，這次去看反而少了許多，一家專賣共產書籍的內山書店，更是門可羅雀，共產邪說何以在日本難於推行，一到中國乃成了洪水猛獸！這個道理不也耐人尋味嗎？

日本再軍備的重提

最近日本吉田內閣的保安廳廳長木村，會有建一個二十萬人保安隊的提議，這確實是一種最合時宜的說法。

像日本這樣一個國家，就她所處的環境與工業潛力，假如她沒有足夠自衛的力量，確實是太危險了！

立國絕對不能專靠別人，最近的南韓便是一個顯明的教訓，說靠美國的駐軍可以保衛日本，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可恃惟有希臘軍，可恃惟有希臘刀，自由非可將人托，自由托人空徒勞！」這是權命「哀希臘」詩中的警句，頗為一切日本反軍備者誦之。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自由人）

李承晚沒有錯

韓戰十足打了三年，戰爭始終是在韓國境內進行的。

南韓作戰最勇犧牲最大，但是愈戰愈強，至今聯軍的半條戰線還是由南韓軍扼守着的。

把韓國分成南韓北韓，完全是蘇聯的侵略行為；裝備北韓去攻擊南韓，又嗾使中共去越境幫凶；當然更是侵略之尤。前杜魯門總統發動聯合國援助南韓是對的，聯合國宣布中共為侵略者更是對的。

把戰爭的意義與目標完全弄清楚了，當然便應該義無反顧的作戰到底，以求得絕對的勝利，根本不應該有所謂「局部戰爭」、「有限度的戰爭」這類說法。聯軍之所以打了三年而陷於如目前這樣一種不生不死不勝不敗的局面，乃至不能不忍痛言和，便完全是由於這類不正當的說法所造成的一種失敗主義。

自美國以次，所有參與聯軍的國家，一旦和議成立，當然都可以陸續退出韓國，束身事外，充其量不過算是丟了一回面子，受了或多或少的一些損失，原沒有什麼十分的了不起。

可是你叫南韓怎麼辦呢？蒸聯多的是武器，再度裝備北韓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中共可能名義上退出，但搖身一變，雜在北韓軍中作戰，還有什麼人可能去加以鑑別？就鑑別出來了又把他們怎樣？因此，所謂停戰也者，在聯軍中其他的國家，總算還有多少意義，在南韓却是絕對沒有意義，共產黨的侵略永遠不會停止，南韓軍的應戰，也就永無了日。

至於所謂「政治會議」，更是笑話：共產黨是開會的專家，說到打仗，他們還是可勝可敗；說到開會，他們便只有勝而絕不會敗，凡會議之所以可貴者，乃在作成的決議能由雙方一致遵守，不幸共產黨却絕對無此遵守決議的習慣；而且進一步，凡決議於他們有利的，他們一定充分利用；於他們不便的，他們便隨時可視同廢紙！他們之所以有這樣態度，是有他們的哲學的：世界上只有他們才是人，你們是資產階級，根本不是人；在他們想來，以人玩弄非人，這與人玩弄猴子並沒有半點區別。如果你用資產階級常用的名詞如「信義」之類去責備他們，他們便只有好笑，因為在他們的哲學上，他們剛剛是以不與資產階級講「信義」為「信義」的！在最近的三十幾年，中國人飽受了這種教訓，所以認識得最為明白，因此凡

看見人主張與共產黨去開會，我們便只有笑破肚皮！

李承晚畢竟是位老革命家，他對這些道理已經認識得十分明白，所以他發為行動，才能如目前這樣堅決，他沒有錯，他完全是對的，單單有他這種明白的認識，便足以戰勝共產黨而有餘。

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希望美國和南韓對這件事要平心靜氣的協商，只要雙方都有反共決心，這之間便不是沒有兩全之道，至於共產黨的態度如何，這倒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羅森堡夫婦之死

經過各處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一番叫囂之後，羅森堡夫婦終於執行了死刑，這總算是最近一件差強人意的事。

自從俄國有了共產黨的政權出現，這三十幾年之間，全世界直接間接死於共產黨手裏的人，至少以數千萬計，我們今天不談人道主義則已，如果要談人道主義，便當然應以撲滅威脅整個人類的共產黨為第一義。

羅森堡夫婦出賣原子弹的最高祕密與蘇聯，這不僅只是一種單純的賣國賊，實際已成了

整個和平人類的公敵，艾森豪總統不為各方的浮言所動，而出以毅然的處置，這是很值我們讚賞的。

共產黨要保全這兩個罪犯，因為他們本來是共產黨的功臣，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奇怪的乃是法總統赫里歐也居然為他們說話，這種地方我覺得邱吉爾首相採取幽默的態度畢竟是不錯的。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自由人）

從韓越局勢看台灣

不幸的越南休戰協定，已大有於今日（七月二十日）簽字的可能，這原在意料之中，決非意料之外。

在這次談判的過程中，活動最力者，一面為蘇聯與中共，一面為英法兩國，而越盟與保大兩方則幾乎沒有說話的機會；美國的態度是默許，多少在為英法撐腰；印度為一攬媒攬保的丑角，貢獻則為共方賣力。

越局的緊張，始於韓戰的停火，美國對韓戰急於要求脫身，即斷沒有挺身再介入越戰之理，這一弱點已充分暴露，蘇聯與中共始敢於在越南為所欲為，因此，直接斷送越南的是英

法，間接斷送越南的則仍為美國。

邱艾華府之行，世人或疑其毫無成就，但軟化美國，使英國所持亞洲政策能得到美方的相當諒解，則仍為事實。我們只要看杜爾斯出席巴黎，史密斯仍返回日内瓦，則越南必成為一澈底妥協之局，即已昭然若揭。

現在韓國與越南已造成同一局勢，除掉以南韓統一北韓，以整個越南完全由越盟統治，恐怕便要實現一暫時的所謂和平局面，亦絕少可能。

據我觀察，共方對韓越兩問題，可能如現狀的暫予擱置，一面使北韓能得較多時間的休息與整理，一面亦必須使越盟於飽餐之後，能得一消化的機會。共方的最高原則，在多製造問題，多製造矛盾，而決不汲汲求任何一問題的澈底解決，目前我們所應當特別注意的，便是共方另一新問題的發起，其箭頭究竟指向何方？

最近英工黨領袖艾德禮，極力鼓吹以中共入聯合國為換取和平的代價之一；邱吉爾從華府回到倫敦以後，也公然說：「看不出不能以台灣交聯合國托管的任何理由」；究竟艾登在日內瓦和周恩來見面，關於台灣問題說了一些什麼？邱艾和艾森豪杜爾斯在華府見面，關於台灣問題又說了一些什麼？這是我們所無從知道的。然而，所謂中共入聯合國說，所謂台灣

托管說，還在成功湖與華盛頓之間，並不是一個怎樣新鮮的問題，還有去年三四月間的傳說可稽，近有聯合國內的空氣可證，而且這兩說看來是兩件事，實際只是一件事：入聯合國是中共所必須爭取的一個空名，老實說，目前能到手或不能到手，於中共的實際利害並無所損益；惟有確定台灣的地位，則中共必以全力赴之，甚至進一步裝出一種更像真的和平姿態以加強主張綏靖者的信心，亦正難說。

美國到底不會拋棄英法而斷然採取單獨行動；最近英國兩黨領袖的談話，不僅質上絕不衝突，而邱吉爾的說法乃更為辛辣；下月份工黨代表團對中國大陸的訪問，實際上應該是保守黨所贊許的，邱首相至今沒有放棄與馬俞可夫見面的企圖，必要時艾登也何嘗不可去北京走走？我們不要認為美國不許中共入聯合國的輿論絕對可信，過去的對韓國問題、越南問題，乃至對麥克阿瑟的去職問題，美輿論又何嘗不激昂，但究竟於事實何補？我們也不要誤解，美援略有增加，即為美國絕對反對托管的保證，須知道美援愈增，美國對台灣政治進步的責望必愈大，進一步看，即令台灣有一千架軍刀式的飛機，而第七艦隊也永遠不離台灣海峽一步，但道於托管說有什麼矛盾？

今日海外一千三百萬的僑民，隱然可能有喪失國籍的慘痛，其期待台灣有實際的民主改

舉，確已到達白熱化的程度，國大閉幕已經四個月，當局在當時所發出的諾言，究竟實踐的已有多少？一般政象是進步還是退步？提高一切求其在我的心情，責人從寬，責己從嚴，這總還不失為一個可以採取的態度吧！

說大話與吃稀飯

「口裏說大話，鍋裏煮咗哈」這兩句道地的湖南土話，必須加以解釋大家才會明白。原來湖南人最忌說吃稀飯，一吃稀飯便是說這個人已窮得毫無辦法，所謂「煮咗哈」者，即稀飯在鍋裏煮的一種聲音。這次周恩來率領一大羣蠍兵蟹將，到處表示關緝，今天請艾登，明天請法郎士，甚至還要請梅農，現在乃至連卓別林也得請一請了！現在大陸的老百姓，連窮得吃稀飯也無可能，而周恩來的「大話」却方興未艾，究竟不知道他這批外匯從何處括來的？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自由人）

中共真要攻台嗎？

我在本刊寫過一篇「中共攻台的『空大鼓』」，說明中共不敢攻台，不會攻台，也用不

着攻台，這是假定毛周這班人多少還有腦筋，似乎不應該胡鬧到這一步田地。但根據本月十一日周恩來的這篇外交報告，以及連日一般應聲蟲的言論，乃至關於中共以大兵集中閩浙一帶的新聞報導，又似乎真要幹的樣子。可是儘管他們密鑼緊鼓在那裏亂打亂敲，却依然不足以動搖我的信念，充其量不過擺出這樣一個姿態，或在金門大陳一帶騷擾騷擾，希望下月在聯合國開會以前造出一個討價還價的形勢而已。

不過爲台灣設想，却不失爲是一件好事：

一、台灣的空氣不够緊張，能借此把空氣緊張起來，無論在官方，在社會，能把那種「且以善樂，且以永日」的生活變換變換，總比較有益。

二、台灣本來便要反攻大陸，可是條件還不會具備，現在既有這種送上門來的買賣，當然甚爲妥當。只要金門有五萬大陳有三萬可戰之兵，海空也有相當配備，便不難予以迎頭痛擊，胡璉石覺都是能戰的將領，士氣也絕對可用，如果能消滅中共的陸軍十萬，傘兵一萬，再把他們十萬噸的破爛海船聯帶解決，這對於中共豈不是一個有力的教訓！

三、美國態度，還要經過一度試驗才有把握，這次美國正式聲明：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絕對負責，而金門大陳，則在第七艦隊的責任以外，這總算是十分的明朗化了。本來，我們

沒有責任完全交給美國的道理，現在既決定金門大陳由我們自己完全負責，防衛台澎，則由美國的海空協助，責任既是這樣分明，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我有一點仍得提醒台灣的當局：即對金門大陳，只要我們的戒備嚴密，中共依然可能不動，因為毛澤東是著名的「銀樣蠟槍頭」，他懂得量力而後進，沒有把握的仗是不打的。但話仍得說回頭：他們對金門是吃過虧的，對大陳也會經有過試探，這次不動則已，如動，這一鎗一定來得頗重，因為一擊不中，頗影響他們年來向國際所吹的牛皮，當此大陸正在水深火熱之際，如果再吃一次敗仗，全部的人心便可能發生動搖，周恩來的腰桿，也便從此硬不起了！這真是一個打擊中共最好的機會，我們在這裏打算出專號，為我們贏得勝利的將士們紀功！

還有一點也不可不預防：即中共撤開金大不管，而直接威脅台灣，我們的準備又怎樣？

艾德禮等在北平

英國工黨的領袖們艾德禮貝萬等一行，這次居然能够出來走走，我看總是一件好事。英國本土，若干年來實行節約，即令是工黨的紳士們，平日在國內大約也沒有什麼好的

吃，這次在莫斯科和北平受着盛大的招待，飲飲伏爾加和茅台，尤其是吃吃中國有名的北京菜，看看中國帝制時代的建築，也可藉此了解所謂代表工人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即令中國的老百姓是被中共的老爺們騎在頭上過着那樣非人的生活，但他們統治者的生活却是相當豪華的。

多聽多看，少發表自己的意見，凡我接觸過的英國人似乎都是這樣一種性格，這次艾貝諸君很少說話，我想他們聽過看過以後，必定能有若干心得。

工黨也是一個隨時可以組閣當政的黨，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民間團體，這次「周總理」居然大擺其架子，連機場也不肯到一到，至於毛澤東的約見，更不知道能夠賜予幾分鐘，這雖然是二流共產黨要維持他們一副對待「英帝」的面孔，但也可看出小人得志是何等的狂妄，凡是願意擺架子的人，其肚皮裏面往往是一包草，中國人非常清楚，凡對付這種人，照例是嗤之以鼻，連貴僧也不屑於去責備。

真 王

考試院的正副院長，這次居然抬出了莫德惠和王雲五兩位先生，即令考試院不是一個對

政治能生出什麼直接關係的機構，但在今天總算已經是難能可貴。要求得反共復國的成功，一黨執政的局面便早已應該過去，我們不妨假定這是一個發端。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自由人）

關於所謂「解放台灣」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之類，至少懂得他們今天並無力量可以攻台，但在蘇聯整個的世界政策之下，却非命令中共宣傳攻台不可。

一、蘇聯決不容許中共從事所謂真正的和平建設，中共果然建設好了，這於蘇聯有什麼好處？

二、蘇聯決不容許留在中國大陸的三億人民對中共發生好感，果然這三億人對中共有了好感，這於蘇聯有什麼好處？

三、宣傳和平，這只是蘇聯世界政策的一個幌子，如果弄假成真，聽憑中共向一切蘇聯的敵人去勾勾搭搭，這於蘇聯有什麼好處？

四、蘇聯自然要利用中共去鬧禍，但鬧禍的地點却以隔蘇聯越遠越好，只要喚使中共向

亞洲的南部發展，向海上發展，一定可以把中共弄得焦頭爛額，死無葬身之地，能繼續有三五年的消耗，則中國大陸的北方，勢必流於空虛，蘇聯的勢力乃可繼續向中國的北方推進。現在蘇聯在中國拿穩了的，還只有旅大到伊犁的一線，進一步便不難推進到黃河以北。說蘇聯要統一世界，這自然還相當遙遠；就說統一亞洲，也決非一蹴可幾；但如果再用下十年的苦功，好好來運用中共這一賣國集團，由蘇聯來統一中國這塊大陸，却並不是毫無希望。無論賊使中共攻台也好，賊使他繼續搞東南亞也好，這與蘇聯的侵略方針，絕對沒有什麼衝突。

從前日本的軍閥會狂妄的說：「要統一世界，必得先統一亞洲，要統一亞洲，就得先統一中國。」三十幾年來的蘇聯政策，便一直是向日本的軍閥看齊：在中國建立傀儡政權，蘇聯是模仿的日本；擁抱支那，運用支那的人力物力向世界作戰，蘇聯也是模仿日本；蘇聯是日本軍閥的徒子，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却接受了溥儀、汪精衛、梁鴻志、王克敏的衣鉢。所不同的，便是蘇聯比日本軍閥更有耐性，毛、周、劉等比溥、汪、梁、王等更來得恭順，此無他，因為日本畢竟是島國之民，蘇聯是苦寒大陸的一個民族，同時又還有一套世界革命的邪說，足以愚弄一般狂妄的野心者而已。

毛、周、劉等雖然沒有知識，但多少也還認識幾個中國字，偶然照照鏡子也還彷彿覺得

自己是中國人，眼看着蘇聯這樣狠毒而又絕對不會成功的政策，何以便甘心賣國，一直要倒行逆施錯誤到底呢？這便是由於一種歷史演成的命運，使他們無法擺脫，不能不急起直追，去躬蹈溥汪梁王等的這一惡運而已。

最近聽說蘇聯一部份的兵艦和潛艇已向中國大陸的沿海移動，飛機也有增加，大家不要以為蘇聯員會幫助中共攻台，更不要誤會她真會動用自己的真本錢和美國去碰，實際不過是保護她自己已得的權益，同時加強對中共的控制，使得這幾隻毛猴子無法跳出她的魔掌，這在中共的立場看來，不過是又一次的引鬼進門而已。

中共在蘇聯的高壓之下，無法不向南移，攻台可能是她工作的一部份，成功固蘇聯之所願，失敗則於貫澈蘇聯的亞洲政策乃更為有益，所成問題的，便是中共的軍人，會不會一旦覺悟，突然放下武器，直接向中共的首腦人物倒戈，間接向蘇聯清算？促成這一趨勢的有效方法，便看台灣和美國能不能給予中共侵台的部隊一杯苦酒而已。

艾德禮等的遠東之行

艾德禮和貝萬等一行的東來，最初我確實也有幾分為他們擔心，深恐中共果有一套什麼

神機妙算，足以令他們上一次當，同時也果能達到離間英美交親的這一目的。及至看見毛澤東招待他們所說的那一番話，如希望他們使美國撤退第七艦隊和停止武裝日本和西德等等，我才知道老毛這十年來毫無長進，依然像一九四五年和我在延安談話時的態度一樣。

艾德禮這一羣人並不這樣簡單，他們畢竟是一個曾經執過政的大黨，毛澤東竟是這樣以兒戲出之，連欺騙的本領也非常低劣，真出我意料之外。我相信：艾德禮等此行，一定大有收穫！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一日自由人）

中共行動再分析

中共大吹大擂宣傳「解放台灣」，已快到兩月；炮擊金門，也將近兩個星期；我們雖不必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可是中共這一次的丟臉，却是已經丟定了！

自從七月二十三「人民日報」那篇「解放台灣」的社論發表以後，我們即就這次中共的宣傳加以推敲；從本月三日他們開始炮擊金門以後，我們更不斷的加以探索；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的看法大致是這樣的：

一、日內瓦會議結束以後，韓越兩地的戰爭暫時告一段落，我們料定中共另領一支令箭在亞洲繼續造亂，這是極有可能的，但我們沒有想到他們居然選擇了這個對於整個亞洲反共局勢極為有利的題目——「解放台灣」。

二、中共的首腦人物即令蠢笨達於極點，總也應該知道在今天而輕言「解放台灣」，實在是毫無可能，然而仍要擺出這樣一個姿態，「像煞有介事」，其目的不外下舉各點：一、藉此顯顯威風，希望今天打進聯合國發生相當作用；二、對美國真實態度的繼續試探；三、希望對東南亞各國聯防給予影響而減低其效用；四、於離間英美依然可能有益；五、大陸內部有問題，惟有藉軍事行動以加強控制，並減輕黨內的矛盾；六、軍事力量南移，一面可增加主子對他們的信賴並討得其歡喜，至少可索得若干的武器；攻台可能是煙幕，但這個力量南移以後，一轉移間便可用於澈底解決越南，進侵緬甸和泰國，英國在東南亞的所有屬地也得特別擔心！總之，中共明明白白知道解放台灣絕無可能，但在這個攻合的題目下面，他們却並不是沒有其他的文章可做，因此，我們也就不宜忽視他們這一次宣傳而認為毫無意義。

三、依據上舉的這些看法，可見我們並沒有把中共這羣首腦人物完全視為蠢材，尤其沒有把蘇聯操縱中共的妙用一筆抹煞，但我們何以說中共真想「解放台灣」絕無可能，而這次

的丟臉一定丟定呢？一、中共發出攻台的呼聲，美國的反應便異常堅決，史登普之赴大陳，杜爾斯之訪台北，都是這種決心的具體表現；即令大陸沿海島嶼並沒有劃在第七艦隊的協防之內，但只要美國堅決協防台灣，並不斷以武器補充國軍，則國軍無後顧之憂，其自身的力量，便足以確保這些島嶼而有餘。尤其國防部長俞大維氏就職伊始，即隨陳副總統偕同三軍首長，赴金門前線觀察，更足以予世人一種良好的印象，對前線士氣的鼓舞，更有莫大的關係。二、中共在過去確實也在中國大陸打過二十多年的游擊，韓戰兩年有餘，雖說死人太多，總也算勉強支持下去，說他們毫無作戰經驗，自然是不對的；可是這次却要捨陸下海，想要以幾隻破爛的海船，若干的機帆木船，便要和台灣新興的海空力量和美國的第七艦隊去一見高下，真所謂「太不曉事」！所謂「人海戰術」，根本便是一種喪盡天良的戰術，在中國大陸作戰，也許還可「以多吃少」；在朝鮮半島，也許還多少有用；但對於一百海哩波濤洶湧的海面，這種「人海」有何用處？唯一的結果是「船沈人盡」，却依然是一無所得。中共今天的高級將領，對於這種海陸空聯合作戰的新戰術，可以說一無經驗，即令仰仗蘇聯的老大哥，他們也正未必內行，他們果真要幹，我們是謹表歡迎，準備着看他們聯合丟臉吧！三、過去中共在大陸，並不是每次都打硬仗，毋寧說他們的宣傳工作、滲透工作、間諜工作、收

買工作、拆散工作還收了相當的效用，可是這些做法，對於所謂「解放台灣」乃一無用處，而中共却是「狃於蒲騷之役」以為這類做法依然有效，還在隔海狂呼，叫人「帶罪立功」，說什麼「既往不咎」，請問立什麼功？高崗不是立過功，李立三不是立過功，薄一波不是立過功，可是而今安在？誰還會聽這類的鬼話呢？不要說正式作戰，即論宣傳，中共這一次總算表現得低能達於極點了啊！

不要打仗便可看出「敗徵」，我們從古今中外的戰史上曾經獲得有無數的經驗，這一次中共無端發動攻台，無論從政略、戰略、戰術，任何一點上看，其失敗大致已成定局，只要我們能小心翼翼，不驕不躁的妥慎應付，勝利是可操左券的！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自由人)

中蘇共最近行動可能得到的反應

最近俄共頭子赫魯曉夫，率領着由布爾加寧、米高陽等多人所組成的代表團，假借慶祝中共「國慶」的名義，在偽都北平，又導演了一幕喜劇。

這幕喜劇的內容，分別寫成七種文件，已於本月十二日予以公佈：一、中蘇聯合宣言，

說明中蘇共對當前國際形勢的看法，完全一致。二、中蘇對日本關係的聯合宣言，表示硬拖日本。三、表示蘇聯退出旅順的聯合公報。四、表示中蘇合營的四個股份公司將蘇股移交中共的聯合公報。五、簽訂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聯合公報。六、修建蘭州至烏魯木齊至阿拉木圖鐵道並組織聯運的聯合公報。七、中蘇蒙修建從集寧到烏蘭巴托的鐵道並組織聯運的聯合公報。

公佈的是這些東西，沒有公佈的是什麼，當然我們無從知道。

中共和俄共不僅是一家，而且是一體，老子把東西交給兒子，左手把東西交給右手，這與別人什麼相干，公佈不公佈更有什麼關係？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君子惡夫捨曰欲之，又從而爲之辭！」

中國兩千年前的聖人，早已看穿了這一類的把戲；再加上自從加拉罕在三十年前兩度發表對華宣言以來，中國人對於蘇聯陰謀的了解，已積有最豐富的經驗，現在赫魯曉夫又來耍這麼一套，真所謂班門弄斧，當然惟有一笑置之，決不會動搖中國人反共抗俄信念的毫末。

日本人是不是會上當呢？日本所吃蘇聯的苦頭已不算少，尤其以斯達林和松岡洋右所表

演的一幕，對日本人所留下的印象最深；加以這九年以來美國對幫助日本復興工作的努力，更為一不容否認的事實；蘇聯想以這樣一紙空文，誘惑日本丟掉這樣一個可靠的朋友，而去和流氓打交道，也未免太簡單了。可是日本當前的情形相當複雜：一、建軍尚未完成；二、內部的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均十分微妙；三、經濟斷然要找出路，如果得不到美英的切實援助，她可能表現一個另打主意的姿態。因此，日本儘管對蘇聯的不懷好意洞若觀火，却難免不有一部分人主張「將計就計」，與中蘇虛與委蛇，得到一些輕微的好處，同時還可把緊張的局勢緩和，時間拉長，促成美國的對日援助更下決心。日本人充分懂得這類的運用，而把大戰爆發的時間再拖延下去，也確於日本有利。

英國呢？她固然把防共的重點擺在歐洲，但她對遠東也決不會冷淡，即以港督葛量洪最近在美國的種種說法，英國人無意於放棄遠東的心理，已昭然若揭。只要等到歐洲的布置更趨穩定，我相信英國在遠東的行動必將更加積極，而且英美對遠東問題的歧見，還可希望減少而漸趨一致。這次吉田的訪英，他必可得到邱相的鼓勵，等到日本建軍完成，英日重溫舊盟，也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總之，英國保守黨對蘇聯的處心積慮知道得十分明白，斷然不會被騙，至於艾德禮貝萬之流，不過借廻護中蘇作為他們再起執政的一份資本，其内心對

共產黨原也並無好感。

美國對蘇聯早已不存幻想，希望中蘇共分家的這一想法，也早已不復存在。對赫魯曉夫最近所導演的那一幕，在美國看來，只足證明蘇聯對侵略中國的加強，更證明她加強援華援日，及東南亞聯防的斷不可少。她目前的工作重點是蓄勢待時，如何求得國內輿論的一致，一切民主國家的步調一致！大致戰爭的無可避免，她已逐漸明白，如何縮短戰爭的時間，減少戰爭的犧牲，却依然是她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為如此，她只能贊成在一套整個的計劃中由她主動，而不願牽入一個局部的問題使她陷於被動。把美國的這一態度解釋為沒有決心或解釋為她對蘇共中共真有如何的畏懼，這是不合事實的。

總而言之，赫魯曉夫這一幕把戲，對幾個主要國家決不會發生其他的作用，惟有加強他們反共抗俄的決心而已。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自由人）

看吉田花槍怎樣掉法

日本首相吉田茂，在他完成了加拿大、法國、西德、義大利、梵蒂岡和英國這一串的訪問以後，已乘坐「瑪麗皇后」號，於今天（二日）到達紐約。

爲了加強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反共陣線，我們一向是對着日本抱有甚大的期待的。吉田這次在離英赴美以前，曾對「朝日新聞」的記者說：「即使中國大陸有四億人，如果每個人的價值都是零，四億人也等於零。」這在措辭上未免太不謹慎了！假如吉田說：「即使中國大陸有一個一千萬人的共產黨，如果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價值都是零，一千萬人也等於零。」這豈不是非常正確！不過，在無可原諒之中，我依然對吉田保持相當的容忍。我知道：吉田本來是一個粗獷條的人，自明治以來會任過日本首相的人物，就學問修養的一點來說，他大概是最不行的一個。日本一位文學者現任參議員的某君說：「吉田不僅漢文不通，連日本文也不通！」吉田因爲出言不慎常常在議會引起糾紛，這在一般的日本人看來，只算是一種「家常便飯」，我們對他這種對全體中國人帶得有侮辱性的談話，也就置之不議不論之列可也。

我曾在本刊不斷的指出：「蘇聯凡事都可忍耐，惟有等到日本和西德同時建軍，足以從東西兩面去威脅她的時候，她將不得已而要採取行動。」我且會進一步的斷定說：「一旦美蘇兩國對爭取日本到達逐漸白熱化的時候，蘇聯所採取的第一步驟，一定是裝出和平姿態，表示對日本種種讓步，甚至以舊金山和約爲藍本，蘇聯自身，乃至聯同中共，與日本訂立和平條約，以恢復邦交，同時談到千島羣島中若干島嶼的退還，也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我這

種推測也許是過分，而且爲時尚早，可是以目前所展開的事實來說，却是不幸言中。

一個地位特殊的國家，能做到爲兩大敵對的強國所爭取，而這所謂兩強着，對這一地位特殊國家的估價又都很高，這在一個淺見者視之，自然是躊躇滿志，而認爲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可是一加冷靜的思索却不能發現絕大的危機，便正潛伏在這個所謂「千載一時的機會」裏面。

最近吉田首相在他周遊列國的行程中，正在驕首弄姿的東說西說，一面責備英國對中共的政策不對，一面又責備美國把日本搞得這樣毫無力量，而其結論却是「到美國去要錢」！假如我是美國人，我便要甘脆的對這位楚楚可人的首相說：「要錢嗎？有的是！而且在過去的八年間，我已對您報效得不少；您心裏總也明白；可是既然要錢就得相當的聽話，而且必須把你可能的貢獻，赤裸裸的拿出來給我看一看；如果錢向我要，而後門却依然向別人開，那末，老實說，花錢的大爺們，便不見得個個都是傻子。」

平心而論，日本這個「長命百歲」的吉田內閣，其所以延續到今天還儼然存在，十之八九何嘗不是由於美國的支持之賜？假如我們不願否認這八年以來吉田對於日本國家在復興過程中所表現的一些勞績，我們便似乎不應該否認美國——這一個戰勝者，其對日本這一戰敗

者所提出的貢獻，實在是史無前例的偉大！自然，美國對於遠東問題的措施，乃至就是對於日本問題的措施，誠然不是完全沒有錯誤，可是要實備美國，讓那班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青年們去說話好了，萬料不到這種話居然出於吉田之口！

「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

我們試回想到八年前，當鳩山被整肅，吉田由於古島一雄的推薦，一躍而為自由黨的總裁，且進而組織第一次的吉田內閣，當他出入奔走聯軍總部之門的時候，其心情難道不是這樣嗎？現在美國沒有拋棄吉田，吉田却裝出一個可能拋棄美國的姿態，縱不說是「忘恩」，「薄情」總不能不說是「薄情」吧？然則這一次吉田真會和美國鬧翻吧？不會的：吉田也算得是一個飽歷風塵的人物，他把對方的心理揣摩得很熟，他懂得在某種場合，先裝出一套打情罵俏的模樣，不僅於「要錢」沒有妨礙，也許還能够多拿到幾個，也不一定，不信，等着瞧吧？

杜爾斯錯了！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三日自由人）

假如美國沒有忘記自己是自由世界的一個領導國家；假如美國的最高當局也會意識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與今後的自由世界是否能團結無間具有密切的關係；那末，杜爾斯最近在記者招待會所發表一段關於台灣法律地位的談話，我們便不能不根本加以否認，而且認為是毫無根據、毫無價值。

不錯，台灣確曾經遇日本一度佔領，但由於中華民國八年對日抗戰的結果，中國勝了，日本敗了，根據開羅宣言，台灣必須歸還中華民國；根據舊金山和約，根據中日雙邊和約，日本已根本放棄了台灣；在日本表示投降以後，中華民國已正式在台灣受降；今天的中華民國的政府便建立在台灣這一領土之上，而且得着美國及其他多數自由國家的繼續承認；以這樣鐵一樣的事實，而杜爾斯先生居然說出：台灣的「主權稱號和利益等，從未以任何正式意識歸還與任何其他國家！」這真是荒天之大廢！

老實說：美國有永遠避免與蘇聯或中共作戰的自由，美國也有對全世界任何問題表示一切不啻的自由，惟獨沒有否定台灣是中華民國一塊領土的自由！

王德溥遭法事件

內政部長王德溥，最近「無中生有」、「節外生枝」，於中華民國現行法律以外，不經行政院政務會議的同意，忽然頒布所謂「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記事項」九條，內容荒謬離奇，頗然違憲，其影響所及，不僅足以損害政府的威信，而且可能破壞全國的團結，破壞反共的國策，行政院僅管已「令飭內政部暫緩施行」，但我們認為不能這樣輕鬆了事。為維護憲法的尊嚴，為遏止類似事件的繼續出現，為促起一般官吏責任感，內政部長王德溥最低限度應該引咎辭職，聽候懲戒。

此外還有一點基本認識，為政府一切官吏所必須具有的：即政府機關係為人民而設，並非人民為政府機關而設，任何政府機關，如有違法失職的情事，其惟一有權加以指摘的，乃是中華民國的人民。

美韓協議成立

過去南韓與美國之間，曾發生不少的歧見，我們為此事十分耽心，會不斷注意其發展。據本月十七日美聯社的漢城專電，美韓兩國居然已簽定一項協議，其內容大致如下：「美國答應在未來財政年度內，給予南韓以兩億五千萬元的經濟援助，和四億五千萬元的軍援。南

韓則同意：（一）鼓勵私人經營工業。（二）擬定新的手續，以便美軍及主持美援運用的官員，按照合理的匯率兌換美金。（三）設法平衡預算，繼續抑制通貨膨脹。（四）在可以用廉價買到所須物資的非共國家內，採購美援所規定的物資。」

從韓國所同意的這四點，我們可看出南韓已抱棄已往若干的成見，而表現了一種讓步精神；而美國也毅然決然表示互讓，繼續給予南韓以大量援助；這實在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最近國際間有一種不可忽視的情況：即凡關係兩國或兩國以上的重大事件，往往由各該國主腦人物親自出馬，例如年來的杜爾斯，倫敦巴黎日内瓦等處，固隨時發現他的行踪，則遠東的日本、韓國、台灣，他也會親自前往訪問；不久以前，邱吉爾艾登曾到過華盛頓；日本首相吉田茂，也到過若干主要的國家；最近則法總理又已赴美；印美韓間歧見的消釋，又何嘗與李承晚總統前次的去美不有若干的關係呢？甚至連中共，也懂得派遣一個周恩來到四面八方去招搖撞騙！惟有今天的台灣，則似乎是保持一種特殊的作風：五六年來，我們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固然不會離開台灣一步，而派出去的，乃往往是二三流人物，甚至經常駐在各國的使節，也大抵「只求無過，不求有功」！難道我們真正沒有任何重要問題，值得由我們的主腦人物當面去和各國的主要當局當面談談嗎？我確實不懂得這種作風，何以

有永遠保持的必要？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自由人）

第二步的辦法怎樣？

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以後，中共的報紙雖然是暴跳如雷，依然高唱着「不解放台灣決不罷休」的這一謠傳，但「解放台灣」已成過去，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今後我們所應該注意的，乃是反共集團及台灣自身如何從事實上表現其第二步的做法。就反共集團來說，美國對日本，對南韓，對台灣，雖然都已簽訂了這種類似性質的安全條約，但這只能說明三國個別和美國的一種關係，中日韓三國自身却依然缺乏實質的聯繫。在中美條約未簽訂以前，便想構成一個東北亞聯盟的形勢，自然是相當困難，但現在這種可能性却已顯然加強。我們於此願意特別提醒的：乃是中日韓三國聯成一氣，毅然決然的簽訂一個軍事同盟條約，這不能完全期待美國去加以促進，三國自身必須有一種高度的自覺。所謂高度的自覺者，即必須明白認識：共產集團的侵略，固無所謂和平共存，更無所謂適可而止，就東北亞這一方面來說，無論南韓、日本、台灣的任何一點，都隨時可被共產集團選擇作為進攻的目標，一點上被攻，其他各點乃袖手旁觀，這無異靜待敵人的各個擊破，而自招

失敗。我們試想：假定在韓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如果台灣不被凍結在一種中立狀態之下，而能讓她向中國大陸的東南海作最大可能的進攻，則韓戰何至延長到三年之久？更假定在韓戰中能有一支日本的象徵志願軍或若干軍事技術人員得到參與的機會，則今天日韓間的僵局，豈不早已打開？凡此均足證明中日韓三國必須結成一體，互相策應，過去如此，今後更是如此。初步的自覺在日本首先放棄自大之感，南韓能拋棄成見對日本棄仇尋好，自由中國則於自身的光復工作以後，能同時顧到整個亞洲的共同利益。

就東南亞這一方面來說：儘管有了一個所謂東南亞聯盟，但過分的偏於消極的防禦，而且留下的漏洞甚多。在一地區的若干國家和地點，無論越南三邦、泰國、馬來半島，乃至香港，都隨時可能遭遇共產集團的突襲，越南和泰國尤其岌岌可危。我們自來有一種看法：即真正要確保東南亞的安全，必須東起珠江口，西達滇緬路，包括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省的地區，形成一個進一步的防禦走廊。毫無疑義，這四省地區必須歸入自由中國的統治之下，而以自由中國加入東南亞聯盟確保之，然後東南亞才可安如磐石。當然，這件事決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實現的，還得多下工夫，經過相當時期的醞釀，而關鍵乃在英國放棄對中共繼續敷衍的態度，美國能支持我對這一局部的反攻；為這一反攻能確實成功起見，一個東北亞的軍

事同盟條約，尤其非提前成立不可。

就台灣的本身來說，有了這一條約的簽訂，好處自然是不少的：（一）自由中國的國際地位可從此確定，不問任何方面，今後不能再拿台灣作為一種購取國際和平的擬議；過去若干不願與台灣切實合作的國家，從此也可能引起一種新的考慮。（二）因地位的安定，可能促成台灣經濟情況的好轉；（三）軍事的力量，自可逐步的聯帶加強；（四）一切平日對台灣作不利打算的人們，從此也應該有一種新的看法；能穩定一切動搖分子，使之不敢對中共更存幻想，自更不待論。

不過，話雖如此，台澎穩定，僅僅只是反共復國的一個初步基礎，今後應該配合這一轉形勢的工作，依然很多很多：一、過去因台灣本身未趨穩定一切政治上因陋就簡的辦法，今後是否應有一番放手的改進？二、對海外一千二百萬的僑胞，過去實在舉不出任何加強聯繫的具體辦法，今後是否應該就這一方面動動腦筋？三、關於反共復國的思想文化工作，在過去五年中，實在還沒有好好去做，同時也沒有什麼成績可言，今後在這方面打算怎樣？我們既不以保守台澎為滿足，則凡屬這一類的課題，今後便不能不一一求得切實的解答。否則即在美國海陸空的掩護下而長此拖延下去，我們的精神痛苦還是無法解除的。

(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八日自由人)

冷戰現狀

看世界一般跡象，顯然已接近擺牌階段：

- 一、民主集團的信心有加，蘇聯的恫嚇無效。
- 二、東西反共陣容日趨鞏固，德日武裝勢在必行，而且早有基礎。
- 三、中共除繼續敲打「解放台灣」的這面「空大鼓」外，蘇聯仍須利用這一「小熱昏」從事其他的小搗亂。
- 四、各方的和平之聲愈高，正反映備戰愈急，甚至連這位從來不歡喜走動的狄托，現在也居然要出來走走，這證明他對世界的緊張局勢，並非無所感覺。
- 五、蘇聯勾引日本拆散法國的工作，顯然要歸於失敗。
- 六、韓國問題雖已暫趨沈寂，但胡志明在中共撐腰之下，確有武力統一越南的企圖。
- 七、英國態度一天天趨於強硬，這裏面包括無數頗堪玩味的因素。

鳩山跑到那裏去

鳩山對國際問題發表了許多語無倫次的高見，已贏得國內外輿論的非難，議會的質問，反對黨繙方的迎頭痛擊，這證明這位七十老翁仍不過是一位過時人物，並不會比吉田有什麼高明。

自由黨依然是日本議會的第一大黨，而且又已接近大選期間，繙方的話當然是有力的。如果因為各方反對而使得鳩山不能不有所警惕，這最足以證明多黨政治的好處。

一黨專政的優點是政局的變動不多，表面好像安定；壞處是蓋在一床錦被的下面容易流於腐化，官僚的惡習無法湔除，人民趨於厭倦，尤其不好的是犯了重大的誤錯便只好一錯到底，不容易加以糾正。

日蘇是永遠的仇敵，日本大多數的人民不會對蘇聯發生信心，蘇聯也決不會放縱日本。反之美國決不會拋棄日本，日本也決不能離開美國；大陸窮得發慌，實際購買力異常薄弱，與大陸過於接近，會引起海外一千萬中國僑商的反感，因而在東南亞的出進要增加困難，這對日本是不得不償失的。由此看來，鳩山跑到那裏去。

韓馬紹北平之行

聯合國祕書長到北平去講生意，看來是勢在必行的。韓馬紹在北平所受的招待，可能還趕不上汝牛，爲了聯合國的尊嚴，實在是萬分可惜。

中共看來是龐然大物也，實際不過是蘇聯手裏的一張「聽用」，這次蘇聯叫中共把美國十一名空軍人員殺無赦，在蘇聯的目的不外：一、增加中共與美國的摩擦，使中共不能不更加倒向蘇聯；二、日内瓦會議後，蘇聯不顧「冷場」，自非另造新事端使美國的神經繼續緊張不可，這件事也不過是蘇聯的新造事端之一；三、蘇聯叫中共判刑，中共就得判；一旦蘇聯叫中共放，中共也必得放；這證明中共的所謂「主權」，乃正是蘇聯的「主權」，表面是提高中共，實際仍不過是提高蘇聯；四、蘇聯懂得，爲了這十幾個人，美國決不會因此打仗，但可能叫美國低頭，這於削弱美國的威望，仍十分有效。

有人擔心美國所採的手段過於劇烈，可能召致這羣被俘美人的死亡，這真是萬分幼稚：中共根本是十分卑劣的，她只有胆量殺中國人，決無胆量殺美國人；中國人換不了錢，美國人可以換得到錢，一切值錢的東西中共都不肯損毀，如何會損毀值錢的美國人呢？

這件事，從某一意義上說，原來是蘇聯拿美國開玩笑的，只要美國真能硬，蘇聯還是要發出最高命令叫中共釋放的。周恩來答應接見韓馬紹，說是爲了和平，將來釋放這羣美俘，

還不是爲了和平！

六萬億公債

中共又要發行公債，其總額是六萬億（ $6,000,000,000,000$ ），原來大陸的人口據說是六億（ $600,000,000$ ），平均每人分攤不過一萬而已。中共踞踞大陸不過五年，大陸人民都已變成富翁，誰說中共沒有進步？（以上原載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由人）

大陳撤守：

可恃惟有希臘軍，可恃惟有希臘刀，自由非可將人托，自由托人空徒勞！——馬澤羅命哀希臘。

看這兩天的形勢，大陳撤軍，很顯然已經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種事實，而且這一事實似乎已經在積極的進行中了。這一點，在中國政府的立場說來，只是不得已而尊重美國的意旨，我們既一切不能不仰賴於美國，當然美國如何說，我們便只好如何接受了。

假如大陳撤軍，真的還帶得有幾分的積極性，換言之，從大陳撤出的軍力，並不是置之

無用之地，而是要從台澎調出一部份的生力軍，加強馬祖與金門，即以大陳的軍隊去填補台澎的原防，而美國對於金馬的協防，又確能予以切實的保證，則大陳撤退，多少還可作一種戰略上的解釋。否則中共既不付出任何代價，而坐得大陳，其第二步當然繼續攻金馬。假如到了那一時候，美國爲了謀求和平，爲了避免戰爭，依然勸我們繼續讓出金馬，我們是不是依然OK呢？

這幾天，港九一帶的僑胞，正在苦中作樂的歡度春節，大家見面，無不垂頭喪氣，殷殷以大陳爲問，而憂慮到反攻大陸的遙遙無期，影響民心如此，其影響軍心可知，假如沒有進一步的做法，我真不知道何以善後！

美國姿態的可疑

在艾森豪總統向國會提出咨文，要求以武力制止中共對台澎的侵略以後，接連着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空軍便有若干的臨時調動。

他們這一調動的意義，據我觀察不出五點：

一、故作驚人姿態，與艾克的咨文配合，表示他們好像真有決心。

二、加強國民政府的信心，以使他們安心的從大陳退出，不久，還可能要求我們退出金馬，美國所加於我們的責任，便是為他們好好看守這西太平洋防線的一環。

三、這一海軍的調動，可能有對大陳撤軍的船隻遙遙掩護的作用，但亦僅止於遙遙掩護而已，如中共的海空軍乃至蘇聯潛艇對這些船隻加以襲擊，美國還是不會動手的。

四、關於釋放美俘問題，自韓瑞修回返聯合國以後，似乎是一時歸於岑寂，但所進行的暗盤究竟是一些什麼，我們却無從知道。自美國方面並不表現悲觀的論調看來，好像是大有生意可講。可是美國究竟還要顧到一點面子，因此不能不軟中帶硬，這些海空軍的調動，也就無非是為了面子問題而已。

五、東南亞同盟國，下月便要開會，美國為維持其領導者的姿態，某種程度的動作，總還是不能不有的。

總而言之，一江島丟了，大陳也丟定了，金門、馬祖更在搖搖不定之中，大陸苦難的同胞，海外的流亡人士，惟有靜聽中共的勝利歡呼而已！

結束「反共八股」！

反共已進入第六年，我覺得有不少的「反共八股」應該加以修正了。

在過去五年，為反共而印行的書籍或期刊，在港九，在台灣，何止兩千種以上，無論是報導性的、文藝性的、或批評性的，儘管是應有盡有，但內容總嫌單調、淺薄、雜湊、缺乏正確性；在某一時期，誠然也受到若干讀者的歡迎，可是演變到現在，却不免陳陳相因，令人望而生厭，長此下去，還有什麼宣傳效果可言？

這些書籍與刊物的印行，據我所知道，大部分是得有美援的支持的；在東方，以文字宣傳的方式來反共，美國人根本是外行，再加上文字的隔膜，一種書籍或刊物的內容如何，他們更無從鑑別。可是他們既然出了錢，當然便要來領導領導，這樣一來，乃更變得糟糕而又糟糕。

中共也懂得他們的「黨八股」實際已沒有人要看，因此他們的方針已漸漸在變了，我們從事這一工作的朋友們，還不應該覺醒嗎？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自由人）

「紙老虎」和「紙貓」

大陳撤了，中共究竟沒有敢加以干擾，這表示中共對於這隻「紙老虎」到底還是胆怯。我們湖南，有一種奇怪的風俗：便是當一個人病到纏綿床蓐、醫藥罔效的時候，這位病者的親屬或左鄰右舍，往往會提出一個有趣的建議：「何以還不好呢？怕是中了什麼邪吧？還是替他趕掉一隻貓吧！」（貓字的音讀，在我們長沙和毛字差不多。）

這種「趕貓」的風俗，至少二十年前在我們長沙還是十分流行的。其程序是由紙紮店買來一隻七八寸長四五寸高用白紙和篾絲紮成的小貓，貓身上畫有許多斑紋，頭上還寫着一個「王」字，非常神氣。然後由病家請到一位巫師或道士之類的人物，買上香紙蠟燭，一份三牲（包括一小塊肉，一隻小魚，再加一枚雞蛋），有時還從這塊肉上割下一小片，塞在貓的嘴裏，然後再把牠放在桌上，好像是一尊神像所應處的地位。這一切手續俱已完備，乃由這位巫師或道士開始作法，口中唸唸有辭，打拱作揖，大致是勸這隻貓啣着這片肉到別的地方去，不要繼續在這裏騷擾，貓似乎也欣然同意。但最後却由巫師把貓放在手中，揉成一團，一火而焚之！據說這個辦法很有效，病者往往可以霍然而愈。

我最初聽到中共叫出「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的口號，心裡想，假如美國真是一隻「紙老虎」，中共充其量也不過是一隻「紙貓」。

美國這一次總算爲中華民國趕了一次貓，勸我在大陳撤退，也正如割了一片肉塞在貓的嘴裏，可是這位不高明的巫師，却忘了把這隻邪惡的貓一火而焚之，我看病是不會好的。記住：「趕貓」只能趕一次，我們再也沒有多的肉可以一割再割，金門馬祖是斷然不能再讓的！

俄國又一次的政變

由於馬赫的暗鬥，馬倫可夫終於被赫魯曉夫趕走了！我奉勸大家不要在蘇聯的政策會如何的變化上去枉費心思，要知道這只是一個獨裁國家無可避免的一種醜惡。

一個獨裁者所處的地位，在實質上正如同中國舊日的皇帝差不多，皇帝的味道，總是人都想嘗一嘗的，因此爲了皇帝的繼承，兒子殺老子，兄弟殺哥哥，在中國歷史上也成了家常便飯，何況區區的派系鬥爭呢！

幸而墨索里尼和希特拉都是及身而終，否則一幕一幕的醜劇，也不知已經在意德兩國搬演了若干次哩！

我相信：除非莫斯科經過一場原子戰爭的大火，或北京的太和殿、保和殿、紫光殿這些

封建殘餘也已化為灰塵，這類醜劇一定是要繼續上演的。

所謂十國會議

蘇俄的統治者異想天開，居然建議召集所謂「十國會議」，希望由此來解決台灣海峽的爭執，所謂十國者即除美、英、法、蘇和中共以外，再加上參加科倫坡會議的印度、印尼、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五國。

蘇俄不要中華民國，其目的在痛快的來一次「缺席裁判」。

艾登先生更聰明，他覺得非有中華民國不可，其目的乃在從事實上抬出「兩個中國」！今天的所謂國際陰謀，實際上都很有限，我們當然是不會上當的。

台北展覽時裝的一幕

台北一位少將階級的軍官率領二十餘位便衣鬥士，居然粉碎了一個展覽時裝的大會，而且對於少數外賓表現了一種不太禮貌的行爲，因而這位少將乃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捕。假如這件案子沒有其他的背景，而純粹是出於一種對於時局的悲憤，我總覺得是「罪無

可恕，情有可原！」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四年二月十六日自由人）

邱吉爾退休

半世紀以來雄踞英國政壇的邱吉爾首相，最近終於宣告退休了。

邱吉爾是一個愛國者。就英國來說，在過去兩次大戰，尤其是第二次大戰，邱吉爾的功業固然是如日中天，則最後這一次內閣，也還是有他不可磨滅的成績。

邱吉爾不僅懂政治，實際也懂軍事；他能運用很好的文筆從事著作，也還有閒情逸致畫幾筆油畫。一個幹政治的人，最忌的是精神上沒有緩衝，邱吉爾却沒有這種毛病。

艾登是邱吉爾一手培植和提挈起來的一個人物。蘇陶說：「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曾國藩也說：「辦大事者以能找替手為第一義」。就這一點來說，我願意對邱吉爾老先生表示我最高的敬意。

邱吉爾是一個反共者，可是以當前的形勢來說，站在一個國家去反共是不够的，就站在歐洲一洲去反共也還是不够的。德國不武裝不統一，歐洲不會有和平；中共不倒，日本不武裝，不向蘇聯去收復失地，亞洲也不會有和平。就這一點來說，我却不能不對邱吉爾先生表

示遺憾。

高餽被整肅

高餽餽漱石被整肅，這已經是一年以前的事，可是一直到最近才加以正式公佈，而且對高餽的罪狀也還是語焉不詳。

蘇聯整肅貝利亞和馬倫可夫，並不須要這樣長久的時間，而中共却非遷延到一年以上不可。這在一方面可看出高餽一案的內容相當複雜，一定牽涉甚廣，所以毛澤東才不敢輕於一發；在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老大哥」畢竟是「老大哥」，便連幹這種整肅的把戲，小弟弟也還是望塵莫及。

即以這一件事來說，可見中共還得向蘇聯看齊，還得向「老大哥」好好學習，否則在毛澤東劉少奇眼中，中共內部待整肅的大頭子還很多，所謂小王國也並不只東北一處，臨時可能弄得手忙腳亂！

林語堂辭職

南大風潮，在最近幾個月來，曾鬧得滿城風雨，其結果還是不歡而散。

平心而論，陳六使不了解林語堂，歷於一個國際名流的虛聲，便貿然請他去擔任這第一任的創業校長，這是陳的錯。林語堂也不了解陳六使，以為他真有籌款的能力，便貿然想去實現他理想中的一個第一流大學，這是林的錯。

我們很了解：以今天中國人所處的地位，在一個外國的殖民地，想要辦一點確實有益於中國人的教育文化事業，只能使實際大於虛聲，斷不能使虛聲大於實際，換言之，只能一點一滴的去埋頭苦幹，斷不能大吹大擂的為所欲為。南大自然還是要繼續辦下去的，關於這一點，我希望繼林而任南大校長的某一位先生，必須深深地加以體會。

香港的「藝術節」

最近香港有藝術節的舉行，展出了若干的藝術品和古物，同時還有話劇的上演，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今年雖然還是一個開始，但我相信明年可能更有進步。

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上，覺得各方面都在欣欣向榮，例如教育雖仍有待於改進，醫藥衛生的設備雖還有待於普及與充實，但總算都有了基礎。所微感缺憾的，便是藝術空氣還異常

稀薄。可是事在人爲，假定一般市民都感到有發展香港藝術的必要，我相信這一缺憾是不難彌補的，甚至做到像「馬與波」這樣熱鬧，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前兩天我去參觀了「馮平山圖書館」，覺得規模頗不錯，書籍則似乎還有待於補充，九龍這邊新辦了一個「孟氏圖書館」，我不會去看過，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一般居民都有此迫切需要，主其事者一定會有辦法滿足大衆的希望的。假定香港和九龍的許多地方，當地居民團體能自動發起建立一種小規模的書報閱覽室和兒童圖書館，我相信這十分有益，而且也一定可以得到主管機關的資許。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九日自由人）

中共在亞非會議的慘敗

亞非兩洲二十九個單位，從四月十八到二十四，在萬隆開了七天的所謂「亞非會議」，總算在前天悄悄的閉幕了。

把若干平日素無關係或從未接觸的國家，聚在一塊兒談談，相互的自我介紹介紹，我們原也說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到底不能有任何成就，却也是我們所預知其當然的。

中共在這一會議的籌備期間，原打算借此機會來一顯身手的，但沒有想到却遭了一次出乎意料的失敗。

中共所以失敗的原因很多：

一、在這個會議中，表裏如一同情中共的國家，可以說少到幾乎沒有。

二、尼赫魯幾年來的態度，可以說只有在這次會議中，表現得相當的穩重。

三、日本對這個會議，除掉找一點做生意的便利以外，沒有存任何非分之想，因此他們的代表團團長不是重光，而是高崎達之助，他們似乎懂得沒有到他們有力發言的時候，而且他們也懂得像這一種會議，也並不是他們作有力發言的地方。

四、召集國的印尼，不太客氣；錫蘭態度模稜，巴基斯坦的態度更十分嚴正，這都出於周恩來的意料之外。

五、泰國、菲律賓、土耳其、伊拉克、南越等國的態度，也出乎意外的堅強。

六、美國在會議期間，在華盛頓和萬隆會外，都採取了有效的行動；英國似乎也有過許多沈着的應付；顯明的受了若干損害的，只有一個法國。

在聯合公報中，堂堂正正寫出：

「宣佈各種各樣表現形式的殖民主義是一種應當迅速予以根除的邪惡！」

這無異給予蘇聯一記重重的耳光，周恩來在這一惡劣的環境之下，除俯首簽字以外，一籌莫展，我們看他對他的祖國如何交代？

在聯合公報中，也明白的指出：「高棉、錫蘭、日本、約旦、寮國、利比亞、尼泊爾、一個統一的越南」，已具備聯合國會員國的條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應予支持接納，惟獨沒有提到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可看出中共無資格加入聯合國，則在「亞非會議」也是毫無異議的。周恩來外交的失敗一至如此，我們看他有什麼臉面回北平向他的同志們去說話。

所謂「台灣問題」，根本沒有被允許提到會議中討論，周恩來不得已，乃發出願與美國直接談判的聲明，這無異承認美國原有容喙於亞洲問題的資格，從這一點，可看出「亞非會議」沒有給中共以面子，中共也正式的放棄了「亞非會議」！

以自力確保金馬！

因雷德福和羅伯遜的到達台北，金馬問題乃成了舉世所注目的一个焦點。

假如在今天真還有人要勸告蔣總統放棄金馬以換取所謂台灣海峽的停火，這無異是瓦解自由中國兩千萬的人心，銷毀六十萬武裝部隊的士氣，澈底言之，更無異勸告蔣總統自動放棄對自由中國的領導，和永遠拋棄我們反共復國的國策！「是可忍，孰不可忍」！

據我們想，政府當局對這一點無論如何不會放鬆，今後惟一可行的途徑，只有以自力確保金馬。

中共在新加坡

據二十四日合衆社新加坡電：林語堂之不能不辭去南洋大學校長一職，實由中共所加於林的一種打擊。同時新加坡警方，亦證明有若干華僑中學，確已為中共惡勢力所滲透，且已採用過好幾次的暴力行爲。這個消息，確實是加於主張對中共予以姑息者的一種諷刺。中共對香港問題，據周恩來這次在亞非會議所表示，好像還可遷延到十五年以後，這總算是比較客氣的了。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自由人）

美國真要和中共談判嗎？

自從周恩來在萬隆會議發出願與美國坐下來直接商談台灣的緊張局勢以後，不僅引起了美國當局的種種幻想，便是若干國際的和平掮客，也興高采烈作出許多無聊的蠢動。

其實在萬隆會議閉幕的前夕，周恩來突如其来地上這樣一手，根本上便沒有誠意：他因為在該項會議中遭遇種種失敗，想挽回已經失掉的面子，而繼續保持他那個為人所注意的地位，乃臨時搞出這樣一套花樣，事前是否已得有北平的詳細訓令，北平與莫斯科之間又是否會有洽商，均在不可知之數。我們只看他發出那六十九個字的簡短宣言以後，第二天便連忙有所補充；最近本月十三他在所謂人代會擴大會議中所提報告，又依然回復到蘇聯所提出的十國會議；便可看出周在萬隆是何等的輕舉妄動。

所謂「中國人民不要和美國打仗，中國人民對美國是友好的」，這就中共平日所採的立場說來，也是重大的失言：他似乎對中共若干年來所宣傳的「反美援朝」，以及中共政權年來對美所採取種種敵視的行動，毫無保留的加以重重的一擊，這在中共或共產集團自來的作風上，實在是不能容許的。

中共不能對台用兵

我們現在應就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中共對美國所採的態度，以及中共內心對所謂台灣問題的一些想法，根本加以澄清：

一、由中共出面，單獨的、直接的，和美國坐下來談判任何問題均為蘇聯所斷難容忍。

二、中共對美國的態度表面是強硬，裏面是軟弱，不僅她不敢自動的向美國去挑釁，即再度為蘇聯所嗾使要她這樣做，她鑒於已往韓戰的得不償失，也會要想盡方法去竭力避免。

三、中共不敢，也不能對台灣用兵，她所希望做到的，只是台灣不復作反攻大陸之想，或事實上無法發動反攻的行動。

即令中共在蘇聯所有附庸國中所佔的比重較高，但這依然要以中共對蘇聯的忠貞不貳為先決條件。換言之，即愈為蘇聯所重視的一個附庸國，蘇聯對她所加的束縛乃愈為嚴格！這好比為主人所擁有羣雌弱弱的若干侍妾，愈受寵愛，便愈不容許到外而去搔首弄姿，年來若干民主國家，隨時都沒有忘記向中共去實行勾搭，這都是由於他們根本不認識中共所處的這一妾婦地位。

過去的三年韓戰，已把中共拖得焦頭爛額，如果為台灣問題再向美國開罵，即將無所謂「有限度的戰爭」，必然引起美國對大陸的轟炸。中共年來正在標榜建設，在那樣一種微弱

的建設基礎之上，如何經得起三五顆氫彈或原子彈的威力？截至目前為止，毛澤東周恩來之類，並沒有像往日日本軍閥那樣的發瘋，而蘇聯的態度更極端謹慎，他們有什麼勇氣敢輕於一試？

美國造成有利中共形勢

我在本刊上會寫過一篇「毛周政權與所謂台灣解放」，說明中共如果以武力攻台，無論成敗，都可以使得中共政權發生變化，其結果於毛周極端不利，因此他們必須使得所謂「解放台灣」無限期的延期。只要我們能加強金馬的防守，使他們估計非投下十萬人至二十萬人的代價並若干海空軍的犧牲，即金馬也無取得的把握，他們便可能對金馬也不敢輕於動手。世人為中共集中大軍於東南沿海的情報所眩惑，以為中共真有一幹的決心，實際所集中東南的武力，以「三野」為主，這不是說明毛周要打，正是說明他們不打。

中共儘管不要打，但造成緊張的姿態，他們却認是不可少的，否則便不能使美國上當，也不便於若干和平掮客的工作。據道路傳聞，台灣如不得美國的同意，即無反攻大陸的自由，此說果確，中共的所得便已很多了。

台澎永久存在，而又不能反攻，甚至還可不戰以取得金馬，這實在是於中共一個太有利的形勢，尤其是毛周政權一個太有利的形勢。我們不懂：美國爲了什麼一定要一步一步把這一有利形勢送給中共？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自由人）

中共大舉援助北越

儘管共產集團在最近的過去，曾裝出種種不同的笑臉，而一般幻想和平的人們，也似乎是得意忘形，可是共方沒有絲毫鬆懈他們侵略的企圖，依然是蠻一樣的事實。這只要看最近中共和北越間所演出的一幕，便可完全明白。

最近胡志明率領着北越代表團曾赴北平作了十天的訪問，中共除擺出十足的架子對胡團予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歡迎以外，並且於本月七日發表了一個中越共的聯合公報。

這一公報的裏面，係表示中越共今後如何加強合作，同時還以價值三億以上的美元，無償的賄予北越。

假如我們僅以「打臉充胖子」作為中共這一行動的解釋，顯然會要陷於錯誤。我們必

須知道：中共的這一舉措，僅僅是整個共產集團執行他們整個侵略計劃的一環；同時也表示他們對朝鮮、對日本、對台灣，……還只是準備緩慢前進，而對整個東南亞的掠奪，則已如箭在弦上，待時而發，而且這個時間是不會拖延得太久的。

從中共這一積極援越的行動，還可看出種種的副作用和中共所抱持的一種心理：第一、他們正在大吹大擂推行他們的所謂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此時來積極援越，乃表示他們在財政上還有餘力，一以加強民主集團的迷惑，一以穩定大陸人民已對他們日趨動搖的信心。

第二、積極援越，同時確可給予亞洲各處的共產黨一種鼓勵，使大家覺得，只要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們走，是確實可以得着幫助的。

第三、蘇聯早已加重中共一種侵略亞洲的特殊任務（當然是有一定限度的），中共表示在切實執行這一政策，乃正可加強他們在共產集團中的地位。

第四、美國援外的數字，本年度本來已經削減，而美國國會的大爺們却還要減之又減，削之又削。中共一次以三億美元以上的數字去援助一個北越，這不啻表示凡是美國可以做到的，他們也一樣可以做，這對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富有的國家，不啻是一個有力的譏刺，其足以削弱一切接受美援國家對美的信心，自更不待論。

我們過去曾在本刊表示美國對於如何運用美援的計劃不甚切實，其由美援所應該產生的效果，也不盡如理想。

我們也會表示過：自由中國對於今天海外一切的反共活動，即令無力給予任何物質上的援助，至少總應該給以精神上的支持，千萬不可今天來一次決議，明天來一道命令，使大家感到啼笑皆非！

我們看見共產集團對於他們的侵略計劃能够周密的、積極的推動，實在不能不令我們發出如上面的一種感慨。

巨頭會議開幕前夕

千呼萬喚的巨頭會議，已開幕在即。說過去四強外長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一到巨頭們手裏便可解決；過去四強外長所不能造出的奇蹟，一經過巨頭們的頭腦，奇蹟便可公然出現；這當然是不會的。據一般的推測，巨頭會議的作用，本來不在立即解決問題，而只在把當前的一切重要問題盡量提出；不在把一切問題如何解決的細則一一作成決議，而只在指出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則和途徑，果然能够做到這樣，總也還算是不虛此一行。

可怕的，乃是對若干絕對不能輕於讓步的問題（如德國統一問題與建軍問題），而誤落蘇聯的圈套；而對若干一時絕對無法實現的問題（如世界裁軍問題、原子武器管制問題），又發出許多毫無用處的空談。本來，凡是一個涉及世界多方面的問題，我們都主張交到聯合國去解決，在今天除聯合國會議以外而有所謂巨頭會議，這只是由於聯合國精神已被少數大國摧毀了的當然結果。在今天，以蘇聯代表共產集團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一集團的本質在侵略，多侵略或少侵略，今天侵略或明天侵略，這在蘇聯盡有伸縮的餘地；以美英法代表民主集團乃大有問題，因為民主集團的分子是被侵略的，一經讓步便等於出賣，因此美英法乃更得小心。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十三日自由人）

檢討周劉的暗鬥

繼高餽、胡添、以及大罵梁漱溟等等事件以後，前幾天更有冷禦秋、金仲華、胡厥文等在上海被捕的傳說。前天（十五日）合衆社根據台北「聯合報」的一種報導，據說周恩來和劉少奇之間的暗鬥，又已日趨尖銳化；甚至該報判斷周劉間的衝突一經爆發，勝利者的一方將屬於劉少奇，而周恩來一方則將注定的歸於慘敗。

像這一類的看法或推測，原不始於「聯合報」，至少在香港方面，便早有類似的傳說。

應該多研究少判斷

關於中國大陸的消息，原不是竹幕所能絕對封閉得了，可是要把這類消息，搜集得很完備，分析得很妥當，而又確能明白他們內部的關鍵，却也不太容易，因此，我不主張輕下判斷。

在一種極權專政的制度之下，在少數可以取得最高地位者的人物之間，到最後鬪鬥終不免短兵相接，這幾乎是古今中外很少有例外的。在中國舊日的一個專制王朝，等到權位爭奪戰到達白熱化的時候，雖父子兄弟之間，也往往不免互相屠殺，何況是掛名黨籍一種泛泛的「同志」？（同志兩字的濫用，愈到近年乃愈形醜惡，我們尋常聽見的有所謂「男同志」、「女同志」、「警察同志」、「司機同志」，……種種的稱呼，究竟他們同的什麼志，誰也不明白。）

朱德資深而望不重

以中共內部朱德以及周劉這三個人而論，本來都是次於毛澤東一等的腳色，照說誰也有資格可以繼承「老毛」的這一寶座。可是，朱資深而望不重，自從在抗日期間「老毛」把他擺在延安以後，實際已與軍隊脫節，截至目前為止真正可以指揮共軍的乃是毛而決不是朱。一個軍頭脫離了軍隊，即等於魚離於淵，還能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作用？以朱這個人的性格來說，本來是「庸庸厚福」一流，在中共內部，他對誰也無恩無怨，誰對他也無譽無毀，可以說是一位天然的「好好先生」。周劉之間的暗鬥日劇，毛澤東比我們知道得更為清楚，可是此時就讓周劉這種衝突表面化，不只毛澤東感到麻煩，即莫斯科也認為為時尚早，毛與莫斯科彼此心照，於是乎，朱德在名義上乃一躍而坐上了紅色中國的第二把交椅。其所以要這樣做，其目的僅在和緩周劉的衝突於一時，毛本人沒有認朱可以代他，莫斯科更不會許可以朱代毛，何況以年齡論，毛小於朱，以健康論，朱優於毛，至於朱毛兩個究竟誰先結束，此時還很難說，更那裏便談得上如何繼承的問題？

周劉本領互有短長

以現狀論，如果沒有特殊的新興人物起來，未來中共內部的逐鹿者，自以周劉兩個為勢

均力敵。以一般的情況來說，他們倆可以說是年相若而道相似（所謂盜亦有道是也），其迷戀權位的熱情也正相當；可是要作一番周劉優劣的比較則當有待於較詳的分析：劉之爲人，貌似陰狠，實極暗晦，對外接觸較少，因之見聞寡陋，實一内幕活動的典型人物，其對蘇聯托亦較深。周並沒有怎樣的基本知識，但氣象較爲開展，亦頗長於機動肆應，然風頭觀念太強，演出往往過火，其手腕頗能引起西方國家的種種幻想，然在蘇方看來，則危險性較大。劉的立腳點在黨，因之其行動頗爲一般舞辯分子所不諱；黨的發展又太快，因而內容並不堅實，且有漸趨腐化的可能。周以搞統戰起家，結納頗爲廣泛，其在黨外的力量，乃遠大於黨內，如果大陸人民對黨的厭棄有加，則周的勢力可能還有進展。

毛在中間操縱利用

毛是一個站在周劉之間從事操縱利用的人物，以當前形勢論，周劉對立，頗利於毛，一旦周劉果真破裂，則毛殊難繼續灰色，而不能不自行當衝。就目前大勢來看，假定共產黨集團的和平幌子還要儘量使用，則劉一時不易抬頭；萬一東西關係突然決裂，則周可能在一迅雷不及掩耳的形勢之下，遭遇慘重無比的打擊，而劉乃變成一時的廢子，他不只排周，如

毛不死，他也可能進一步的排毛，因不如此，蘇聯即不能安心作戰也。

總而言之，周劉衝突終不能免，但目前尚非其時，自由中國自身不想辦法，只靜待他人
的崩潰，實際也並無好處。

（以上原載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十七日自由人）